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 著

言语意味着什么

——语言交换的经济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言语意味着什么

言语意味着什么

0
9

0
9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言语意味着什么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策划 / 杜小真 高丙中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es Années Croisées France-Chine-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Fu Lei-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中法文化年 - 傅雷出版资助计划 - 由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

法国文化年
L'ANNEE
DE LA FRANCE
2004/2005

网址: www.ep.com.cn

ISBN 7-100-04372-7



9 787100 043724 >

ISBN 7-100-04372-7/H·109

定价: 13.00元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言语意味着什么

——语言交换的经济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褚思真 刘 晖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法)布尔迪厄著;
褚思真,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7-100-04372-7

I. 言… II. ①布… ②褚… ③刘… III. 社会语言学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861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ÁNYŪ YÌWÉIZHÈ SHÉNME

言语意味着什么

——语言交换的经济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褚思真 刘晖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372-7/H·1096

2005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1/8

定价:13.00元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de Pierre BOURDIEU

©LIBRAIRIE ARTHEME FAYARD 1982

根据法国法雅尔出版社 1982 年翻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目 录

导言	1
第Ⅰ部分 语言交换的经济	5
1. 合法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	15
2. 价格形成与利润预期	49
第Ⅱ部分 言语与象征性权力	81
1. 权威化的语言:使仪式性话语有效的社会条件	85
2. 制度的仪式	97
3. 认同与表征:对地区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所需 要的元素	111
4. 描述与规定:可能性的条件与政治效力的限制	122
第Ⅲ部分 对话语的分析	135
1. 审查与塑形	138
2. 宏大话语:“关于对《读〈资本论〉》的几个评注”的 若干社会学思考	171
3. 科学性的修辞:对关于孟德斯鸠效用的一种分析 的论证	179
注释	188
译后记	219

导 言

在《将负量概念引入哲学的尝试》(*Essa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Grandeur in Philosophy*)中,康德设想了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而又力争十二分程度的兄弟之爱的人,与另外一个有三分程度的吝啬并且有能力达成七分程度慷慨目标的人——而这个人只做出了四分程度的慷慨行为——相对比。他得出结论,虽然按照行为来衡量——二比四——前者不可辩驳地要比后者低劣,但实际在道德上,他比后者更为高尚。我们或许应该使用一种类似于此的算术式的价值评估来评判科学著作……社会科学明显是处在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的阵营里,而且,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以康德的方式来将它们必须克服的社会力量的因素考虑进来,我们无疑就能够更为准确地对它们的价值进行评估。当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其影响遍及所有社会科学学科的特殊目标时,这一点就更确实无疑了。这种特殊的目标,即语言,是整体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在索绪尔的研究中,它是通过对其所有内部社会变量的排除而建构起来的;或者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它是由赋予语法的形式属性以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损害了功能性限制——而建构起来的。

在这种学术研究成为流行时尚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

2 言语意味着什么

的工作——即以确立“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为目的,停留在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方法论的“解读”之上的研究(所幸它没有发表)。因此,对于这一具有至高权力的学科所施加的最为可见的支配性影响,我可能比别人更为敏感,无论它是涉及理论著述的文字手稿,还是按照表面意义对概念所作的机械转换,或者是所有不假思索的借用——这种借用割裂了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与操作的方法(*modus operandi*),导致了一种预料不到的、有时是荒谬的再解释——所作的机械转化。但是对时髦品味的反抗,绝不是一种注定要认可无知的拒绝:最初是索绪尔的著作,然后是——当我开始接近于察觉到作为执行的话语(和实践)模型的不足之处时——乔姆斯基的著作(他的著作认识到了生成性倾向的重要性)^①,在我看来就是包含一些基本问题的社会学。

这一点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即除非我们超越作为纯理论的结构语言学意图之中所固有的限制,否则这些问题就无法发挥它们全部的影响。现代语言学的全部命运实际上是由索绪尔的初创行为(*inaugural act*)所决定的;通过这种初创行为,他把语言学的“外部”要素与内部要素区别开来,并且通过为后者保留语言学的头衔,排除了所有在语言与人类学之间确立一种关联的研究,排除了讲说它的人的政治历史,甚至是语言讲说区域的历史,因为所有这

^① 关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1957年乔姆斯基在荷兰出版的《句法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与结构主义背道而驰的生成语法。他主张语言学家应当把研究对象从语言转向语法,研究范围应从研究语言的使用转为研究语言能力,研究目标应从观察现象转为描写和解释现象,研究方向应从处理语言素材转为评判语法假设。他由此掀起了语言学界的革命。——译者

些事物不能对语言知识本身有所增益。尽管结构主义语言学被假定为源自语言被赋予的自治性(这种自治是相对于该种语言生产、再生产和使用的社会条件而言的),但它如果不实施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将一种科学性的表象赋予给对历史产品的自然化,即赋予给象征性的对象,它就无法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科学。语言学场域之外的音韵学模型的改变,对各种象征性产品、亲属关系分类体系、神话系统或者艺术作品而言,具有使其初创过程普遍化的效应,正是这种初创过程通过把语言方式与其生产和运用的社会条件分离开来而使得语言学成为了最自然的社会科学。

不言而喻,不同的社会科学对这匹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①也具有不同的先天容纳倾向。将人类学家与其对象联系起来的特定关系,以及由其外部观察者的地位所赋予的“公正的观众”的中立性,使人类学成为其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当然,还有艺术或文学的历史传统:在这一领域,引进一种预设了功能的中性化的分析方法只能是使感知艺术作品的模式变得神圣化,而这种模式总是要求鉴赏家的、即“纯”的和纯粹的“内部”性情倾向,而排除任何对“外部”因素的“还原性”指涉。因此,颇像是另外一个理论分支的祈祷轮(prayer wheel)^②,文艺符号学把对艺术著作的膜拜抬高到了理性的层次,而同时又没有改变它的功能。在各种情况中,社会都

① 在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在阿凯亚人进攻伊利昂城时,奥德修斯献计造了一只大木马,内藏伏兵,特洛伊人把木马拖进城,结果阿凯亚人里应外合,攻打下了伊利昂城。后来特洛伊木马常被用来比喻运用某种加以掩饰的手段,隐蔽地引进一些东西。——译者

② 即喇嘛教徒所用的、刻有祈祷文的祈祷轮,又称地藏车。这里比喻有促进作用的东西。——译者

4 言语意味着什么

被排除在外——这使得语言或者任何其他象征物都被当作了其自身的终极目标——这颇有助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功,因为它赋予以纯粹内部分析和规范分析为特征的“纯粹”实施以一种没有结局的游戏的魅力。

因此,推导出这一事实的所有结果就成为必要了;而这些则被语言学家和他们的模仿者强有力地压制了,以致如《普通语言学教程》所断言的,“语言的社会属性是其内部特征之一”,并且社会的异质性都包含在语言之中。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事业当中所包含的风险,这种风险并非是显而易见的粗糙,因为对这种粗糙可以进行最为严格的分析;这种分析能促成被压抑之物的回升,但这也是它受到指责之处。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在接受一种较低的区分性(distinction)利润的同时,选择为真理付出较高的代价。

第 I 部分 语言交换的经济

社会学的确立是通过客体建构的运作过程而实现的,只有通过揭示自己借以确立的客体建构的运作机制,以及自己的基本概念产生与流通的社会条件,社会学才能把自己从所有形式的支配——今天,语言学及其概念仍然在对社会科学施加着这种支配——中解放出来。从名称上看,语言学的核心意旨即唯理智主义哲学(intellectualist philosophy),它把语言看成一个沉思的对象,而不是行动与权力的工具。由于人们接受了语言学的这一核心意旨,语言学模型便被如此轻易地被移植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场域中来。接受索绪尔的模式及其预设也就意味着要把社会世界看成一个符号交换的领域,并且把行动简化为一种交流行为,如同索绪尔的言语(parole)那样,这种交流行为注定要被一种符码(cipher)或代码(code),即语言或文化的方式所破译。¹

为了与这种社会哲学划清界限,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把社会关系——甚至支配关系——看成象征性交换,也就是说,把它们看成是隐含着认知与承认的交流关系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这种绝妙的交流关系——语言交换——也是一种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言说者之间或者其各自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正是通过它才得以实现。简而言之,要发展一种关于符号交换的经济,我们就必须超越经济论与文化论之间那种通常的对立。

每一次言语行动,而且更一般地讲,每一次行动,都是一种事件的结合,即彼此独立的因果系列之间的一种遭遇。一方面,存在

着已经被社会建构好了的语言惯习的固有配置,它暗示着一种言说或者讲述确定事物的特定倾向(表达性利益)和一定的言说能力,这种言说能力既包括生产无数语法正确的话语的语言能力,也包括在确定情境中充分运用这一能力的社会能力。另一方面,还存在着语言市场的诸种结构,它们把自己作为特定律令和审查制度的体系而施加影响。

作为语言惯习与它们为之提供产品的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语言生产与流通的简单模型来说,它既不寻求对关于这种代码的严格的语言学分析提出挑战,也不寻求取代它。但它确实使我们能够理解,当语言学只依赖于所涉及因素中的某一种时,它所遭受的那些错误与失败。它依赖的这种因素,就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能力,它被抽象地予以界定,而忽略了它所产生于其中的社会条件的所有因素。它竭力在其所有的并置的单一性(*conjunctural singularity*)中对话语作全面的说明。事实上,只要语言学家们还没有认识到构成其科学的这种局限性,他们就只能无望地在语言中寻找某种实际上是印刻在社会关系中的东西——而语言正是在这些社会关系内部发挥功能的,或者说他们是在从事一种社会学的工作但却对此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冒着一种风险,即在语法本身中去发现其自发社会学无意中引入语法的某种东西,而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语法仅仅给予了意义很不完全的界定:只有在与市场的关系中,话语意义的完全确定才得以发生。构成关于意义的实践性定义的一部分(而不是最少的)决定因素是自动地并且是从外部来到话语中的。在语言流通中引发的客观意义首先是以区分性价值

8 言语意味着什么

(distinctive value)为基础的,这种区分性价值来自言说者在语言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有意无意建立起来的关联;其中,语言产品是由一位具有社会特征的言说者所提供的,而其他产品则是在一个确定的社会空间里被同时提供的。这种客观意义还基于下面这一事实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语言产品只有当其被作为一种信息来对待时,也就是说,只有当其被解码时,它才会作为信息而被完全认识到。与之相关的事实是,那些以其对所提供产品的创造性占有而接受信息的人,他们所使用的解释图式可能会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不同于那些对这种信息的生产起指导作用的解释图式。通过这些不可避免的影响,市场不仅在塑造象征性价值方面发挥着作用,而且还在塑造话语的意义方面起着作用。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对有关风格的问题进行再检验:这种“对语言常规模式的个体偏离”,这种其去向是为话语赋予其独特属性的专门化的精工细作,是一种此时此刻感知着的(being-perceived)东西,它只是在与正在感知着的主体的关系中存在,它被赋予了各种区分性倾向,这就使其能够在不同的谈吐方式,即独特的言说风度之间做出区分(distinction)。因此,不管它是一个关于诗的问题(与散文相对),还是一个关于特定(社会的、性别的、代际的)阶层的词语选择问题(与另一阶层的措辞相对),风格都只是在与能动者的关系中才存在,这些能动者被赋予了感知与欣赏的图式,从而使其能够把风格构造成一套汇合起来理解的系统性差异。在语言市场上流通的并非是“语言”本身,而是以风格来标定的话语,这既指其生产的方面,即每一言说者都从普通语言中形成

了一种个人语型(idiolect),也是指其接收方面,即每一接收者都通过把构成其单独的以及集体经验的所有东西附加于信息之上,从而有助于生产他所感知和欣赏的信息。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谈到的关于诗的话语的见解延伸到所有话语中去,因为当其成功时,它最大程度地表现了下述效果,即把那些个体之间各不相同的经验唤醒。如果说,外延代表着“对所有言说者来说都共同的稳定部分”,²而内涵与之相反,指的是个体经验的单独性,那么这是因为,内涵是在一种具有社会性特征的关系上形成的,而信息的接收者们则把其象征性占有手段的多样性引入到这种关系中来。交流的悖论是,它预设了一个共通性的媒介。但是,正如我们在某种限定性案例——其中,就像在诗中常见的的那样,其目标在于传递情感——中所清楚地见到的情形,这一媒介只有通过引出与复兴那些独特的、并且因为独特而被社会所标示了的经验时才能发挥作用。在辞典中那些通用词语——作为各种实践关系中中性化的产物,它们在这些实践关系中发挥着作用——是不具有社会性的存在的:在实践中,它总是与各种情境掺杂在一起,以致它在形形色色的市场中所保持的相对不变的核心意义有可能会不为人们所注意。³正如旺德里埃斯^①所指出的,如果词语总是立即呈现出其全部意义的话,那么话语就将成为无休无止的双关语了。但是,就像法文动词“*louer*”(租借,源自“*locare*”)和“*louer*”(赞扬,源自“*laudare*”)的情况那样,如果它所带有的所有

① 旺德里埃斯(Joseph Vendryès, 1875—1960),法国语言学家、古典语言和居尔特语专家,主要从事普通语言学 and 印欧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中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语言论》、《古爱尔兰语语法》等。——译者

意义都是完全独立的,那么所有的双关语(尤其是意识形态类的双关语)都将不可能存在。⁴一个词语的不同意义是在其不变的内核与不同市场的特定逻辑之间的关系当中被界定的,它们本身客观地处在与市场的关系中,在这个市场中,最普遍的意义得到了界定。它们只是对于学术思维而言才是同时存在的,而这种学术思维是通过截断语言能力与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来阐明词语的意义的。

合法语言在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在这种社会普遍存在性中,有一种固有的一词多义的情形;这种一词多义含有各种可能性,通过对这些可能性加以利用,宗教与政治便获得了其最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的效果。在一种区分性的社会里,被称为“普通”名词的东西,例如工作、家庭、母亲、爱,等等,在现实中带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意义,因为同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所使用的是或多或少相同的一种语言,而不是数种不同的语言。语言市场的一体化意味着,对于每一个符号来说,都无疑存在着越来越多的意义。⁵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提醒我们,在革命性的情境中,普通的词语带上了相反的意义。事实上,不存在任何中性的词语:例如,研究表明,那些最常用的表达品味的词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常常具有不同的、有时是相反的意义。例如,“soigné”(整洁的、干净的、谨慎的)一词被小资产阶级称许性地加以运用,但却被知识分子所拒绝,因为对他们来说,准确地讲,这一词语唤起了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所有东西,他们精神的卑下和猥琐。宗教语言的多义性,还有它所产生的对诸对立面的统一或对分化的否定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效果,来自下面这一事实:那些在社会空间里占据不同

位置的言说者,对于普通语言进行着生产与接受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隐含着一种“再解释”的过程,这种再解释也因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图和旨趣;宗教语言则以牺牲这种再解释为代价,力图向所有的群体进行言说,并且所有的群体也都在说这种语言。这一点不同于诸如数学那样的语言,后者只有通过对数学家群体的同质性严加控制,才能确保“群体”这一词语的单义性。在与科学相同的意义和条件上看来,被称为“普适性的”宗教实际上并非是普适性的。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想在有着部分或完全不同旨趣的能动者或能动者群体之间确立一种实践上的共识,就必须求助于中性化的语言。当然,首先是在合法的政治斗争中是如此,但在日常生活的各种事务与相互交往中,情形也依然如此。不管所使用的可能会是什么样的语言,各个阶层之间(或者,在殖民或半殖民社会中的各个族群之间)的交流,总是代表着一种对这种语言来说是关键性的情境。它倾向于促使人们复归到那种最明显地充满着社会性内涵的意义上来:“当你在一个刚离开乡村的人在场的情况下使用 *paysan*(农民)这个词语时,你永远不会知道他如何看待这一词语。”因此,再也不存在什么单纯的词语了。这种揭露的客观效果,便是破坏了日常语言表面上的统一性。每一个词语、每一种表达方式,都面临着一种危险,即都带有两种相互对抗的意义,这反映了它们被其发出者和接收者所理解的方式。这种言语自动作用的逻辑,不知不觉地把人们引回到了词语的日常用法中去,带上了所有与之相联系的价值观和偏见。这种逻辑隐藏着恒久性的“欺骗”危险,而这种欺骗则能够立即摧毁那种通过相互调适的策

略而谨慎维持下来的一致性。

但是,如果一个人把政治与宗教语言的象征性效验简化为一种误解的效果,而这种误解导致在各方面都对立的个体在同一信息中认识自己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完全理解这种象征性效验。专门化的话语能够从社会空间的结构与社会阶层场域的结构之间所暗藏着的对应中获得其效验。社会空间包括政治场域、宗教场域、艺术场域、哲学场域等等,在其内部,这些专门化的话语被生产出来;而这些专门化的话语的接收者们则处于社会阶层的场域之中,并且根据这种场域来解释所接收到的信息。构成各专门化场域及社会阶层场域的各种对立之间的这种同源性,是一种固有的模棱两可的根源,当各种圈内话语在所限定的场域之外传播,且经历一种自动概化的过程,使其不再仅仅是支配或被支配的能动者在特定场域内部的言辞,而是变成对所有支配或被支配的个体都有效的陈述时,这种固有的模棱两可尤其明显。

事实仍然是这样的,即社会科学必须要考虑到语言的自主性、其特殊的逻辑及其特有的运作规则。尤其是,如果不考虑下面这一经常被证明的事实,即语言乃是范例性的形式机制,其生成潜能是无穷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语言的象征性效果。没有什么不能被说的东西,却有可能什么也没说。通过语言,也就是说,在语法的限度内,一个人可以说出一切东西。从弗雷格^①以来我们就已经知道,词语可以无需指代任何东西而仍然具有其意义。换句

^① 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 1848—1925),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著有《概念演算》、《算术基础》和《算术基本法则》。——译者

话说,形式上的严密性可以掩盖语义上的任意性。所有的宗教神学以及所有的政治神正论都利用了下面这一事实,即语言的生成潜力可以超越直觉或经验证实的限度,生产出形式上完美无瑕而语义上空洞无物的陈述。仪式是关于强置(imposition)情境的限定性案例,其中,通过一种可能很不完美的技术能力的演练,一种社会能力——被赋予了言说权而且是具有权威的言说权的合法言说者的社会能力——得以操演。邦弗尼斯特^①指出,在印欧语言中,用来表达法律的词语与动词“说”有关。因此,那种正确的言论,也就是那种形式上正确的言论,它宣称自己言说了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言说了事物所应该具有的情形,而且这种宣称有相当大的成功机会。那些像马克思·韦伯那样把巫术的或者卡里斯玛(charisma)式的集体盟誓或神判的法律,置于与以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为基础的理性法相对立位置上的人们,忘记了下面这一点,即那种最严格意义上的理性化的法律,从来都只不过是一种可以奏效的社会巫术行为。

合法的话语是一种创造性的言语,它使其所要说的东西得以成立。这是所有那些施事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例如祈福、诅咒、命令、祝愿或者羞辱,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换句话说,与所有那些只记录了一种预先存在条件的派生性、观察性的陈述不同,正是这种神圣的言辞,这种具有神圣权力的言辞,如同康德归之于上帝的本原直观(intuitus originarius)那样,创造了它所陈述的东

^① 邦弗尼斯特(E. Benveniste, 1902—1977),法国语言学家,法兰西学派的语言学派的第三代。其观点接近于布拉格学派,对功能语言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译者

14 言语意味着什么

西。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的是,通过生产那种为集体所承认并且因而能够被实现的关于存在的表征,语言生产着存在,从这种力量中,语言获得了无限的生成性的同时也是创造性的——康德派意义上的——潜能;由于它具有这种潜能,对关于绝对权力的梦想来说,语言无疑是首要的支持力量。

1. 合法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

“如您所说的那样，我的有教养的爵士，应该有法律来保护所获得的知识体系。

以我们的一个好学生为例来说吧：他勤奋而谦虚，从最早的语法课开始他就已经有了一个记满短语的小笔记本。

在他专心跟老师学了20年之后，他已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开业运营的智力储备库，难道这种智力储备库不正像房子或金钱那样是属于他的吗？”

P. 克洛代尔^①，《缎子鞋》(*Le Soulier de Satin*)

“语言构成了一种财产，所有人可以同时使用，而不会使其储备有任何减少，因此，这种财产容许为一个完整的共同体所共享；对所有人来说，自由地参与到对这种共有财富的利用中来，这在无意中促进了它的保存。¹ 奥古斯特·孔德^②把象征性的占有描述为一种神秘的参与，可以被普遍、一贯地获取，从而排除了任何形式的

^① 克洛代尔(Paul Louis Charles Mœriw Claudel, 1868—1955), 法国诗人、剧作家。曾任驻中国领事和驻日本、美国、比利时等国大使。《缎子鞋》是他的代表作。——译者

^②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译者

剥夺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孔德提出了一种关于语言共产主义错觉的示范性表述,这种错觉困扰着所有的语言理论。这样一来,索绪尔无需提出关于语言占有的社会与经济条件的问题,便对此做出了解决。与孔德相同,索绪尔是借助于有关财富的隐喻来做到这一点的,他把这一隐喻不加区分地运用到“共同体”和“个体”上:他谈到了“内心财富”、“被语言实践积存于那些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主体中的财富”、“个体语言财富的总和”以及“积存于每个大脑中的印记的总和”。

乔姆斯基的功绩就在于,他明确地认为,在其普遍性的意义上,正在言说的主体具有索绪尔传统所心照不宣地赋予他的完美能力:“语言理论所首要关注的是一个完全同质的言语共同体中的理想的说者-听者,他们对其语言有着完美的了解,而且,在其把这种语言知识运用于实际的操作时,他们并不受诸如记忆限度、分心、注意力或兴趣转移以及误差(偶然的或特征性的)这类语法上不相关的条件的影响。在我看来,这就是现代普通语言学的创立者们所持的观点,而且,还没有人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对之加以校正。”² 简而言之,从这一观点来看,乔姆斯基学派所谓的“能力”,只不过是索绪尔所谓的语言(*langue*)的另外一种名称。³ 语言是一种“普遍性的财富”,是整个群体的集体财产。与此相对应,存在着语言能力,它或者是语言这种“财富”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积存”,或者表现为“语言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对这种公共利益的分享。这种词汇上的转换掩盖了一种虚设权(*fictio juris*),通过这种权力,乔姆斯基把合法话语的内在规律转化成了恰当语言实践的普遍规范,避开了关于合法能力之获得及市场之建立的经济与社

会条件的问题,而关于合法与非法的界定,正是在这种市场中得以确立并且得以强加的。⁴

官方语言与政治一体性

语言学家只不过是將一种预先建构好了的客体并入到他们的理论中来,从而忽略了关于这种建构的社会规律,掩盖了其社会起源。作为对这一点的例证,没有比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这一节更好的例子了。在此节中,他讨论了语言与空间的关系。⁵索绪尔力求证明,并不是空间界定了语言,而是语言界定了其空间。他注意到,无论方言还是语言,都没有自然的限度,通过那批愿意使自己成为其承载者的言说主体,语音创新(比如,用“s”代替拉丁文的“c”)靠其自主逻辑的固有力量的力量决定着其自身的传布范围。这种历史哲学使得语言的某种内在动力成为其传布限度的惟一原理,掩盖了特定的一体化的政治过程,通过这种政治过程,一批特定的“言说主体”实际上是受到诱导去接受官方语言的。

索绪尔的语言是一种既合法又可交流的代码,它能够独立于其使用者(“言说主体”)及其使用(言语)而存在与维持。这种语言实际上具有所有那些一般被归之于官方语言的特性。同方言相反,它得益于制度性的条件,这些条件对其普遍化的整理与强制推行来说乃是必需的。因此,它在一定政治权威的整个管辖范围内为人们所(或多或少地完全)了解与承认,反过来,它也有助于强化这种作为其支配性的源泉的权威。它是通过在“语言共同体”的所

有成员中保证最小的交流来实现这一点的。从布龙菲尔德^①以来,这种语言共同体被传统地定义为一个“使用同一语言符号系统的人群”⁶,这种最小的交流则是经济生产,乃至象征性支配的前提条件。

不经过进一步的具体化而谈论语言,就像语言学家们所做的那样,就意味着心照不宣地接受一个政治单位的官方语言的官方定义。在那个单位的区域限度内,这种语言把自己作为惟一合法的语言强加给整个人群,那些在法文里被描写为更官方的[*officielle*,此词是对于讲英语的语言学家们所使用的“formal”(官方的、正式的)一词的非常精确的翻译]⁷情境中尤为如此。它由那些拥有写作权威的著作者生产出来,由那些对这种语言的掌握同样负有反复灌输责任的语法学家和教师予以整理和固定下来。作为一种符码(cipher),这种语言使声音与意义之间建立起各种等价关系;作为一套规范系统,它调节着各种语言实践。从这两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代码(code)。

官方语言既在其发生方面,又在其社会使用方面,与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受官方语言支配的一体化语言市场得以建立的那些条件才被创造出来。在官方场合与官方场所(学校、公共行政机关、政治机构等)中,这种国家语言是必须使用的语言,因此,它就成为一种理论规范,一切语言实践都要接受其客观的衡量。不懂这些规则并不能成为借口;这种语言法

^① 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 - 1949),美国语言学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⁶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创始人,著有《语言论》等。——译者

则有其法官群体(语法学家)以及进行管理与推行的代理人(教师),他们被普遍赋予了权力,对言说主体的言语行为进行检验,并使之受到有关学术资质的法律认可。

为了使一种表达方式在其他表达方式中(在双语情形中的一种特定的语言,在分化为各阶层的社会中的一种特定的语言运用)把自己作为惟一的合法者予以强制推行,语言市场必须统一,(阶层、区域或族群方面的)不同方言必须受合法语言或用法的实际衡量。单一的“语言共同体”乃是政治支配的产物,这种政治支配由各种制度无休止地再生产出来,而这些制度则能够强加一种对于支配性语言的普遍认同。对于各种语言支配关系来说,向着单一的“语言共同体”的一体化乃是其得以建立的条件。

“标准的”语言:一种“被规范化了的”产物

在大规模的工业出现以前,不同的行业构成了马克思所谓的如此众多的分立的“圈地”,与此相似,直到 18 世纪以前,奥依语(*langue d'oïl*)^①的诸地方性变体在一个教区与另一个教区之间也各不相同。对于区域性的方言而言,今天的情形仍然如此,而且,就像方言学者的地图所显示的那样,音位学、词法学以及词汇学的特性是以各种模式分布的,这些模式从来就不是完全附加性的,它们只是通过很罕见的巧合才与宗教的或行政管理的边界相一致。⁸

^① 奥依(*oïl*)是中世纪法国卢瓦尔河以北地区的用语,表示“是”(即法文中的“*oui*”)的意思。奥依语即上述地区的方言。——译者

事实上,由于缺乏写作上的客观化,尤其是缺乏那种与官方语言的建立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准合法的编纂,“语言”仅以实践性的状态而存在,也就是说,仅以如此众多的语言惯习以及这些惯习的口头产物的形式而存在,这些惯习至少部分地被和谐地结合了起来。⁹ 只要一种语言仅仅被期望用来保证在那些来自相邻村落或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非常罕见的)接触中达成一种最小程度的相互理解,那么人们便会毫无任何疑问地使一种用法成为另外一种用法的规范(尽管存在下述事实,即人们所感知到的差异还可能作为一种借口,用来宣称一种用法比另外一种用法更优越)。

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前,语言统一的过程一直是与君主国家的建构过程携手并进的。“方言”(它们常常具有某些被归于“语言”的特性,因为它们当中大部分语言以书面的形式被人们用来记录协议,即地方性的联合备忘录等等。)和“文学语言”[比如奥克地区(*pays d'oc*)^①的诗话语言],就像那些迥异于在其流行的整个区域内所使用的每一种方言的人工语言一样,自14世纪以来,至少在奥依地区的中央各省内,逐渐让位于那种在巴黎有教养的圈子里发展起来的通用语言,这种通用语言在其被擢升至官方语言的地位之后,以一种由学者们所赋予它的形式,亦即书面应用的形式,为人们所使用。与此相关的是,地区性“方言”所遭受到的社会贬值使其产生了分

① 奥克(oc)是中世纪法国卢瓦尔河以南地区的用语,即“是”(同“oui”)的意思。奥克语指的是上述地区的方言,奥克地区即指上述地区。——译者

化(与其对书面形式的拒弃相关联)和内部瓦解(通过词汇与句法的借用),结果,所有的地区性的方言都被取代了,它们的通俗的与纯口头的运用退化成了土语(*patois*)。在被抛弃给农民之后,它们被加上了负面的和贬义的界定,与高贵的或文学的运用相对立。在其他许多例证中,关于这一点的一个标志就是指定给土语这一词语的意义的变化。它不再表示“难于理解的言说”,而开始指代“诸如普通人那样的污浊、粗俗的言说”[菲勒蒂埃词典,1690 (*Furetière's Dictionary*, 1690)]。

在奥克语(*langue d'oc*)的诸地区,语言情境就非常不同了。直到16世纪,随着一种与皇室权力相联系的行政管理组织的逐渐建立(包括大批下级行政管理机构、代理官员、监督官员、地方行政长官等的出现),巴黎方言才开始在法律文件中取代各种奥克语方言。无论是在行政、政治甚至是文学的文本中[在旧制度(*ancien régime*)^①期间,方言文学仍然继续存在],将法语强加作为官方语言并没有导致诸方言书面运用的完全废止,并且其口头运用也仍然居于优势地位。一种双语情境趋于产生。较低阶层,尤其是农民,被限制在地方性方言的范围内;而贵族、工商资产阶级,尤其是文人小资产阶级[确切地说,是指那些对阿贝·格雷瓜尔调查(*Abbé Grégoire's survey*)作出回应,并在不同程度上念过耶稣会大学(这些耶稣会大学是施行语言统一化的机构)的人]却远比前者更为经常性地拥有运用书面或口头的官方语言的机会,与此同时,他们还

① 旧制度,指法国1789年前的王朝。——译者

掌握着方言(这种方言在大多数私人性的甚至是公共性的情境中仍然使用),在这样的情境中,他们理所当然地履行着中介者的职能。

对于教士、学者或教师这些地方性资产阶级的成员来说,他们的地位来自他们对表达工具的掌握,他们可以从法国大革命的语言统一政策中获得一切。官方语言向国家语言地位的擢升赋予了他们那种事实上的对于政治,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对于同中央政府及其代表的交流的垄断,这种垄断界定出了在法兰西共和国之下的地方显贵人物。

同方言和土语相对,合法语言的强加乃是那种旨在通过对“新人”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使大革命的成果恒久化的政治策略的组成部分。孔狄亚克(Condillac)的理论把语言看成一种方法,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把革命语言与革命思想等同起来。要改革语言,使之去掉那些与旧社会联系着的用法,以净化了的形式将之强加于它,即意味着要强加一种其本身即要被剔除和净化的思想。如果把语言统一政策仅仅归为这块领土内不同部分之间进行交流的技术性需要,尤其是巴黎与外省间进行交流的技术性需要,或者把它看成意在摧毁“地方特征”的国家集权化的直接产物,这将是天真幼稚的。革命的知识精英的法语同土语之间的冲突乃是一种对象征性权力的争夺,其中,争夺的焦点在于对心智结构的形塑与重塑。简而言之,这不仅仅是一个交流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为一种新的权威语言争取认可的问题。这种对新权威语言的认可,包括对其新的政治词汇、进行讲说与谈论的术语、隐喻、委婉语及其所

表达的社会世界的表征的认可。由于这种新权威语言所表达的社会世界与新群体的新旨趣相联系,因此,它是无法用那些同农民群体的特定兴趣相联系的用法所塑造出来的地方习语来表达的。

因此,只有当人们对“民族”这一以法律为基础的完全抽象的群体的制造创造出新的用法和功能时,锤炼出一种标准的语言才成为绝对必要的行为。就像其要为之服务的官方用途那样,这种标准语言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也不具有个性特征。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它还肩负着使语言惯习产品规范化的使命。辞典就是关于这种编纂与规范化的劳动的典型结果。通过学术式的记录,这种辞典集合了在一定时间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全部语言学资源,特别是关于同一词语的所有可能的用法(或者关于同一意义的所有可能的表达法),把那些社会上不一致,甚至互相排斥的用法并置起来[其程度可以达到将那些超出可接受范围之外的用法标上一种表示排除的记号,诸如 *Obs.* (已废弃不用)、*Coll.* (俗语)或 *Sl.* (俚语)]。由此,它给出了如索绪尔所理解的那种相当确切的语言形象,即“个体语言宝库的总和”,这种形象被加以预置,以起到一种“普适性”代码的功能。被规范化了的语言能够不受压制地发挥其功能,且无需情境的帮助,而且,它适合于被任一发出者和接收者所传达与解码,而他们可能对彼此一无所知。因此,这种语言符合科层制政治的可预测性和可计算性的要求,这种可预测性和可计算性预设了普适性的办公人员与当事人的存在,他们只具有那些由对其地位的行政界定所指派给他们的身份,而没有任何

其他的性质。

在使一种官方语言得以建构、合法化和强加的过程中，教育制度起到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塑成了各种相似性，从这些相似性中，那种作为民族黏合剂的意识共同体得以产生。”乔治斯·戴维（Georges Davy）进一步阐述了学校教师的作用，他们是教授言语的教师，因而也是教授思考的教师：“按照其职能，他（小学教师）日复一日地同每一种思想和每一种情感的表达能力，即语言打交道。在其把同样清晰、确定的语言教给那些仅对之有模糊了解甚或讲说各种不同方言或方言土语的孩子时，他已经在使他们非常自然地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和感受事物了；因而，他所从事的乃是建造民族共同意识的活动。”¹⁰在涂尔干的意义上，作为一种“智力与道德整合”的工具，沃尔夫的语言理论^①——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将其称之为洪堡特语言理论¹¹——乃是这种教育观的基础，它与涂尔干学派的共识理论有着一种同源关系，这种同源关系还在“代码”（code）这一词语从法律向语言学的转换中^②显示了

① 沃尔夫的语言理论（the Whorfian theory of language）也叫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由萨丕尔（Sapir，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描写语言学派中观念主义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和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美国人类学家，担任过保险公司化学工程师，业余研究语言学，并且与萨丕尔一起创立了观念语言学派，提出语言相关性原理）提出。在他们之前，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说话者的语言通过语言系统中可能存在的语法范畴和语义分类，决定着说话者的世界观。这种语言系统是说话者同其本族文化一起继承下来的。他们还宣称，如果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只有部分一致的话，那么这些语言间的翻译就会受到严重的妨碍。这些观点与普适性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原则是相互对立的，后者强调，语法特征对所有语言来说都是共同的。——译者

② 英文单词“code”的法律学含义指“法典”、“法规”，其语言学含义则为“代码”、“密码”等，这里的转换即指“code”一词在这两种含义之间的转换。——译者

出来。与那种隐含着某种低等性的会话语言相对,书面语言被认同为正确的语言,而符号(cipher)则统治着书面语言。正是在“符号”的意义上,代码在教育制度中,且通过教育制度获得了法律的力量。¹²

在整个 19 世纪,教育制度的运作规模在范围和强度上都所有所增加¹³,毫无疑问,这直接有助于降低大众通俗性表达方式的價值,将其作为“俚语”和“无法了解的话”而予以摒弃(这一点可以从教师们对学生的作文所作的边注中看出来),并强加一种对于合法语言的认同。但是,毫无疑问,恰恰是学校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教育(与语言)市场的统一与劳动力市场的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使方言贬值以及建立新的语言实践等级的过程中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¹⁴其中,教育(与语言)市场的统一与在全国范围内对有效的教育资格证明的引进相联系,这种教育资格证明同其持有者的社会的或地区的特征无关(至少在官方是如此);而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则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文职公务机关的发展。为了诱使那些拥有被支配语言之能力的人们参与到对其表达工具的瓦解中来,比如说,出于或多或少要增加自己的孩子们在教育市场中的价值的明确意图,他们力图向他们的孩子们讲“法语”,或要求他们在家里讲“法语”,因此,就有必要把学校制度理解为跻身仕途地位的首选(实际上也是惟一的)途径,这种仕途地位在那些工业化发展程度最低的地区是更加具有吸引力的。这种各方面的情况复合在一起的情形,更常见于“方言”地区(法国东部除外),而不是法国北方的土语地区。

市场的统一与象征性支配

事实上,我们固然不能忘记,那种被语言学家们作为一种自然的事实而予以接受的政治上的统一意志(这种统一意志在其他场域,比如法律界,也很明显)对语言的建构所起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把它看成造成支配性语言的使用得以普及化的惟一因素。这种普及化乃是象征性商品市场的统一过程的一个维度,它伴随着经济的统一,还伴随着文化生产与流通的统一。这一点可以在婚姻交换市场的案例中清楚地看到。在婚姻交换的市场中,“产品”以前只在地方性市场的被保护起来的封闭性圈地进行流通,有其自身的价格形成规律;现在,由于支配性评价标准的普及以及“农民价值观”的信誉的丧失,导致农民的价值暴跌,而农民则常常被注定了要过独身禁欲的生活。在一切实践场域(体育运动、歌曲演唱、衣帽服饰、住房建筑等等)之中,都可以见到经济和文化商品的生产与流通的统一过程,这一过程使得惯习生产的早期模式以及惯习的产品逐渐退化。关于下面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即为什么如社会语言学家们所经常观察到的那样,妇女更倾向于采纳合法语言(或合法发音):因为她们既受制于劳动的性别分工,又被婚姻的逻辑所驱动,从而倾向于服从语言的主导性用法。劳动的性别分工使得她们在消费场域更为专长,而婚姻的逻辑即使不是她们实现社会攀升的惟一途径,也是其主要途径。从其入学伊始,妇女们便已预先倾向于接受象征性商品市场中的新需求。

因此,与市场的统一相伴随的支配性总是通过一整套特定的

制度与机制来施加其影响的。国家的特定语言政策,甚至压力群体^①的公开干预,仅构成了这套制度与机制的最为表层的方面。这些机制预设了政治或经济之统一的存在,并且反过来促进了对这种统一的强化,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要把官方语言的进展归因于合法或准合法的强制措施的直接效果。(这些措施所予以强加的最多只是合法语言的获得,而不是对合法语言的普遍运用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这种语言的自发性再生产。)就那些服从于象征性支配的人们而言,所有的象征性支配都预设了某种形式的同谋关系的存在,这种同谋关系既不是对外界强制措施的被动服从,也不是对价值观的自由信奉。对于官方语言合法性的认定,与一种公开宣称的、深思熟虑的并可放弃的信仰,或与对一种“规范”的有意识的接受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认定以一种实践的状态印刻在各种性情倾向之中。这些性情倾向经过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获得过程,被语言市场所调整,因而,它们无需任何愤世嫉俗的算计或者可以被人们的意识所体验到的强制就被加以调整了,使之适应于物质与象征性利润的机会,这种机会是由作为一个特定市场的特征的价格形成法则客观地提供给特定语言资本的拥有者的。¹⁵

确切地说,象征性支配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下面这一事实,即它在那些服从于这种象征性支配的人们当中塑造出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对通常的自由与强制的二分法提出了挑战。惯习的选择

① 压力群体(pressure group)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中为了影响政策或舆论而组织起来的群体。——译者

(比如,在合法言说者在场的情况下使用“标准的”小舌音“r”,而不使用卷舌音“r”)是通过性情倾向,在没有意识或强制的情况下实现的。尽管这些性情倾向无疑是社会决定论的产物,但它们也是在意识与强制的影响范围之外得以形成的。我们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就是把对原因的探求简化为对责任的求索,这种倾向使我们无法看到下面这一事实,即胁迫,这种并没有认识到它是什么(一定程度上,其并未隐含任何胁迫行为)的象征性暴力,只能被施加在一个(在其惯习中)先已安排好要感觉到它的人的身上,而其他人则会对之视而不见。下列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即造成这种胆怯的原因在于胁迫情境或胁迫者(他可能会否认自己具有任何胁迫意图)与被胁迫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与生产它们的各种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一点一点地将整个社会结构考虑进来。

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惯习的形成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并不是通过语言和意识,而是通过各种暗示被加以传递的。这些暗示被印刻在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情境以及实践的显然最不重要的方面之中。因而,实践的各种形式,如看、坐、立、静默甚或言说的方式(“责备的目光”或“口吻”、“不满的眼神”等等)都充满了各种禁令,这些禁令力量强大而不容置疑,无法确然地加以抗拒,因为它们是无声而隐秘、坚决而潜藏的。(正是这种秘密代码,在家庭单位所特有的危机中,例如在婚姻危机或者青少年危机中,受到了人们的公开谴责:在反叛暴力与引发这种暴力的原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失衡状况,这种失衡状况来源于下面这一事实,即那些最平淡的行动或言辞现在被从其所是的事物的角度来看待——被看

成禁令、胁迫、警告、恐吓——并由此而遭受到谴责，而且，因为它们继续隐含在意识的水平之下，并且在其所引起的反抗行为之下起作用，所以这种谴责也就益发强烈。)暗示的权力是通过事物和人来施加影响的；而且，它并不告诉孩子必须做什么，而是通过告诉他他是什么，从而引导他最终成为他所必须要做的那种人。暗示的权力乃是一切象征性权力发挥效力的条件，在获得这种暗示的权力之后，各种象征性权力便能通过一种被预先安排好要对其作出反应的惯习来起作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是这样的：其中一个人只是在要对另外一个人强加影响时才出现，他甚至不必出现，更不用说明发出任何指令了。这种指令乃是对于情境及其自身的一种界定(比如，受到胁迫)。由于不必陈明，这种指令就益发绝对和无可置疑。

被这种无声的、看不见的暴力所压榨出来的认同表现在明晰的陈述中，比如那些使得拉波夫(Labov)能够对如下这点加以确认的陈述，即人们可以在那些来自不同阶层，因而在其对“r”这一音素的实际生产方面也不相同的言说者中，发现对音素“r”的相同的评价。但是，这种认可从来没有像其在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言说者对自己的言语行为所做的一切校正(不管这种校正是特殊的还是永久性的)，或在由此产生的混乱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在其绝望地力求对自己的言语行为加以校正时，那些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言说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其发音中被刻上烙印的方面，即其措辞(包括各种形式的委婉语)和句法进行了各种校正；而由此所产生的混乱则使其说不出话、结结巴巴、不知道说些什么，仿佛他们突然被剥夺了其原本的语言。¹⁶

区分性的偏离与社会价值

因此,如果一个人既没有认识到那种客观来说同语言的合法使用正符合的特殊价值,也没有认识到这种特权的社会基础,他就会不可避免地落入到两种相互对立的错误中去。他要么无意识地把那种客观来说原本是相对性的,而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是主观任意的,也就是那种支配性的用法,予以了绝对化,而不能跳出语言本身的特征——比如其句法结构的复杂性等等——之外来看问题,从而将那些与其相符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在教育市场中与其相符的价值观念)的根基识别出来;要么就是,虽然避免了这种形式的拜物教,却不过是落入到了学究式相对论的着实天真的境地之中。后者忘记了,天真的凝视并非就是相对论,对支配性用法进行主观任意的相对化,忽略了合法性这一事实:支配性用法乃是被社会承认为合法的,而且,给予这种合法性以承认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占有支配地位的人。

要在学术话语中再生产出实际上发生在社会中的、对合法语言的膜拜,只要仿效巴塞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例子就可以了。他在没有把这种社会产品与其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情况下,或者甚至,就如我们可以从教育社会学所推算到的,与其学术条件联系起来考虑的情况下,对“精致符码”(elaborated code)的属性作了一番描述。如此,“精致符码”就被建构为当时仅能以关于剥夺之逻辑的术语来构

想的所有语言学实践的绝对标准。相反地,对通俗的和有教育的用法中来源于其客观关联以及来源于阶级之间支配关系的结构——它们以自身的逻辑不断再生产——的东西的无知,导致了诸如被支配阶级的“语言”的神圣化。拉波夫反对理论家们的剥夺,致力于为“通俗言语”争取资格,这一倾向导致他把中产阶级青少年的啰唆和浮夸的赘语与来自黑人居住区的黑人孩子的准确与简洁的用语拿来相互比较。这就忽视了一个事实,如他自己所示(以近期移民极其严肃地评判不正规的口音——包括他们自己的口音——为例),即语言“规范”被强加于同一“语言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之上,而这在教育市场和所有把啰唆看作礼仪上必要的正规场合中尤为如此。

政治统一以及与其相伴的官方语言的强加,在同一语言的不同运用法之间确立了一种关联,这种同一语言的不同运用法,与由独立的政治和经济群体所讲出来的彼此区别的语言,在理论关系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例如在索绪尔举来作为符号的任意性基础的例子的“*mouton*”(法语“羊”)和“*sheep*”(英语“羊”)之间的区别]^①。所有语言实践都按照合法的实践来予以衡量,即按照那些占据支配地位的人的实践来衡量。客观地指定给不同言说者之语言产品的

① 英语中的“*sheep*”和法语中的“*mouton*”都可以用来指“羊”,可是法语“*mouton*”同时还指“羊肉”,而英语的“羊肉”却是另外一个词“*mutton*”,因此这两个词语在各自系统里的价值是不同的。由此可见符号(语言单位)具有一种任意性,即其所指的并非是预先规定的,而是由语言系统即关系和地位所产生的,索绪尔举这一例子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译者

可能价值,和由此指定给他们每个人可能拥有的、与语言相关的可能价值,以及由此与他们自己的产品之间关系的可能价值,实际上都是在竞争的变量系统内界定的;只要建构的语言市场的超语言条件得到满足,这一系统就能确实地建立起来。

因此,例如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语言区别,就不再是无法比较的特殊论了。实际上按照单一的“普通”语言的标准来衡量,它们被认为是不合格的,被投入到了地方主义的黑暗的外层之中,并且被学校校长们贬斥为“讹误的表达和错误的发音”。¹⁷在被降格为古怪的或者粗俗的行话土语的状态——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都不适合正式场合——的过程中,官方语言的通俗用法经历着系统性的贬值。一种同语言学相关的(linguistically pertinent)语言对照系统得以建立起来,它与同社会学相关的(sociologically pertinent)语言对照系统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换句话说,从话语多样性的对立中产生的区别,不能被简化为那些由语言学家按照其自己的相关标准建构起来的区分。无论不易改变的语言功能占有多大的比例,在发音、措辞乃至语法的范围内,都仍然存在着整个系列的与社会区别密切相关的区别,这种社会区别虽然为语言学家所忽视,但是在社会学家的观点来看它们是相关的,因为它们从属于一个语言对立项的系统,这是对社会差别系统的再翻译。由索绪尔所引入,但是与他所强加的抽象性相对立而建构的关于语言的结构社会学,必须以此作为其研究对象,即与社会学相关的语言差别的结构化系统与同样结构化了的社会差别的系统之间的关系。

应当把语言的社会用途的特殊社会价值归功于这一事实,即

它们趋向于被组织到差别(在韵律与发音之间、在词汇与句法之间的差别)的系统之中,这种系统按照区别性偏离的象征性秩序,再生产了社会差别的系统。讲话就是要占用一种或另一种表达风格,这种表达风格通过使用而得以建构起来,并且以其在风格的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为客观标志,而风格的等级制度则显示了相应的社会群体的等级。这些风格,这些既进行分类又被分类、既划分等级又被划分等级的关于差别的系统,成为占用它们的人们的标志。自发的风格学带着将这两种区别秩序视为等值的实践感,透过以风格为标志的阶级来理解社会阶级。

为了建构“普通”语言这种人造物,语言学家以牺牲具有重要社会学意义的变量为代价来强调与语言学相关的恒量,他们认为,实际上是普遍性的说话能力似乎能够等同于实现这种自然能力的由社会所限制的方式,而有多少获得它的社会条件,这种方式就会呈现出多少变体。具有充分的、能够造出有可能被听懂的句子能力,并不一定就能造出有可能被倾听、有可能被认同为在所有其有机会讲话的场合中都可被接受的句子。同样,在这里,社会可接受性不能被简化为单纯的合乎语法性。缺乏合法能力的言说者实际上被排除在要求这种能力的社会场域之外,或者被注定了要保持沉默。于是,所稀缺的并不是讲话的能力——这种能力作为我们生理继承物的一部分,是普遍的并且因此基本上是非特殊的¹⁸——而是为了讲出合法语言所必需的能力,这种合法语言依赖于社会继承,它把社会区分性转译为关于区别性偏离的具体的象征性逻辑,或者简而言之,区分。¹⁹

一个语言市场的建构为客观竞争创造了条件,由此,合法性的

能力可以作为语言资本发挥作用,而在每一个社会交换的情形中都创造出区分的利润。由于它部分源自产品(以及相关能力)的稀缺,所以这种利润并不仅仅与训练成本相关。

训练成本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在社会性方面是中性的概念。从某种程度——这种程度随着国家教育传统,我们所讨论的历史时期以及学术律令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上说,它所包括的花费,可能远远大于为确保严格界定的能力的传递而要求的“技术”花费的最小值(如果它真的有可能给训练——这种训练是完成某种功能所必需的,并且是足够的——以及功能自身以一个纯技术的定义,那么千万不要忘记,“角色距离”,即与功能之间的距离,是随个人沿着功能的等级制度的上升而愈益进入关于功能的定义之中的)。在一些情况中,例如学习的持久性(这为训练的经济成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尺度)趋向于独立于它所创造的结果,而按照其自身被评价(在“精英学校”中鼓励一种在纯然的课程尺度内的竞争)。在另一些情况中——这并非是互相排斥的两种选择——通过训练所获得的能力的社会品质,反映在实践的象征性形态中,即操作技术行为的方式和运用能力的方式,看上去是与其获得的缓慢性不可分割的:短期的或者“突击的”课程总是被怀疑在其产品上留下了“填鸭”的标记,或者是“速成”的烙印。这种对训练(即对时间)的炫耀性消费,一种满足了合法化的社会功能的明显技术浪费,被纳入到了能力的价值当中,而这种能力是由社会所赋予的,并且是由社会作保证

的(在今天看来,就是个人由教育系统所“认证”)。

鉴于区分的利润源自这一事实,即,与既定水平的语言(或者更通常地,文化)资格相对应的产品(或者言说者)的供给水平,低于另外一种情况下的供给水平,这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所有的言说者都同最稀有能力的拥有者一样,可以在同等的程度上得益于合法能力的获得条件,²⁰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区分的利润是作为言说者获得这些条件之机会的功能而分配的,也就是说,是作为言说者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功能而分配的。

除去某些特定的现象之外,我们再也无法进一步脱离索绪尔派的语言人(*homo linguisticus*)的模型了。这些语言人,就如瓦尔拉学派(Walrasian)^①传统中的经济主体一样,在其口语生产的形式中可以随心所欲(例如可以自由地说“tat”以替代“hat”,就像孩子们一样),却仍然能够被听懂。但是他们也仅是在遵守共通代码原则的条件下才能够进行交换和交流。如不久将更清楚地显示出来的那样,这一市场,这一仅仅被设定为能动者——这些能动者是可以彼此互换的,就如他们交换的产品和交换的“环境”一样,并且他们同样都受信息效率最大化原则(类似于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影响——之间单纯

① 瓦尔拉(Marie Esprit Léon Walras, 1834—1910),法国经济学家,瑞士洛桑大学教授,洛桑学派和数理学派的创始人,与奥地利门格尔、英国杰文斯大致同时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说;首创一般均衡理论。主要著作有《纯粹经济学要义》、《社会财富的数学理论》等。——译者

的、完全的竞争的市场,与真实的语言市场之间的距离,就像经济学家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与真实的、存在着垄断和供应垄断的市场之间的距离一样遥远。

附加于独特的稀有性所具有的特殊影响之上的是这一事实,即由于语言的差异系统与经济和社会的差异系统之间所具有的关联,我们要处理的不仅仅是一个能够彼此相对化的、关于差异资本的相对论性质的世界,而且还有与言语形式——被(实际)作为合法化的东西,即作为衡量语言产品之价值的标准尺度而被普遍承认的言语形式——相关的,关于偏离的等级化了的世界。仅仅在持续满足了某些特定条件(在市场的统一性以及在对合法能力的生产手段和表达的合法地点的获得机会上存在着不平均分配的时候)的范围内,支配性的能力才能够作为语言资本而发挥作用,并且在它与其他能力的关系中确保区分的利润;由此使得拥有这种能力的群体能够在正式市场中(时尚的、教育的、政治的和管理的市场),以及在大部分他们所参与的语言交换中,把它作为惟一合法的资本而强行施加。²¹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那些努力要保卫受到威胁的语言资本——例如当今法国关于经典语言的知识——的人们,不得进行一场全面的斗争。不保卫市场,换句话说,就是不保生产者与消费者进行生产的整套政治和社会条件,就无法保持这种能力的价值。拉丁语或者在其他情形中的法语或者阿拉伯语的保卫者们经常表示,似乎他们所钟情的语言,出于例如其“逻辑”品质等内在的原因,在市场之外还能具有某些价值;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在保

卫市场。教育系统给予不同语言(或者不同的文化内容)的地位成为如此重要的一个话题,这仅仅是因为,作为研究机构,它们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大规模生产中处于垄断性的地位,并且因此,它们在该市场的再生产中占据垄断地位,而如果没有这一市场,这种语言能力的社会价值、其作为语言资格发挥作用的能力,将不复存在。

文学场域与为了获得语言学权威的斗争

这样,通过语言学场域的结构——这种结构,在设想当中,是基于语言资本(或者换一种说法,吸收客体化的语言资源的机会)的不平均分布之上的,是关于特定的语言权力关系的系统——这一媒介,表达风格的空间结构按照其自己的方式再生产了差异的结构,而正是这种差异的结构客观地分割了存在的状况。为了充分理解这一场域的结构,尤其是在语言生产的场域之中那些其生产被限制了亚场域的存在(这种亚场域的根本属性源自这一事实,即其中的生产者,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为了其他生产者而进行生产的),有必要在以下两点之间作出区分:一方面是或多或少合法的普通言语的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另一方面是生产值得出版发行,即值得出版正式化的书面话语所需要的表达工具(以对图书馆中的以客体化形式积存的资源,例如书籍,尤其是“经典著作”、语法书和词典的挪用为先决条件)的资本。这种生产工具的生产,例如修辞手段、流派、合法的风格方式,以及更为通常地,所有注定为“权威性的”并且被作为“妙用”的范例而被引用的格式,

把一种凌驾于语言之上，并且由此而凌驾于语言的一般使用者及其资本之上的权力，授予那些致力于此的人们。

合法语言自身并不包括那种能够确保其在时间中之永恒性的权力，就如它不具有那种界定它在空间中的扩展的权力一样。只有发生在不同权威之间的永无休止的斗争之中的连续不断的创造过程（这些权威，在专门的生产场域内，为了获得对强加合法表达方式的垄断权而彼此竞争），才能确保合法语言及其价值（也就是赋予它的认可）的永久性。这是场域的一般属性之一，即为了特定的赌注而进行的斗争掩盖了对游戏潜在规则的客观共谋。更为准确地说，斗争趋向于通过再生产——首要的是在那些直接卷入其中的人们当中，但又并非仅仅是在他们当中——对游戏及其赌注的价值的实践性信奉，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游戏及其赌注，因为正是这种实践性的信奉界定了对合法性的认可。如果我们开始争论的不再是这位或者那位作者的风格的价值，而是这种关于风格的争论的价值时，文学世界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当人们开始怀疑蛋糕是否值得为其配上蜡烛时，游戏就结束了。作家们之间关于写作的合法艺术的斗争，正是通过这种斗争的存在本身，既促进了合法语言——按照其与“通用的”语言之间的距离来界定的——的生产，又促进了对其合法性的信仰的生产。

作家、语言学家和教师们，以其个人能力，有可能施加于语言之上的权力，并非是象征性权力的问题；而且毫无疑问，这种权力将比他们能够施加于文化之上的权力（例如，通过强加一种可能改变“市场状况”的合法文学的新定义）有限得多。

其实,这是他们独立于任何对区分的有意追求,而对一种独特的语言的生产、神圣化和强加所做贡献的问题。在集体劳动之中,也就是在那种通过斗争——为了贺拉斯^①所谓的仲裁、公正与规范的语言而进行的斗争——而追寻的集体劳动之中,作家,也就是具有或多或少权威的作者,不得不认真考虑语法学家的意见,因为后者拥有对合法的作家与合法的作品予以神圣化和法则化的垄断权。语法学家们,通过从所提供的产品中选择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神圣化,值得通过教育灌输汇总入合法能力之中的东西,并且为了这一目的,使它们承受正规化和规则化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目的是有意识地使它们成为可吸收的,并且因此是易于再生产的——而在建构合法语言的工作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至于语法学家自己,他们有可能在已有建树的作家和学术界当中找到联盟,而且他们还具有建立规范和强行施加规范的权力,倾向于通过将语言的某种特定用法合理化,并且“给予其合理的理由”,从而使这种用法得以神圣化和典范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通过为可以接受的发音、词汇或者表达的场域划定界限,以及确定一种已经审查和清理了所有通俗用法的语言,尤其是最新近的那些,语言学家们帮助确定了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产品在不同市场上将会得到的价值。

与权威之间不同权力关系的构造相对应的各种变化——

^① 贺拉斯(Horace Mann, 1769—1859)美国教育活动家。1843年赴欧洲考察教育,把裴斯泰洛齐的教学法介绍到美国。推广公共学校制度,有“美国公共教育之父”之称。——译者

这些权威由于赞赏大相迥异的合法准则，而在文学生产场域中不断地彼此冲突——不能够掩盖结构的恒定性，这种恒定性在最为多样的历史情况中，迫使倡议者（这些倡议者的目的是宣称并且使自己具有对语言的立法权并且使这种权力合法化，同时还要驳斥对手的要求）退至同样的策略和同样的争论。这样，在反对高等社会的“优雅风格”和作家自称拥有良好天赋的艺术声明时，语法学家总是援引“合理的用法”，即来自对构成语法的“理性”和“品位”的原则知识的“对语言的感觉”。相反，作家——其主张在浪漫主义时期最为自信地表达了出来——则乞灵于天赋而非规则，并且嘲笑那些被雨果蔑视地称为“语法主义者”的清规戒律。²²

任何一个致力于文学斗争的行动者可能永远都不会去考虑被支配阶级的客观剥夺（当然，总会有一些作家，例如雨果，宣称要“改革词典”，或者寻求模仿通俗言语）。但是这一事实仍然存在，即，这种剥夺是与职业人员群体的存在不可分割的。这些职业人员客观上具有对合法语言的合法使用的垄断权，他们为自己的使用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特殊的语言在阶级之间的关系中，以及在他们对语言王国所发动的斗争中，预先倾向于完成——作为副产·品——一种区分的社会功能。更进一步，它并非是与教育系统的存在毫无关联的；而教育系统则肩负着以语法的名义审核异端产品和灌输阻碍进化法则之影响的特定标准的责任，仅仅通过灌输，它便使支配性用法作为惟一合法的用法而得以神圣化，从而在把语言的被支配用法建构为如此的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

是如果我们把艺术家或者教师的行为直接与它客观上形成的影响——即由文人语言的存在所导致的普通语言的贬值——联系起来，很显然就会漏掉最根本的一点：那些在文学场域里发挥作用的人们，之所以有助于象征性支配，仅仅是因为这一事实，即他们在场域里的位置以及与这种位置相关的利益，驱使他们去追逐一些外在的效应，这些效应不应他们自己和其他人所识，它们是这一误识的副产品。

标志着语言之优秀特征的属性，可以归纳为两个词语：区分与正确。文学场域所做的工作，通过诉诸一系列的派生做法——其基本准则从最常用的即“共通的”、“普通的”、“粗俗的”用法中进行派生——创造出一种初始语言的表面现象。价值总是来自派生，无论是否是有意的，是相对于那些最广泛的用法——“普通之处”、“平常感觉”、“琐屑的”短语、“粗俗的”表达、“流畅的”文体——的派生。²³在语言的使用中，就如在生活方式中一样，所有定义都是相对的。“讲究的”、“精选的”、“雕琢的”、“缥缈的”、“华丽的”或者是“卓然不同的”语言，包含着对另外一些如“平常”、“日常”、“普通”、“口头”、“会话”、“随便的语言”以及此外如“通俗的”、“原始的”、“粗野的”、“粗俗的”、“无条理的”、“松散的”、“微不足道的”、“笨拙的”语言（更不用说那些无法言喻的“唧唧咕咕”、“混杂语”或者“俚语”了）的否定性指涉（用来称呼它的词语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产生了上述一系列词组的那些对立，由于来自合法语言，因而是按照处于支配地位的使用者的观点来组织的，它们可以简化为两组对立：“独特的”与“庸俗的”（或“稀有的”与“平常的”）之间的对立，以及“紧张的”（或“持续的”）与“放松的”（或“松弛的”）之

间的对立；它们无疑代表了那种最初的、非常普遍的对立的特定的语言学版本。看来，隐藏于阶级语言等级之后的准则，无非就是它们所展示的控制的程度，以及它们所假设的正确性的强度。

依此类推，合法语言是一种半人工化的语言，它必须由持久的校正努力来维持，而这一任务就同时落在言说者个人，以及专门为此而设计的制度身上了。通过语法学家不断地确定和规范合法的用法，通过教师以无数的校正行为推行和灌输它，教育系统趋向于——在这一场域中如在其他地方一样——生产出对它自己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也就是对校正劳动和校正工具的需求。²⁴合法语言在时间上(或空间上)的(相对)连贯性来自这一事实，即它不断地得到延长的灌输劳动的保护，这种保护是针对着对努力和紧张的节省倾向的，而这种节省则导致了，比如说，类推的简单化(ana-logical simplification)(例如法语中的不规则动词——用“vous faites”和“vous dites”代替“vous faites”和“vous dites”)。更有甚者，正确的也即校正过的表达，其社会属性的根本部分来自这一事实，即它只能由对学术规则拥有实践性的掌握能力的言说者所生产；而这种学术规则是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化程序精确地建构起来的，并且是通过教师的工作而被生动地灌输的。事实上，所有制度化的教学法的两难处境就在于，其目标是把那些原则，即由语法学家们通过回顾性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劳动从专业人员书面表达(过去的)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那些原则，牢固地树立为在实践状态中发挥作用的图式。“正确的用法”乃是一种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是一种合成的语法——这里的“语法”一词是精确地(但并非如语言学家对这一词语的使用一样严谨)以其学术规则系统的真实含义而使用

的——从已表述过的话语中追溯既往,并且为即将表达的话语确立了必须遵守的规范。因此,除非我们不仅考虑到文人语言及其语法生产的社会条件,而且还把这种学术规范作为言语生产和评估的准则得以强加和灌输的社会条件纳入考虑,否则我们就不能充分解释合法语言的属性和社会影响。²⁵

语言学场域的动力学

语言学资本的传递法则是文化资本在代别之间合法传递法则的一个特例,由此就可以断定,由学院标准衡量的语言能力,像文化资本的其他方面一样,依赖于(按照所取得的资格来衡量)教育水平和社会轨道。这是因为,对合法语言的掌握可以通过熟悉化来获得,即通过或多或少延长受合法语言熏陶的时间,或者通过对明确的规则——与获得方式的类别相对应的表达方式的主要类别,换句话说,是与生产合法能力的两种主要因素(即家庭与教育系统)之间结合的不同形式相应的表达方式的主要类别——的有意灌输来获得。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语言社会学,就像文化社会学一样,从逻辑上来说是与教育社会学不可分割的。作为一个严格地受合法文化的护卫者裁决的语言市场,教育市场严格地受支配性阶级的语言产品的支配,并且趋向于支持在资本方面先已存在的区别。低弱的文化资本和与之相伴的并不试图通过教育投资来提高它的倾向,其联合影响注定了不具备优势

的阶级要受到学院市场的否定性裁决,即由缺乏成功而导致的排斥或者早期的自我排斥。因此,由于灌输的时间长度趋向于按照其效率而有所不同,所以最初的悬殊趋向于被再生产出来:那些最难于并且最不能接受和采纳学校语言的人,也就是那些受这种语言以及受教育的告诫、校正和认可时间最短的人。

假定教育系统拥有获得了授权的权威,这种权威是致力于在语言方面持久灌输的一般过程所必需的,并且假定它的这种灌输的强度和持久性倾向与言说者所继承的文化资本成正比例变化,由此就可以推断出,文化传播的社会机制趋向于再生产那种结构失衡,即在非常不平均分布的关于合法语言的知识,与对这一语言更加统一的认识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这种失衡在语言场域的动力学中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并且由此在语言变化中也是如此。作为这些变化的最终源泉的语言斗争,以言说者实际上对权威的用法有同样的认可但是对这一用法的知识却非常不一样为先决条件。因此,如果小资产阶级的语言策略,尤其是其刻意校正的趋势——即“文化善意”的典型表示,在所有实践场域中都有很明显表现——有时被看作语言变化中的主要因素,这是因为,在知识与认可,在渴望与满足这些渴望的手段之间的失衡,一种引发了紧张与矫饰的失衡,在社会空间的中间区域中最为显著。这种矫饰,一种正是在通过占用它来否定它的努力中所揭示出来的对区分的认识,把一种永久的压力引进到了竞争的场域之中,而这不可避免地,为那些拥有被社会认同为有杰出的独特性标志的人引入了新的区分策

略。

小资产阶级的刻意校正从最被神圣化的合法用法的仲裁者——院士、语法学家、教师——中寻求典范和校正工具,这种校正按照与通俗的“粗俗性”和资产阶级的“独特性”之间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得到界定。因此,这种(对资产阶级的)同化努力以及同时的(对于较低阶级的)异化努力对语言的变化所做的贡献,要比它从较少能力的语言拥有者那里所引发的异化策略明显得多。对小资产阶级言说者的努力与语言紧张的最明显标志的有意无意的回避(例如,在法国与旧式校长相联系的去历史性的口语用法),可以导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走向有控制的刻意校正,这种校正把自信的放松与对学究式准则的傲慢在最危险境地所展示出的从容联结在一起。²⁶在一般的言说者趋于放松的时候表现出紧张,在他们流露出费力的地方表现出轻巧,紧张中的放松是与小资产阶级或通俗的紧张与放松绝对不同的:这些就是所有通过不断的价值颠倒而引起的无休止的讲究的区分策略(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无意识的),而这种价值颠倒则倾向于阻止对语言风格的非相关属性的追求。

这样,为了解释可以在美国和法国同时观察到的知识分子所采用的新的讲话风格——一种有些迟疑,甚至犹豫畏缩的、疑问的方式(“不是吗?”、“是吗?”、“好吗?”,等等)——我们必须考虑到整体的用法结构(structure of usages),因为这种讲话的风格是相对于这种用法结构而有所区别地界定的。一方面存在着一种与被贬值的职业角色形象相伴随的旧的学

院派方式(伴随法国较长时期存在的不完善的虚拟语气表达法等);另一方面是由更广泛的学术用法的扩展所导致的,其范围从“自由的”用法——一种趋向于成为小资产阶级新特征的紧张与放松的混合体——到一种过分提炼的言语的刻意校正(这种言语形式立即被那种太显而易见的、作为小资产阶级向上流动的标志的野心所贬值了)的小资产阶级的新用法。

这些区分的实践仅在其与可能的实践场域相联时才能得到理解,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实践必须被追踪到一种有意识地使自己与之不同的想法。所有的理由都可以使我们相信,它们根植于独特性标志(语言的或其他的)的稀缺以及这种标志随着时间而进化的实践意义之中。通俗化的词语丧失了歧视的权力(discriminatory power)^①,并且因此趋向于被看作在本质上是平庸、普通和容易得到的——或者(鉴于扩展是与时间相关的)被看作陈词滥调的。无疑,正是由于反复接触的厌倦与稀缺感的结合,共同导致了向着更为“突出的”风格特征或者朝向共通特征之稀有用法的无意识的转移。

因此,区分性的偏离就是那种虽然意图废除这些偏离,但实际上却倾向于再生产它们(这是一种两难困境,但是当我们一旦认识到恒定状态有可能预设了变化时,就丝毫不会感觉奇怪了)的无休止运动的驱动力。支撑着语言之不同用法的变化的同化和异化

^① “歧视”在经济学中是一个常用的术语,用来表示差别对待的意思,例如价格歧视等等。在此处“歧视权力”一词是指具有独特性的词语能够获得差别利润,而已经通俗化的词语则丧失了这种权力。——译者

策略,不但不会影响语言的不同用法的分布结构,而且依此类推,也不会影响关于独特偏离的(表达风格)系统的系统(正是在这一系统中,那些用法在其中得以表现出来),而且它们还趋向于再生产它(尽管是以一种表面上不同的形式)。鉴于变化的原动力恰恰是整个语言场域,或者更为精确地说,是在建构这一场域的竞争性关系的系统中不断地被引发出来的整个系列的行为与反应,所以这种恒久运动的中心在所有地方,同时又不在任何地方。那些仍旧停留于文化扩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基于“两步流动(two-step flow)”或“向下流(trickle-down)”的水力学设想的基础之上的——之中,并且仍旧坚持要在语言学场域中给变化原则确定一个明确的位置的人们,将总是会大失所望。被描述为扩散现象的东西,无非就是由竞争性斗争所导致的一个过程,这种斗争通过无数的同化和异化策略(分别与那些在社会空间和时间中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的人相对),使每个能动者不断地改变其真实属性(这里指发音、措辞、句法手段,等等),而同时,恰恰是通过参加这一赛跑才保持了支撑这一赛跑的差别性。当人们知道了这一点,即寻求改变它的策略的逻辑与目的为结构自身所控制——这种控制是通过完成策略的能动者在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来实现的——时,合法语言之运用的社会价值所具有的这种结构的持续性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互动论者”的探讨,由于没能超越在直接可见的直接性中来理解行为与反应,当然不能够发现,不同能动者的语言学策略是严格地依赖于他们在语言学资本分布结构中的位置的;而这种位置,又反过来通过获准进入教育系统的机会结构,依赖于阶级关系的结构。因此,互动论根本不了解这种深层次的机制,而正是

48 言语意味着什么

这种机制,通过表面的改变,趋向于再生产出关于各种区分性偏离的结构,并且趋向于使那些拥有稀缺的并且因此也是拥有独特能力的人,维持其利润的自然增长。

2. 价格形成与利润预期

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的力量,或许是出于每一位被征询意见的要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可以控制全局——都具有的从容美德,德·诺尔普瓦先生(M. de Norpois)向后靠在椅背上,任由谈话者处于紧张局促的状态之中。或许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头颅(尽管长了络腮胡,他仍自认为是希腊式的)的突出优点,当聆听事情的原委时,他始终面无表情,冷漠得让人感觉像是在博物馆里一座经典的(也是聋的)雕塑前讲话。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①

语言交换——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建立于编码与解码的基础之上,且因此依靠一定规则或创造力以进行的一种交流关系——也是一种经济交换。它形成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或者市场)之间一种特定的象征性权力关系中,其中生产者被赋予了一定的语言资本,而消费者,则有能力和获得一定的物质的或者象征性的利润。换句话说,言说并不仅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译的符号(除了在特别的情

^①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国作家,《追忆逝水年华》是其最主要的代表作,共七部,主要反映法国贵族沙龙的生活,描写主人公的潜意识活动,对现代欧美文学有很大影响。——译者

形中)；他们还是财富的符号，意欲被评价和赞美；也是权威的符号，意欲被相信和遵从。与文学(尤其是诗歌)中语言的运用大相径庭，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很少被作为单纯的交流工具。对于信息最大效率的追求仅在例外情况下是语言生产的惟一目标，并且它所暗含的这种对语言的明确的工具性使用，往往与对象征性利润的下意识追求相冲突。因为除了明确表达出的信息之外，不可避免地，语言实践还在交流着关于交往态度或曰表达风格的信息，而这种表达风格，若参照理论的或实践的竞争风格来看待和理解的话，则具有着社会价值和象征的有效性。

资本、市场与价格

言说只有在与市场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一市场则以特殊的价格形成规律为其特征。言说的价值取决于言说者语言能力之间所固有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既可以理解为他们的生产能力，也可以理解为他们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换句话说，言说的价值取决于交换关系中所涉及的各不同主体是否具有将最有利于自己的欣赏准则强加于其他主体之上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语言本身。显然，语言能力(作为被社会界定了的生产能力，它形成了由社会界定的各语言生产群体的特征；而作为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它界定了其自身带有社会烙印的市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确定特殊的交换行为中价格的形成规律。但是语言的权力关系并非完全是由占主流地位的语言力

量所单独决定的；它还与所讲语言自身的特点、使用这种语言的言说者、各不同群体对该语言的相应掌握水平有关，整个社会结构在此（因而也在言说话语的过程中）相互作用。这正是为互动论者的眼光所忽视了的一点。互动论者把互动看成一个封闭的世界，而忘记了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是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还是在殖民时期的讲法语者与讲阿拉伯语者之间，或者是在后殖民主义时期的前殖民国家的一个讲阿拉伯语的成员和一个讲法语的成员之间。互动论者的这种看法，从相应的语言或用法，以及讲这些语言的群体之间的客观关系中，推导出了言说的具体形式。

关注于要回到事物本身，并取得对“事实”更为确切的把握（这一关注常引起对微观社会学项目的研究兴趣），只能使人纯粹而简单地错过“事实”，因为事实常常存在于结构之中，并且这种结构超越了其所揭示的相互作用，因而并不会为直接的直觉所认知。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屈尊策略（strategies of condescension）所提供之例了。一份在贝阿恩省（法国西南部的一个省）发行的报纸描述道，波市的市长在一次纪念贝阿恩语诗人的庆典上，对与会的群众用贝阿恩语发表了讲话，“听众被这种体贴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¹。要使母语为贝阿恩语的听众感觉市长用贝阿恩语发表讲话是一种体贴的举动，大家必须默认，法语是正式场合发表正式讲话的惟一可接受的语言。屈尊策略正是从在实践当中共同存在的各种语言（甚至或尤其是当法语空缺时）之间客观存在的语言权力关系中，通过象征性地排除这一权力关系（也就是语言之间的等级制度与讲这些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等级制度）而获得利润。只要在场

的人们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异(或者说是他们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异)已经为所有人(尤其是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们,包括参与者与旁观者)充分理解和认同,那么象征性地排除这种等级制度(例如通过使用“平易近人的方式”),就能使言说者获得一种来源于未被解除的等级关系以及来源于明确地象征性地排除这一等级关系的双重利润——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利润是通过加强等级关系获得的,尽管利用这种等级关系与社会认可是相一致的。事实上,作为贝阿恩人的市长能够取得这种屈尊的效果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大城市的市长,除了他所表现出的从容自信之外,他还具有所需的头衔(他具有教授资格)以确保他是理所当然的“高级”语言的“高级”使用者(没有人,尤其不会有省报的记者,会想到要像称赞市长的贝阿恩语一样称赞他的法语;因为按照其职务,他被认定就应当是一个合格的、被获准的、能够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法语的人)。被称赞为“标准流利的贝阿恩语”必须是出自合法语言的合法言说者之口;否则就会被认为完全是毫无价值的——并且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正式场合里这是不可能的——譬如从一个农民口中说出,譬如他为了解释为什么尽管他获得了较大份额的选票,但他并不曾梦想成为村里的村长,说(用法语)他“不懂得如何讲话(指法语)”。这就揭示出对于语言能力的定义完全是社会性的。由此还可以看出,在语言场域,以及在文化场域,要推翻现存的等级制度的策略也与屈尊策略相类似,这是那些对自己在现存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充分自信的人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否定这种等级制度,同时又不会显得无知或没有能力满足制度的要求。假如贝阿

恩语[或者其他如克里奥尔语(Creole)^①]有一天在正式场合得以使用,那么这也归功于讲支配性语言者的接管;他们对于语言的合法性有充分的权利(至少在他们的对话者眼里是这样的),能够避免被怀疑为不得已而退回到落后的语言中。

由于某些能动者不能够将最有利于自己的准则施加于由他们自己或由别人所提供的语言产品之上,所以在语言市场上所取得的权力关系——其变化决定了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市场上可以获得的价格的变化——得以显现和实现。当合法语言的使用更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当场合更加正规时(也就是当情况对那些或多或少有正式发言权的人更有利时),以及消费者对合法语言和合法语言能力给予更加完全的确认(这一确认与其对这种语言的知识相对无关)时,这种强加的合法性的影响越大,市场法则就越是有利于由最大语言能力的拥有者所提供的产品。换句话说,市场越是正规,其准则在实践上也就越是与合法语言的标准相等同,支配者或曰合法语言能力的所有者、有权发表讲话的权威者,也就越发处于支配性地位。语言能力并不仅仅是技术能力,并且只要技术能力是依靠法定属性(贵人行为理应高尚)的影响而获得的,那它就是经常与技术能力相伴随的一种法定的能力,而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技术能力是法定能力的基础。合法的语言能力是一个获得了授权的人所具有的获得了法律认可的能力——即一个“权威”在正式场合中使用合法的(或曰正式的)语言的能力。经过授权的

^① 克里奥尔人通常指下面几种人:生于拉丁美洲的欧洲人的后裔;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早期法国或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上述两种人与黑人或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儿等。克里奥尔语即指克里奥尔人所讲的法语,也即克里奥尔式法语。——译者

权威性的语言,是为官方所认可的话语,是值得相信的,用一句话来说,是施事性的(*performative*),是宣称为(并且这种宣称具有最大的成功可能性)有效的。上述所界定的合法语言能力揭示了此施事的有效性,让人可以理解,在社会心理学确定言说有效性的具体实验中,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讲话时的发音(其次是用词);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对法定能力的特殊的、可靠的衡量尺度,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的权威性。对于决定了相关市场中通行的价格评估准则的象征性权力关系的实际估价,仅在话语所具有的特殊的语言属性表达了言说他们的那些人的社会权威和社会能力的时候,才会将这些语言属性考虑进来。它们发挥作用的方法与其他非语言属性——例如声音的特点(鼻音化或者喉音化)——相同,发音器官的持续性的特征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标志之一,而所有更为外在的社会品质,如贵族或者学术头衔,服饰(尤其是制服和正式服装),某些制度的特征,例如神父的讲坛、教授的讲台、演讲者的演讲坛和麦克风,所有这些都把合法言说者置于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且通过这种预设的空间结构构成了互动的结构,并最终建构成一个群体,而语言交换正是在这一群体中发生的。

因此,越是在正规的情境下,支配性语言能力就越是有可能在特定市场中发挥其作为语言资本的作用,能够将最有利于自己产品的价格形成规律施加于市场,并且确保自身获得相应的象征性利润。因为情境越正规,它也就越发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强加对支配性表达方式的合法性认同,把作为其特征的可选择的诸形式(至少在发音的层次上)转变为不可更改的规则,转变为“礼仪上的必要”(就像正式宴会中的黑领带),从而使这些语言产品的接受

者,即使在正规情境的限制之外,也倾向于理解并且承认这种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换句话说,这些不同的条件越是趋同,这种情况在市场上发生的程度越高,在实践当中赋予市场上彼此冲突的语言产品的价值与其在理论上所具有的价值——也即,在假设的统一市场中,它们与其在整个语言风格系统中的位置相对应所具有的价值——也就越接近。相反,随着交换环境正式程度的减弱,随着交换受到具有高度权威的人所支配的程度的减弱,价格形成规律对于被支配性语言惯习的产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就趋于减弱。

确实,象征性权力关系,作为市场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定义可以通过谈判(negotiation)磋商,而且在一定限度内,市场可以被关于话语使用条件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①所操纵。这包括,例如,用于引入或请求原谅的过于随便或者过分的表达(“您如果允许的话”、“假如我可以这样说”、“您如果原谅我这种说法”、“带着所有的尊敬”,等等)或者是那些通过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达,强调一种在特殊市场上被欣赏的坦率(“私下说”、“仅限于我们之间”,等等)。但有一点是无须说的,就如在屈尊策略中所表现的那样,一个人拥有的资本越多,他就越有能力操纵市场。还有一点也是确定的,即无论市场多么统一完整,都无法阻止被支配的个人在私人生活的空间里,在朋友中间,找到一个使正式市场中通行的价格形成规律无法发挥作用的²市场。²在这些同类伙伴之间的私人交换中,“非法”的语言产品是按照依它们自己的生产准则调整过的标准来加

① 元话语是指语篇中能够标示话语结构,提请对方注意或者发话者态度的各种语言手段。——译者

以判定的,因此这种标准把他们从必需的、关于区分和价值的比较逻辑中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正式的规则只是暂时被悬置而非真的被违背了³,它仍然是有效的,并且一旦被支配的个人离开这些可以畅所欲言的场域(他们有可能在这里度过终生),正式规则就会重新强加到他们身上,就如其在正式场合控制发言人的语言生产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因此,要在这片自由绿洲的语言使用中找到一种“真正的”通俗语言,将会是相当错误的。因为在这里人们已获得许可(licence,一个典型的词典词),因为他们处于朋友之中,不必“管好自己”。以下一点也是确实的,即当面对正式的市场,例如由语言测试或者调查所构成的市场时,通俗语言的能力往往被摧毁了。语言合法性的现实正在于此:即使被支配者像韦伯所描述的贼那样,在正式规则所触及不到的地方度过终生,但他们仍旧总是处于正式规则的潜在判决(potential jurisdiction)之下,所以一旦被置于正式环境中时,他们就只能像语言调查中所通常记录下来那样,只有沉默或者结结巴巴的话语。

这意味着,相同语言惯习的生产随着市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所有对语言的观察都记录了一种话语,这种话语是语言能力与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之间的关系的产物。在这一市场中,由于控制它的价格形成规律与学术市场的价格形成规律紧密相关,因此其紧张程度是非常之高的。所有企图把可以解释这样记录下来的此类差异的变量都确定下来的做法,都有忽视调查环境本身的影响的风险,而作为一个隐藏变量,调查环境无疑是不同变量所具有的不同权重的根源。那些希望打破语言的抽象性,建立对语言能力的社会因素进行考察的统计指标(用这种或那种音

位学的、词汇学的或者是句法学的指数)的尝试,只是走了一半路:他们事实上忘记了这一点,即在特殊市场环境中所衡量的不同因素——由询问本身所造成的——在不同的环境里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相对权重,因此重要的是要确定那些决定能力的不同因素的解释权重是如何随着市场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这需要发展适宜的实验项目)。

象征性资本:一种被认可的权力

如果我们把施事话语看作象征性支配——在所有语言交换中都会发生——的影响的一个特例,那么关于施事话语的问题将会显得更加清楚。语言的权力关系绝不能仅凭现存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予以界定。不同能动者的重要性还依赖于他们的象征性资本——即他们从群体中所获得的认可,无论这种认可是否已经制度化了。象征性强制——这种神奇的效力既是命令又是通行密码,而且是要求得到实施的仪式话语或简单的指令,或者甚至是恐吓或侮辱——只有同社会条件相吻合时才能发挥作用,而社会条件与话语的严格语言逻辑是大相迥异的。哲学家的语言,若要获得它所宣称的重要性,就必须与社会条件相吻合,这些条件确保了哲学家的语言从他人那儿获得它所赋予自己的重要性的认可。⁴同样地,仪式交换的设立,例如一场弥撒,是以下面所述作为前提条件的(当然还有其他条件):即所有的社会条件都已经确立好了,而这些社会条件正是为了确保已经在彼此内部取得一致的合适的发出者与合适的接收者的语言生产获得应有的效果。理所当然,

当能够确保这种认识关系再生产的机制,也就是作为权威基础的机制停止运作时,宗教语言的象征性效应就将受到威胁。这一点在任何象征性强制关系中都是正确的,即使在使用要求被听从、被相信并且被遵守的合法语言时,也是如此;只有在上面分析的所有保证支配性语言及其合法性认同的顺利再生产的机制都有效时,这种合法语言才能发挥其特殊的效应。人们或者可以顺便注意到,任何由使用合法语言所获得的区分性利润的源泉,都取自社会世界的整体,以及赋予其结构的支配关系,尽管这一利润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似乎单单基于该人的个人品质。

不能将奥斯汀关于施事话语的论述仅仅局限于语言的范围。这些制度行为(acts of institution)的巫术般的有效性是与制度的存在分不开的,而正是这种制度,界定了巫术话语发挥效力所必需的条件(关于参与者、时间或地点等等)。正如奥斯汀分析的案例中所表明的,这些“恰当性条件”是社会条件,当某人希望恰当地进行为船舶命名或为人洗礼的仪式时,他必须是有资格这样做的,这与发布命令时必须具有为命令接受者所认可的权威是相同的。确实,语言学家纷纷试图在奥斯汀对施事性的断断续续的定义中,发现一个驳回奥斯汀所提问题的借口,并且试图以此回到忽视市场效果的狭义的语言学定义上来。他们正是通过在明确的施事性——其自身就表征了某个动作的完成,因而它必然是自我检验式的表达——与含义更广泛地、欲意用来完成某一动作而不仅仅是为了说些什么的施事性话语之间做出区分来做到这一点的,或者更简单点说,是在严格的语言行为(例如宣布一个会议开始)与超语言行为(通过宣布会议开始来开始这一会议)之间做出区分来做到这一点。通过这一方

法,他们认为,自己反对任何分析施事话语得以运作的社会条件的行为是正确的。因为奥斯汀所讨论的恰当条件只涉及超语言行为;只有为了有效地开始一个会议,才需要被授权这样做,而任何人都可以宣布会议开始,即使他的宣布是完全无效的。⁵

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只为了去发现什么时候我所做的包含在我所说的之中,以及我所做的必须是我所说的,是否有必要?但是通过把语言与超语言之间区分的结论推进到一个极限——语用学正是意欲以这一极限作为其自治的基础的(与社会学相关时更是如此)——语用学通过归谬法证明,像奥斯汀所描绘的那种话语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如果其背后不具有某种社会秩序,那它就只能是无法获得认可的制度行为。“很显然,鉴于一个人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开始会议,但并非处于较高职位才能下达命令,因此一个战士可以对他的长官下达命令,尽管他的命令几乎没有被遵从的可能。”⁶ 或者还有:“要有效地召开一场会议,并非所有人,而只有一个人是必须由相应的制度所授权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权说完一句类似于命令的话,因此所有人都可以宣称他完成了这样的语言动作。”⁷ 这种由明确的施事性所表征的“纯”施事性的建构,具有能够通过对立推理(*a contrario*)带出关于普通施事性表达的前提条件的优点,而这则暗示着与其成功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关联。从严格的语言学角度看,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话,一个士兵可以命令他的上尉去“清扫厕所”,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事实上这正是奥斯汀考察恰当条件时所采用的角度),很明显,并非任何人可以宣布任何事,否则他这样做将会冒风险或是触犯他人;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共场所高叫,“我命令全民总动员”,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权

威,这不能成为一种“行动”,这样一种言说仅仅是语词而已;它将自身降格为无用的吵闹,孩子气,或者疯狂。⁸将语言行为与其实现条件分离开的逻辑实验,通过这一抽象行为所引发的荒唐,显示出,施事话语作为一种制度行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不能脱离给予其存在的理由的制度而独立存在;假如它不顾一切地产生了,那么它将失去任何社会意义。⁹由于一项命令或者甚至仅仅一个口令,都只能在受到事物秩序的支持下才能发挥功效,因此,其成功取决于所有构成社会秩序的各种规则的关系。如他们所说,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恰当条件的情况下梦想发布命令,将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对恰当条件的预期,通过仔细考虑并感受言说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将有助于确定言说。只有一个无望的战士(或者一个“纯粹的”语言者)才会想像到要给他的长官下达命令。施事话语暗示着对拥有这种或那种权力的公开要求,¹⁰一种或多或少被承认、因此也或多或少为社会所批准的要求。这一要求,通过词语而作用于社会世界,即如巫术一般,其在多大程度上是疯狂的或者合理的,取决于它有多少社会客观基础。¹¹因此我们可以对比两种巫术式的命名行为,这两种行为具有完全不等的社会保证性:缺乏授权的侮辱(“你只不过是一个教授”),它存在着被反击的危险;官方的命名或“任命”(“我任命你为教授”),带着由群体所赋予的所有强有力的权威,并且能够授予被命名者以一个合法的、也即被广泛认同的身份。

关于施事话语的限制的例子,是法律行为——当它按照规定,为有相应权力的人说出,¹²也即由代表整个群体的代理人所说出时——能够以言语代替行动,如他们所说,这种言语是具有效力

的：法官只需要说“我认定你有罪”，因为有一系列的代理者和机构去保证判决的实施。对于话语中“话语施事的力量”背后的具体语言规则的研究，此时就要让步于对何等条件下个人及其言语才能具有这样的权力的独特的社会学研究。施事话语具有如此魔力的真实源泉，就在于职位的秘密，或曰由于委任代理的特点使一个人——国王、教士或发言人——获得了代表一个群体讲话并且行动的授权，因此，魔力就在他身上得以建构并且由他来建构了。¹³更准确地说，它存在于职责制度的社会条件之中；而正是这种职责制度，通过将其设立为群体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媒介，把合法的代表建构成了能够通过言语作用于社会世界的代理人；并且，除了其他方式外，它是通过用特殊的符号和徽章装备他来表明这一事实——即他并非以自己的名义和以自己的权威的名义在行动——而做到这一点的。

所有的象征性权力都来自权力的象征性。象征性特征——权杖的例证以及在对非法穿着制服者的制裁最好地说明了这些特征——是一种公开的表现，并且是委任契约的一种官方化：标志着法官或医生身份的貂皮长袍和大褂，表明了法官或医生是被认为具有正当理由（在集体的认同之下）宣称自己是法官或医生的，他的招摇撞骗（从他外表表现出来的特权来看）是合法的。能力，尤其是语言能力——医生们所讲的拉丁语或者是发言人的雄辩——从有权讲话并且通过讲话而行使权力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权威语言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修辞、句法、词汇甚至是发音，都仅仅是为了

强调其作者的权威以及他所要求获得的信任。在这一方面，风格只是机制的一个元素，从帕斯卡式的(Pascalian)意义上来说，语言通过这一机制，达到了生产和强加其自身重要性的表征的目标，并且达到了帮助确保其可信性的目标。¹⁴权威话语的象征有效性总是部分地依赖于言说者的语言能力的。当然，如果讲话者的权威没有被明确地授权，那么这一点就将更为正确。依此类推，象征性权力的实施与对话语形式的注重是相伴的，在古代社会中，诗人的例子已经充分证明，对话语形式的注重，具有展现言说者的优势，并且使这种优势获得群体的认可的目的(这一逻辑在流行的挖苦技巧中也可以见到，它通过夸张其可耻程度和对仪式程序的有规则的扭曲，产生了一种表达效果，即可以令言说者做到“使人们站在自己这一边嘲笑对手”)。

这样，正如在断言陈述的情形中，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了被接受的可能性，并且由此界定了话语的形式一样，在施事话语的情形中，与可能性——由特定市场所提供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恰当性的条件。我们必须因此而断言，与所有明显的语言秩序的自治形式相反，所有的言语都是由市场生产也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并且正是市场决定了言语的存在及其最为具体的属性。

利润预期

既然话语只能在其存在的形式中存在，只要它不单单是语法

上正确的,并且最重要的是,还具有社会可接受性,即能够被听到、被相信,并且在既定的生产和流通关系的状态中是有效的,那么依此类推,对于话语的科学分析,就必须考虑到作为相关市场之特征的价格形成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要考虑到界定了话语可接受性的社会条件(包括特定的有关语法的语言学规则)的规律。在现实中,所面对接受条件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而对市场裁决的预期,则有助于决定话语的生产。这种预期,与有意识地计算毫无相似之处,是语言惯习的一个方面;作为与特定市场规律延长的、初始的关系的产物,它倾向于作为对可接受性的实践感觉和对自身和他人的语言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而发挥作用。¹⁵正是这种对可接受性的感觉,而非其他形式的源自对象征性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的计算,鼓励人们在生产话语的过程中,把话语的可能价值考虑在内,从而决定了校正和其他形式的自我审查形式——个人通过接受使自己在社会中能够被接受这一事实而对社会世界所做的让步。

由于语言符号也是商品,也注定了要被能够提供信用的权力(随其所在市场的不同规律而不同)给定一个价格,因此,语言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受对市场裁决的预期的影响:所有的言辞表达——无论是朋友之间的言语交换,官方授权的发言人的言辞,或者是科学论文的学术话语——都以其接受条件为标志,并且其属性的一部分(即使从语法层次讲)要依存于这一事实,即在对相关市场规律的预期的基础上,其作者经常无意地这样做,即试图将从不可分割的、定位于交流的并可以被估价的实践中获得的象征性利润最大化。¹⁶这意味着市场决定了语言产品的价格和性质,因此也决定

了它的客观价值；而对这一价格的实践性预期也有助于此；并且这还意味着与市场的实践关系（从容、羞怯、紧张、尴尬、沉默，等等）有助于确定市场裁决，因此也为部分地促使这种关系产生的裁决提供了一个明显合理的理由。

在象征性生产的情况中，由市场通过对可能的利润的预期而施加的限制，很自然地采取了预期性的审查制度的形式，这种预期是一种自我审查制度，它不仅决定了说话的方式，即语言的选择——在双语情况下的“符码转换”——或者语言的“水平”，而且决定了哪些东西是可以说的，哪些东西是不可以说的。¹⁷

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中，所有事件的发生好像都是这样的，即语言规范（价格形成规律）是由最接近合法语言能力的语言能力拥有者所施加的，或曰，是由互动中的支配性言说者所施加的，并且正规程度越高（在公共场合、正式场合，等等），情况就越是如此。看来似乎是这样的：当不同种类的资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时，即使所有的其他情况都不变，施加于被支配言说者身上的审查对他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采取合法表达方式[法语中讲方言土语(*patois*)的人]的必要性，也将更强大——然而这种限制在具有相同的象征性资本和语言资本的所有者之间，例如在农民之间，是不存在的。从特殊语言资本和其他种类的资本的分布结构的角度来看，使用两种语言的情况，能够使人准实验性地观察到，语言的使用是如何随着言说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所掌握的表达工具）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样，在1963年贝阿恩省的一个城镇中观察到的一

系列互动中,同一个人(住在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妇人)先是在城里用一种“方言土语的法语”同一位年轻的商店女老板讲话,这位女老板来自贝阿恩省另外一个较大的城市(并且,作为一个更有资格的“城市人”,她或许听不懂贝阿恩语,或者会装作听不懂);然后,她用贝阿恩语同一位居住在城里、年纪与她差不多,但来自农村的老妇人讲话;然后她用认真“校正过的”法语同一位城市小官员讲话;最后,她用贝阿恩语同一位来自农村、年纪与她相仿的城市修路工讲话。非常明显,调查者,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只能遇到认真校正的法语或者沉默;假如他自己使用贝阿恩语,这或许会缓和交往中的紧张,但是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都会如屈尊策略一样,可能造成一种与最初的关系同样虚假的局面。

在实践上对于市场所固有的规律以及体现市场规律的裁决的认知与认可,决定了对话语的策略性调整。即在合法发音的代表在场时,他们是否注重“校正”自己的低级发音,并且更为普遍地,进行所有的校正,即倾向于通过更为集中地使用可利用资源来评估语言产品;或者,采用一种相反的趋势,即退而使用较为简单的句法以及短语的趋势,社会心理学家在成年人对孩子说话时经常观察到这种趋势。为了生产适应特殊市场需求的产品,通过对于“说得好”和“说话得体”的关注,总是使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委婉语(euphemisms);它们是妥协的形式,是表达利益(所说的内容)与特定的语言生产关系中(不管是语言相互作用的结构还是特殊场域的结构)所固有的审查制度——即一种强加于被赋予了一

定的社会能力的言说者或者写作者之上的审查制度,而这种社会能力是一种存在于这些象征性权力关系之上的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象征性权力——交易的结果。¹⁸

因此,话语形式的区别,更准确地说是其在形式上(形式的)被控制和提炼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的客观紧张程度,即环境的正式程度,以及在互动的情形中,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社会差距(在语言及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上)的程度或者是他们各自所属的相应群体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言说者对这种紧张程度及其所暗示的审查的“敏感性”,同时还在于与言说者对高度紧张做出高度控制的、由此也是非常委婉的表达反应紧密相关的才能。换句话说,话语的形式和内容取决于惯习(它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紧张度的市场裁决的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市场由或多或少被强化了的一定的紧张度所界定,由此也是由它对那些对“正确性”和正式用法所要求的“塑形”未给予充分重视者施加惩罚的严厉程度来界定的。

因此,我们还无法弄清,一个人除了从市场紧张程度的变化的角度之外,还能够如何理解风格的变化呢?于此,巴利^①用一系列都可引致同样的实践结果、因而看似可以互相替换的表达方式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¹⁹:“来!”、“一定来!”、“你不愿意来吗?”、“你会

① 巴利(Charles Bally, 1865—1947),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学生。与薛诗嵩(Albert Sechehaye, 1870—1946)一起整理发表了索绪尔的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逻辑语法和心理语法,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概念的风格学,试图建立“言语的语言学”。著有《普通语言学与法语语言学》、《语言与生活》、《语体学概论》等。——译者

来的,不是吗?”、“说你一定会来”、“如果你来了呢?”、“你应该来”、“来这儿”、“这儿”——对此还可以再加上“你来吗?”、“你会来的”、“你来多好啊”、“您如果赏脸光临”、“是哥们儿就来”、“请光临!”、“来吧,我求你”、“我希望你会来”、“我盼望你……”诸如此类数不清的例子。虽然,这些措辞从理论上来说是等同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并不等同。其中任何一个,当被恰当地运用时,都能通过对可利用资源最大限度的使用,取得表达意图——在这一例子中,是冒着看来似乎是无理侵犯或者不被接受的压力的风险的坚持要求——与多少有些不对等的社会关系中所固有的审查制度之间妥协的最适度形式,无论它们是否已经像礼貌措辞一样被客体化和程式化了,或者仍然还是以事实上的状态存在。这里坚持的程度与个人“允许自己”所使用的程度相一致,只要遵奉了“形式”。在“您如果赏脸光临”比较合适的场合,“你必须来”就完全不合适,因为太简慢,而“你来吗?”则明显“粗鲁”了。在社会的形式主义中,与在巫术的形式主义中一样,在每个实例中,只有一种惯用语“有效”。如果一个人对市场情况具有完全的把握,那么所有为了尽可能地达到完美的惯用语句的礼貌努力都将立即不言而喻。

形式及其透露的信息浓缩并且象征了整个社会关系的结构,而且它们正是由此而得以存在并且获得其有效性的(即著名的“话语施事的力量”)。所谓的策略或者技巧,就在于考虑到发出者与接收者在不同种类资本的等级制度中的相对位置,以及性别和年龄,还有这种关系中所固有限制,并且当有必要时,通过委婉的手法仪式性地超越它们。命令口吻的缓和,在“这儿”、“来”,或“来这儿”中降低为零,而在“如果您能赏光从这边儿来”中则非常明

显。通常用来中和“不礼貌”的形式的可以是一个简单疑问句(“你来吗?”),或者是考虑到了被拒绝的可能性的倍加微妙的否定问句(“你不愿意来吗?”)。这或许已经成为表示坚持的一种程式了,通过宣称被拒绝的可能性和妥协的价值而装作不坚持。在这一例子中,可以采取一种在同龄者中较为合适的口语的形式(“赏脸来”),或者一种“做作”的形式(“你能赏脸来吗”),甚至是一种谄媚奉承的形式(“如果你赏光来”);或者还可以是对问句本身的合法性提出疑问的元语言学的形式(“我可以请求你来吗?”)。

我们的社会感觉在对形式——一种关于市场情况的所有社会学特征的象征性的表达形式——的勘察中所探知到的东西,正是话语生产的起源,也就是说,在谈话者与表达能力——即言说者能够投资于委婉语过程中的表达能力——之间所取得的社会关系的全部特征。语言形式与社会关系结构(语言形式正是在这种结构中生产出来,并且也正是为了这种结构而生产出来的)之间的相互倚赖,在法语致辞形式“vous(您)”和“tu(你)”之间的摇摆不定——当两个言说者之间关系的客观结构(例如年龄与社会地位的悬殊),与他们熟识的时间长度和连续性以及因此与他们之间相互的亲密程度和熟悉程度相冲突时,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可以一目了然。这时从表面上看来,他们是在通过自发的或者有意识的滑舌音和逐次省略,重新调整表达方式和社会关系,这在某种意欲于官方基础之上建立一种新的表达秩序的语言合约中达到了顶点:“让我们用‘tu’。”但是话语的形式从属于使用它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这在风格冲突的情况中最为突出,即当言说者面对一个从社会角度来看是异质的听众,或者仅是面对两个从社会和文化

角度来说都相差甚远的谈话者,以至于所要求采取的社会学意义上专用的表达模式(某种通常是通过在不同的社会空间里多多少少有意识地调整而生产出来的表达方式)不能同时生产出来时。

引导语言生产的东西,对于每个言说者来说并非都是市场的紧张程度,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市场抽象界定的正式性程度;而是“平均”的客观紧张程度和语言惯习(以对市场紧张程度的一定的敏感程度为特征)本身之间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是对利润的预期,这种预期几乎不能被称之为主观预期,因为它是客观环境(也就是平均的成功可能性)与某种合成的客观性(即对这种可能性或多或少准确的估计的倾向)之间相遭遇的产物。²⁰对于潜在报酬或者惩罚的实践性预期,是对一定的语言和社会能力与一定的市场(正是在此市场中这一关系得以实现)之间客观关系现实的一种实践性的准物质性的感觉。其范围可以从正面鼓励的确定性(它是自信的基础,也是自我确证的基础)到负面意见的确定性,它通过所有表示不安和羞怯的中间形式而导致了放弃和沉默。

语言惯习与身体魔力

对于可接受性的界定,不是在情境中,而是在市场与惯习的关系中找到的,而惯习本身正是其与市场关系的整个历史的产物。实际上,惯习不仅仅是通过其使用状况,而且是通过其获得状况而与市场相关的。我们学习说话不单是通过听某种言语,而且要自己来讲说,也即在已经确定的市场上提供已经确定了的言语形式。这种现象在家庭成员的内部交换中时有发生,由于家庭在社会空

间中占有一个特定的位置,这样就为孩子的模仿倾向提供了与合法用法具有或大或小区别的榜样和裁决。²¹我们已经了解到,在这一初级市场上此类产品所提供的价值及其所提供的权威,在其他的市场(例如学校市场)上也可以获得。这样,相继的强化或者拒绝,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中建立起一种对语言用法的社会价值和不同用法与不同市场之间关系的一种具体的感觉,这种感觉组织起了所有后来的对语言产品的认识,并且趋向于赋予它以相当的稳定性。(我们知道,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一种新的经验对于惯习的影响,取决于这一经验与所有已经以生产或评估图式的形式由惯习所同化的经验的实践的“兼容性”关系;并且,在由这一辩证法所引致的选择性再翻译的过程中,所有新经验的信息有效性都趋向于不断地消失。)这种语言的“场所感”,控制着既定场域所引入并施加于话语生产的限制的程度,它将沉默或者过于控制的语言强加于一些人,却又允许另外一些人使用其地位已经完全确立了的语言自由地交谈。这意味着,从社会环境中通过实践获得的这种能力,是与对语言用法的实践性把握,以及对情境——在此情境中这种语言用法是被社会性地接受的——的实践性把握不可分割的。对于个人自身的语言产品的价值的感觉,是对个人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位置的感觉的一个根本方面。个人与不同市场的原初关系,以及对施加于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裁定的经验,与对自己的身体所具有的价格的经验一起,无疑都是帮助构成个人自身社会价值感的调节因素,而这种个人自身的社会价值感,则控制着个人与不同市场的实践关系(羞怯、自信,等等),并且更为通常地,它还控制着个人在社会世界中实实在在的整体姿态。

虽然每个言说者都既是他自己语言生产的生产者又是其消费者,但如我们所见,并非所有的言说者都能够把其产品生产时所依据的图式应用于自己的产品之上。小资产阶级与自己的生产之间存在着不愉快的关系(尤其是在发音方面,如拉波夫所示,他们近乎是吹毛求疵的);他们对于市场的紧张程度尤其尖锐敏感,并且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语言正确性也极为敏感,²²这使得他们刻意校正;他们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正式场合达到了一种爆发性的状态),通过刻意校正或者故作自信而导致的尴尬鲁莽的言谈,造成了“不正确性”——所有这些全都是生产体系与评估体系相脱节的结果。可以这样说,小资产阶级自身产生了分裂,他们就是那些既最清楚自己产品的客观价值(即在学术假设中所界定的最完美统一的市场中的价值),又最决心拒绝它、否认它、并且努力反驳它的人。如在这一例子中非常显而易见的是,通过语言惯习把自己表达出来的,是整个阶级的惯习的一个方面;这实际上意味着它在社会结构中共时性地和历时性地占据着的位置。

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刻意校正是深深镌刻于矫饰的逻辑之中的,正是这种矫饰的逻辑,引导小资产阶级企图用恒久的紧张为代价,以提早适应那些支配者的属性。小资产阶级妇女在语言方面(在化妆品和个人形象方面也是同样)所感受到的尤为强烈的不安和焦虑,也可以在同一逻辑的框架中获致理解:由性别之间劳动分工的不同所注定的、通过她们的象征性生产和消费的能力去寻求社会流动,她们甚至更倾向于为了获得合法语言能力而进行投资。在由语言调查所造成的特别紧张的市场中所观察到的小资产阶级

的语言实践,给拉波夫等人以深刻印象。由于对客观紧张度(这是由特别标出的认可与认知的差别所产生的效果)的异常敏感,使小资产阶级处于主观紧张度的最大值点上,他们与更低社会阶级的成员明显不同。由于缺乏用以实现被他们保留作私人会话的那种坦率会话的自由途径,更低社会阶级的成员们别无选择,只能使用借来的、笨拙的语言的结结巴巴的形式,或者只有以放弃和沉默来逃避。但是小资产阶级与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成员也有很大的差别,支配阶级的成员的语言惯习(尤其当他们生而为此阶级时)是规范的实现,并且他们可以表达出所有的自信,而这些自信是与生产环境相关的,在这种生产环境中,评估准则与生产准则达到了完美的和谐一致。²³

在这种情况下,与另一极端——即在通俗市场上盛行的坦率直言——的情形相一致,市场需求与惯习的性情倾向完全协调起来了;市场规则不必再通过限制的方法和外部审查制度来强制执行了,而是通过它与市场的关系——即它的一种合成形式——得以实现。当它所面对的客观结构与产生它的客观结构相一致时,惯习预期到了该场域的客观需求。这是审查制度最常见的和最隐蔽的形式的基础,这种形式,通过把被赋予了预先“审查过了的”表达的性情倾向的代理人安置于隐含着有权讲话的位置上——因为他们与这些位置所固有的急迫要求相一致——而得以实现。鉴于规则隐藏于支配性表达方式的所有区分性特征之下,所以紧张中的松弛(*relaxation in tension*)是一种与市场关系的表达,它只能通过对市场延长或者早慧的熟悉所获得;而即使在一般情况下,这一市场也以高度的控制和持续不断地对定义为“生活的风格化”的

形式与正式性的注意为特征。

诚然,当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上升时,审查的程度和给予塑形与委婉语的相关重要性也稳步上升,不仅在公共和官方场合是这样(在较低阶级尤其是在小资产阶级——他们在普通与超普通之间确立了明显的对立——中也是如此),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这可以从衣着和饮食风格中看出来,也可以从讲话的风格中看出来,这些风格趋向于排除随便、放松或我们在“自己人”中间时允许自己所享受的放肆。这也就是拉考夫(Lakoff)所间接提到的情况,他观察到某种在朋友之间的举止,即人们可以公开询问一件东西的价格(“嗨,这块小毯子不错,多少钱买的?”),这在较低阶级中是可以接受的(在这儿它甚至像是赞美),而在资产阶级中就是“不得体的”,在这里就不得不使用一种缓和了的形式(“我可以向您一下这块毯子的价格吗?”)。²⁴

与这种较高度度的审查——它要求持续不断地进行更高度度的委婉化和对遵奉正式礼仪的更为系统的努力——相关联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在高度紧张的市场——例如在学术市场和社会高阶层市场中——所客观要求的、对委婉化工具的实践性把握,随着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的上升而提高,即随着个人发现自己要服从这些要求的社会场合(从儿童时代开始)出现频率的增加,个人因此也就能够从实践中获取满足这些要求的手段。这样,按照拉考夫的说法,资产阶级的用法就以他所谓的含糊其辞(hedges)——例如“有几分”、“非常地”、“实在”、“严格地说”、“随便地说”、“按照法律”、“经常地”、“优秀”,等等——为特征,并且,按照拉考夫的说法,以对他所谓的填充词——如“像……这样的”、“像那样的事”、

“特别地”等等——的频繁使用为特征。²⁵但这还不足以说,如拉波夫所说的那样(为了复兴通俗口语,而这只是使他颠倒了价值系统),这些表达要为资产阶级言辞中的冗词赘语和词语通胀负责任。尽管从严格的交流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些冗词赘语是多余的,但是它们在决定交流方式的价值方面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功能。不仅恰恰是它们的多余证明了可利用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它们与那些因此是可能的资源之间的平等的关系,而且它们还是一种实践性的元语言(practical metalanguage)的基本要素,并且如此一来,它们发挥了一种中性化距离(neutralizing distance)的标志的作用,而这种标志,正是资产阶级与语言的关系和与社会世界的关系的特征。这些表达具有如拉考夫所说的“提高中间价值和缓和极端价值”的作用,或者如拉波夫所说的“避免所有的错误和夸张”的作用,它们确保了言说者能够与自己的言论保持一定距离的能力,因此也确保了言说者的利益——并且由于同一原因,也确保了他们与那些不能保持这样一种距离,而只能任自己为自己的言论所左右,毫无保留或者不加审核地听从自己表达冲动的驱使的人们之间的距离。这样一种由要求“价值论的中立”(不仅在语言使用中)的市場所生产,并且也是为这类市场而生产的表达方式,还预先针对市场作了调整——市场要求其他的中性化形式,并且要求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及与其他深涉其中的阶级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则损害了生活的方式:在所有方面给予方式、风格和形式以优先权的实践构造,都对功能造成了损害。它对于所有要求强加形式、奉行礼节的正规市场和社会仪式来说,都是适用的。它确定语言的恰当形式——即正式的语言——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它

成功地损害了交流的功能；而只要象征性支配的施事性逻辑在运作，这一功能就可以失去。

资产阶级在同语言的关系上所倾注的注意，同他们在与身体的关系上所倾注的注意是平等的，这一特点并非巧合。来源于语言实践的可接受性感觉，是铭刻于最根深蒂固的身体的性情倾向之中的：它是整个身体，通过其姿势及其内在的反应，更具体地说，是通过发音器官的反应，对市场的紧张作出反应。语言是一种身体技术，具体的语言学尤其是关于语音学的能力则是身体魔力(bodily hexis)的一个维度，它表现了个人与社会世界的整体关系，以及个人与世界的整体性社会渗透关系。通过对皮埃尔·基罗(Pierre Guiraud)所谓的“发音器风格”的思考，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身体魔力特征，决定了作为一个阶级发音特点的声音特征的系统。最常用的发音部位是嘴巴所进行的所有动作的基础(不仅在说话中，而且在吃、喝、笑等动作中)，因此也是身体魔力的一个组成要素，它暗示着讲话的整体发音方面的系统性信息。这种“发音器风格”，一种被“肉体化了”的生活方式，就像整个身体的魅力一样，把发音特征——这种发音特征经常被单独研究，每一个(例如音素“r”)都被拿来与其他阶层的发音中相对应的因素相比较——焊接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必须被作为整体来对待。

因此，在较低阶层的情形中，很明显，发音器风格是与身体的关系中的一部分，它被“装腔作势”的拒绝(即对风格化和形式塑造的拒绝)和男子汉气概——一种欣赏所谓“自然”之物的更为普遍的性情倾向的一个方面——的评估所支配。当拉波夫把纽约男性

讲话者对强加的合法语言的拒绝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时，他无疑是正确的：他们把男子气与其讲话的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与他们讲话时运用口和喉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在法国也绝非偶然，在两个主要由性别决定的、表示“口”的词语的对立的通俗用法中，浓缩了资产阶级与语言的关系同大众与语言的关系之间的对立，即：“*la bouche*”，更为闭合、收缩，它是紧绷而压抑的，因此也就更为女性化；而“*la gueule*”则毫不害羞地张大，如在“裂开”一词的用法中（*fendue, se fendre la gueule*——“开怀大笑”^①），它是放松和自由的，因而是男性化的。²⁶资产阶级的性情倾向在大众头脑的想象中，以及在对他们的最滑稽地模仿的小资产阶级的形式中，在他们紧张努力的身体姿势（*bouche fine, pincée, lèvres pincées, serrées, du bout des lèvres, bouche en cul-de-poule*——“过分讲究的”、“傲慢”、“寡言”）中，传达了他们对世界和其他人的相当普遍的性情倾向的身体标记（尤其是在口的例子中，传达了他们对食物的性情倾向），例如傲慢和鄙视（*faire la fine bouche, la petite bouche*——对食物过分挑剔、难以讨好）的倾向，以及对身体部位的显著疏远和对那些不能认清这一距离者的显著疏远。而“*la gueule*”则相反，是与男子气特征紧密相连的，这一特征，按照大众的理想，是植根于超越审查制度之上的对力量的平静确信之中的——精明与狡猾和“装腔作势”——并且使之有可能是“自然的”（“*la gueule*”是在自然一面的），是“开放的”和“直言的”（*jouer franc-jeu, avoir son franc-parler*）或者仅仅是愠怒（*faire la gueule*）。它标明了词语暴力的容量，这

① 破折号后面的词为前面法语词的相应的中文含义。——译者

种容量等同于纯粹的声音力量(*fort engueule, coup de gueule, grande gueule, engueuler, s'engueuler, gueuler, aller gueuler*——“高声的”、“狠狠训斥”、“责骂”、“用粗话对骂”、“闭嘴”)。它还标明了,尤其是在侮辱中(*casser la gueule, mon poing sur la gueule, ferme ta gueule*——“打烂你的脸”、“打嘴巴”、“打耳光”)所暗指的身体暴力的容量,它通过“*gueule*”,既被看作个人身份的“座位”(*bonne gueule, sale gueule*——“好家伙”、“丑恶的嘴脸”),又被看作其主要的表达方式(考虑“*ouvrir sa gueule*”或者“*l'ouvrir*”的含义,其对立干“*la fermer*”,“*la boucler taire sa gueule*”,“*s'écraser*”——“说自己该说的话”,相对于“住口”、“别吵”、“闭嘴”、“安静下来”),其目标正是谈话者的社会身份与自我形象的本质。对惯习与身体魔力的统一有着一个明确的把握的通俗看法,把同样的“意图”运用到食物纳入和言语产出的场合,也把“*la gueule*”与坦率接受(*s'en foutre plein la gueule, se rincer la gueule*——用吃的和喝的塞满嘴)和坦率表白(*se fendre la gueule*)的基本乐趣联系到了一起。²⁷

一方面,审查制度使被归化的语言(*domesticated language*)变得自然起来,这种语言的归化排斥“粗俗的”言辞、“下流的”玩笑和“浓重的”口音,它与身体的归化携手并进,而身体的归化则要求排除所有对胃口和感觉的过分表达(惊叫、眼泪与痛苦的动作),从而使身体受到所有意欲使其非自然化的准则和审查制度的束缚。另一方面,“对发音紧张的放松”,如伯恩纳德·拉可斯(*Bernard Laks*)所指出的,导致了尾音“*r*”和“*l*”的省略[作为拒绝“做过头”的表达,以及拒绝过于严格地遵守由支配性代码所最为严格要求的条款的表达,自由放任(*laisser-aller*)²⁸的影响或许并没有那么大,即

使这种影响是在其他领域中形成的],这是与对审查制度(这种审查制度是由礼貌强加的,尤其是强加在那些忌讳身体的方面)的拒绝相联系的,并且它也是与把人性降格到其共同特征——腹部、屁股、睾丸、蛆虫、内脏和大便——因而并非如其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的大胆坦言相联系,它倾向于使社会世界翻转过来,首末颠倒。巴赫金(Bakhtin)所描述的大众节庆(popular festivity),尤其是革命危机,通过它们推进的词语爆炸,揭露了由日常生活秩序所强加的压力和限制,尤其是强加于被支配阶级的身上的压力和限制,而这种压力和限制,通过看似无足轻重的对礼貌的控制和约束,以讲话方式(礼貌的套话)的风格变化或者是与市场的客观紧张度相关的身体举止的风格变化为手段,强行要求对阶级、性别以及代别之间的等级区别给予承认。

毫不奇怪,从被支配阶级的立场来看,对于支配性风格的采用被看作对社会和性别身份的否定,是一种对构成阶级成员之资格的男性价值的否定。这也就是为什么女人们能不用像男人那样激进地割断自己与所属阶级的联系而认同于支配性文化的原因。“张开大嘴”(ouvrir sa grande gueule)意味着拒绝服从,拒绝“闭上它”(la fermer),拒绝表现出驯服的迹象,而驯服正是变动的前提条件。采用支配性的风格,尤其是采取像合法发音那样明显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否认了自己的男子气,因为获取它这一事实就意味着顺从,而这是传统的性别分工强加于妇女身上的特征(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而且还因为这种顺从会导致被他们自己认为是柔弱的性情倾向。

通过关注各种发音特征(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音特征最好地

表现了惯习的根深蒂固的性情倾向,并且更准确地说,是关于身体魔力的性情倾向),例如开口度、洪亮度或者节奏的程度,自发的社会语言学家证明,一个区分性的语音体系在选择和解释一个阶级或者阶层的发音特点方面非常灵验,无论是在与其他系统——靠这些系统的帮助,它们取得了自己独特的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的关系中,还是在与身体魔力的合成统一体(它们正是从这里一跃而出的)的关系中,并且因此,发音特征还代表了对社会条件所固有的必要性的伦理学和美学的表达。

已经形成了一种异常敏锐的洞察力(尤其在发音学上)的语言学家,或许会注意到普通言说者所分辨不出的差别。不但如此,由于他不得不全神贯注于各分离的标准(例如尾音“r”或“l”的省略)以达到统计计量的目的,所以他倾向于一种分析的视角。从逻辑上来说,这种视角与普通的、支撑着日常生活中的阶级分类准则和同类群体分界准则的视角是非常不同的。语言学特征不但从未明确区分言说者整套的社会属性(身体魔力、相貌、化妆品、服饰),而且发音学的(或者词汇的,或者其他任意方面的)特征也从未被明确地从语言的其他层面中分隔出来;区分一种言谈形式是“通俗的”或者一个人是“粗俗的”之标准,与所有实践性的论断相同,是基于系列指标之上的,而这些指标从来就没有损及那种形式中的意识,即使是那些已经为陈规所指明(例如“农民”式的“r”或者南方的“ceusse”)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的形式。

对身体的使用与对语言的使用,无疑还有对时间的使用,它们之间的紧密关联是由于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它从根本上是通过身体与语言的规训和审查联系起来的,这种规训与审查经常暗示着一条暂时的规律,即群体把这些规训和审查制度之必需性的变换形式作为一种美德进行反复地灌输;此外还由于另一事实,即“选择”——它构成了与经济和社会世界的关系——是包含在持久性框架的形式之中的,而这种持久性框架的形式,是部分地超越于意识和意愿的把握之外的。²⁹

第Ⅱ部分 言语与象征性权力

社会科学处理那些已命名的、已分类的现实，它们带有各种专门名词和普通名词以及称号、符号和缩略词。冒着为它们并不了解其逻辑和必然性的建构行为不明智地承担责任的风险，社会科学必须将有关命名 (*naming*) 的社会操作以及使命名得以完成的制度仪式作为其研究对象。但是在更高层次上，它们必须研究词语在社会现实的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作为所有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关于分类的斗争在阶级构成方面的作用——这些阶级既有按照年龄、性别或者社会地位界定的，也有按照氏族、部落、种族群体或者民族界定的。

就社会世界而言，新康德主义理论给予了语言，以及更为普遍地，给予了表达，以一种在现实构成方面的具体的象征有效性，这是相当正确的。通过构造社会代理人对社会世界的观念，命名行为帮助确定了这个世界的结构，并且这种命名行为越是被广泛认可，即被授权，它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发重要。只要环境允许，没有一个社会代理人不渴望具有命名并且通过命名创造世界的权力：流言、毁谤、谎言、辱骂、称赞、批评、争论以及夸奖都是正式的和集体的命名行为的日常的、琐细的表现，无论它们是赞美还是谴责，都是由被广泛认可的权威所施行的。与具有普遍意义的普通名词——它们带有整个群体的一致意见或者共同看法，简而言之，它包括通过一个被认可的代表授予一个官方头衔（类似于学术上的资格证明）的命名或者任命的官方行为——相反，带有辱骂特征的

“修饰性的名词”(如“白痴”、“混蛋”),具有非常有限的象征有效性,就像个人习语(*idios logos*)一样,只涉及提供它们的人。¹但是二者的共同之处都具有一种可以被称为施事性的或者巫术性的意图。像命名一样,辱骂属于一类具有或多或少社会基础的制度行为或者匮乏行为(*acts of institution and destitution*),通过它,个人以自己的名义或以集体的名义——按照该集体的规模和社会重要性,这种行为也具有与之相应的或多或少的重要性——行动,并且对某人暗示他拥有这样或那样的独特属性,同时还对他暗示他必须按照由此分派给他的社会实质去处事。

简而言之,社会科学必须在其关于社会世界的理论之中加入一种关于理论影响的理论,因为理论通过强行施加具有或多或少权威性的观察社会的方法,帮助构成了这一世界的现实。词语,或者更不用说,格言、谚语和所有已经成为俗套的或者被仪式化了的表达形式,都是感觉的程序,也是日常生活中象征性斗争的不同的、或多或少被仪式化了的策略,正如那些重大的集体命名或者任命的仪式——或者,更加明显地,关于具体政治斗争的看法和预见的冲突——一样,它们暗示了一种要求,即要求象征性权威作为被社会认可了的力量,强行施加某种对社会世界的看法,也就是强行施加对社会世界的某种分类。在施加合法观念的斗争中(在这里,科学自身不可避免地也被卷入到斗争之中了),代理人具有与其象征性资本成比例的权力,即与其从群体所获得的认可成比例的权力。隐藏于言辞的表达有效性之下的权威是一种被觉察的状况,是一种被知晓,这种知晓允许一种被觉察的东西被实施,或者更准确地,允许作为常识基础的关于社会世界意义的一致意见被正式

实施,即在每个人面前并且以每个人的名义。

施事性巫术的秘密由此就在职位的秘密(“mystery of ministry”,使用接近中世纪宗教法规学者之心的双关语)^①中解开了,即在表征(在这一措辞的不同意义当中)的炼金术中,通过它,代表们创造了创造他们的群体:被赋予了代表群体讲话和行动的全部权力的发言人,最初是通过口号和标语的巫术作用于群体的,他是群体的替代者,而此群体只有通过这种代理才存在。群体造就了人,而这个人则使虚构的人物具体化,他从分立个人的简单聚合状态一跃而出,使他们通过他来行动和说话,“就像一个人一样”。相对地,他接受了以群体的名义说话和行动的权力,“把他自己当作”他所具体化了的群体,等同于“他所为之奉献了身体和灵魂”的功能,由此将一个生理实体赋予了一个构成性实体。地位就是法官(*Status est magistratus*);“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或者,换一种说法,世界就是我的表征。

① “ministry”的意思是“教士或者公使的职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代表的代表性地位是造成他所具有的表达性魅力的原由。因为该词所具有的“教士职位”与“公使职位”的双重含义,所以“ministry”一词在这里发挥了一种双关语的作用,因此说是“接近宗教法规学者之心的双关语”。——译者

1. 权威化的语言： 使仪式性话语有效的社会条件

假设，例如我看到造船台上有一艘船，就走过去打碎挂在船柱上的瓶子，宣称“我命名这艘船为斯大林号”，并且为了加重分量而踢走垫木：问题是，我并不是被选来为它命名的那个人……

J. L. 奥斯汀(J. L. Austin),《如何以言行事》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对于词语之权力的幼稚疑问，合乎逻辑地暗含在对语言之运用的质疑的压抑，因而也对词语得以运用的社会条件的质疑的最初压抑中。一旦我们把语言当作一种自主的客体来对待，接受由索绪尔所做出的对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根本区分，对语言之科学和语言的社会运用之科学的根本区分也就注定了要在词语内部寻找词语的权力，即在它并不存在的地方寻找它。事实上，表达的话语施事力量并不能在该词语，例如“施事性”这一词的内部找到，尽管在这一词语的两种含义中指示出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表征了那种力量。只有在特殊的例子中(在实验所创造的抽象的和人为的场合中)，象征性交换才被降格为单纯的交流关系，信息

的资料性内容才会占尽交流的内容。词语的权力只不过是发言人获得了授权的权力而已,他的发言——即其话语的内容以及与其不可分割的讲话方式——只不过是一种声明,除其他内容外,它声明的是关于赋予他的授权保证。

当奥斯汀(还有他后来的哈贝马斯)以为自己在话语自身之中——就好像是在言语的具体语言物质之中——找到了话语有效性的关键时,他以一种最为成功的方式表现出了其所犯错误的本质。通过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理解语言表达的力量,通过在语言之中寻找隐藏于语言惯习的逻辑和有效性之中的规律,人们往往会忘记,权威是来自语言之外的;这是一个被荷马史诗中传给将要开口的讲话者的权杖所具体证明了的事实。¹语言至多也只是代表了这种权威,表现了它,并且把它象征化了。这里有一种作为所有制度话语之特征的修辞法,也就是说,一个被授权的发言人在一个严肃的场合表达他自己的正式话语,具有一种其限制与其机构的授权程度相一致的权威。刻画了神父、教师以及更普遍地,所有制度,例如那些被日常化、格式化和中性化的制度的语言的风格特征,都来源于这些被赋予了一定代理权威的人们在竞争性的场域中所占据的位置。

这还不足以说,像人们有时为了避免单纯从内部接近语言时所固有的困难而做的那样,决定性的言说者在一个决定性的环境中,以其风格、修辞和社会标志的身份所做的对于语言的运用,为词语提供了一种与特定上下文紧密相关的“内涵”,把给予话语“话语施事力量”的剩余含义引入到了话语之中。实际上,对于语言的运用,其方式与其话语的内容一样,取决于言说者的社会地位,因

为社会地位决定了言说者使用制度语言也即官方的、正统合法的话语的机会。正是这种使用合法表达工具的机会,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于制度之权威的参与,制造出了所有的、不能就此简化为话语差别的差别,即在那种直截了当地伪装顶替,把施事话语伪装成是描述性的或者论断性的陈述,²与在授权和制度权威之下所做的同样被授权的伪装之间的差别。而发言人正是一个被赋予了权杖的顶替者。

如果,按照奥斯汀所观察到的,那种其角色不仅是“描述事物的状态或者陈述某种事实”,而且是要“施行一种动作”的言说是存在的,那么这是因为,词语的权力在于这一事实:即它们并非仅仅是代表作为这些词语的“传达者”的个人而宣布出来的,授权的发言人只能使用这些词语以作用于其他能动者,并且通过其他能动者的行动,作用于事物本身,这是因为,在他的言说中集中包括了群体累积的象征性资本,即选举他并且由他作为其权威化的代表的群体所累积的象征性资本。社会物理学的规律只是从表面上看来与物理学规律无关,某些特定口号所具有的、自己不需费力就能促成其他人努力的力量——这正是巫术行动的目标³——根源于群体通过努力累积起来的资本,其有效使用从属于一整个系列的社会条件,正是这些社会条件界定了社会巫术仪式。为了使施事话语成功所必须满足的大部分条件,落到了言说者之适合性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社会功能——和他所说话语之功能的问题上。每一次,当施事话语由不具有宣布它的“权力”的人所宣布时,都注定会失败;或者,更为通常的情况是,每一次当“给定状况中特定的人和条件”不符合行使特定程序的要求时,它注定会

失败；⁴ 简而言之，每一次当言说者不具备吐出他所说字句的权威时，此施事话语必定失败。但是或许我们需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种社会巫术运作的成功——由权威的行动，或者由与其相当的、由经过授权的行为所构成的——取决于构成社会仪式的一系列互相影响的条件的结合。

显然，只要人们没有在话语特征、宣布它们的人的特征和授权给他宣布它们的制度的特征之间建立关联，那么所有要在不同形式的争论、修辞和风格的具体语言逻辑中寻找它们的象征效力源泉的努力都注定会失败。奥斯汀界定施事话语之努力的局限（也是其旨趣）就在于他并未确实地在做他所认为自己正在做的事，这也就使他不能够将其贯彻到底。他自认为在语言哲学方面有所贡献，但他实际上是在创造一套关于特定阶级的象征性表达的理论，依此理论，权威的话语只是一种范例的形式，并且其特定的效力来源于以下事实，即他们看上去在其自身之中就拥有一种权力的源泉，而实际上这种源泉是存在于其得以生产和接受的制度条件之中的。

权威话语（例如报告、布道等）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需要被理解（在某些时候它虽然没有被理解但是仍然具有力量），而且它仅在被认可为权威话语的时候才能发挥其特殊的效果。这种认可——无论是否伴随着理解——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以一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方式给予的，也就是说，这些条件界定了合法的用法：它必须由法律许可这样做的人说出，即拥有权杖的人，被认知为能够生产和被许可能够生产这种特殊类别的话语的人：牧师、教师、诗人等；它必须在合法的环境中说出，也就是说它必须在合法的接

收者面前(谁也不可能在内阁会议上宣读一篇达达主义的诗歌)说出;最后,它必须按照合法的形式(句法、语音,等等)说出。我们称之为礼拜仪式的条件的东西,即控制着权威的公开表现形式的一整套规定,例如正式的礼仪、姿势的规则和正式规定的礼节,很显然只不过是一个因素,尽管是最明显的因素;而在条件的系统之中最重要的和最必不可少的东西,是那些在误识和相信的意义上,生产出认可的性情倾向的因素,也就是将其权威授予获得了授权的话语的权威委任。而专门集中于正式条件之上以寻求仪式的效力的人忽视了这一事实,即只要对这种仪式产生认可的条件未被满足,那么为了仪式话语有效运作,为了使圣礼既正确又有效而必须满足的仪式条件就是永不充足的:如果没有其所控制的诸因素的合作,如果没有能够产生这种同谋关系的基于误识——作为所有权威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机制的帮助,权威的语言就无法进行控制。为了测知奥斯汀与所有其他严格的形式主义者对象征性系统之分析所犯错误的重要性,只要证明权威语言仅仅是合法语言的一个限制性的例子就足够了。其权威并非如社会阶级的种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韵律与发音的区别上(正是这些特点,界定了优越的发音),或者句法的复杂性和词汇的丰富性之中,换句话说,即话语本身所固有的特点之中;而是存在于社会条件当中,这种社会条件是为了使各阶级对合法语言的了解与认可的分布得以生产与再生产所必须满足的。

这些分析在制度化了的信仰危机与仪式话语的危机——这两种危机是彼此支持的——的相伴发生中,找到了准实验性的例证。奥斯汀对施事话语的效力条件的分析,在其纯形式的创造性中看

起来非常苍白和单薄,尤其是当我们把它同真实的分析与批评相比较时更是如此,这里所说的真实的分析与批评,是由教会里的危机引起的,它分出了宗教仪式的成分——成员、工具、时间、地点等——这些成分迄今为止一直都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个系统里的,这个系统则与对其生产与再生产负责的制度一样,是内在一致的和统一的。从对所有对违反了传统礼拜仪式的事物的义愤列举中所展示出来的是一幅画面——一种逼真而生动的否定——一幅关于为了使仪式话语被认可,即被作为仪式话语接受所必须满足的一系列制度条件的图画。仪式若要正常运作并且发挥功能,它首先必须使自身呈现出合法性并被认为是合法的,它必须具有格式化的象征,这种象征可以准确地起到显示其代理人并非是在自己的名义下以自己的权威在行动,而是以其作为一名代表的资格在行动的作用。“两年前我邻居一位老妇人快要去世了,要我去请神父来。他来了,但是却没能给圣餐,举行完了最后的仪式,他吻了她。如果是我在人世的最后一刻请来神父,那可不是要他来吻我,而是希望他能给我带来通往天国的旅程所需要的。这个吻只是一种父亲式的表现,而不是神圣的教士的。”仪式象征以其自身的名义是无效的,只有在其代表着——在这一词的戏剧性意义上——授权时,才是有效的。对于控制着神圣姿势和言语的统一的礼拜仪式规则的严格遵奉,既构成了授权契约的展示,也构成其对应物,而这种契约关系则使得神父成为神之力量的化身和“操纵着救世本领的垄断权”的拥有者。相对地,抛弃权威的象征性属性,例如教士穿的黑长袍、拉丁语、献祭物与地点,就凸显为对古老代理契约——把神父和信徒通过教会这一中间媒介而联系起来的

代理契约——的违背。信徒的义愤强调了这一事实：使仪式有效的条件，只能通过被赋予了掌握着其操纵权力的制度才能得以满足。在礼拜仪式危机中，至关重要的是整个条件系统，这些条件是为了使制度正常运作所必须满足的，即授权并且规范礼拜仪式之使用的制度，也是通过确保被选出来执行它的人的遵奉以保证其历经时间和空间而保持一致性的制度。这样，语言上的危机就暗示着确保合法的发出者与接收者的生产机制的危机。当愤怒的信徒们把仪式的混乱多样与信仰制度的危机联系起来时，他们并没有错：“每个教区的神父都成了一个教皇或小主教，信徒们无所适从。一些信仰者面对这种变化的洪流，不再相信教会的稳固性和它拥有真理。”⁵ 礼拜仪式的多样性，作为把神父与教会联系起来，并且由此而把神父与信徒联系起来的那种授权契约的再界定的最为清晰的表现，正以如此强烈的方式为一大群信徒与神父所体验着，因为它们揭示了教会内部权力关系的转变（尤其是在高级牧师和普通牧师之间的），而这种转变是与神父再生产的社会条件的变化（神父“职业感召”的危机）和世俗人员的变化（“非基督教化”）相关联的。

新仪式或施事功效之欠佳*

“我必须承认我们非常惊愕，对这种鼓励抛弃教堂，在小社群内〔1〕进圣餐，在家里〔2〕或者在小教堂〔2〕，人们在那儿自助〔1〕圣餐圣饼，由世俗人员〔1〕用盘子上菜，目的是在人们所在的任何地方〔2〕用圣餐，等等。”（第47页）

“你将随时都能为你的教堂祈祷。但是在一个被剥夺了神圣性的教堂里[2]，这样一种祷告还有什么意义？完全可以在家里朗诵。”（第 48 页）

“我们不能再在我们的小教堂里做弥撒，我们在某人家里[2]做。”（第 59 页）

“很不幸我们没在大主教的辖区里。我们不得不受‘年轻神父四重奏’这种放肆想法的支配，去年他们想出这样一个主意，把严肃的初次圣餐仪式——在完全废除它之前——放在体育中心举行[2]，尽管我们拥有两座大而美丽的教堂，有充足的房间足以容纳所有人。”（第 66 页）

“我母亲被 ACI 的牧师吓坏了，他竟然要在餐桌上[2]举行弥撒。”（第 90 页）

“告诉我您会怎么想，神父，像我们教区一样，一场在早晨[3]举行的、其后没有任何其他仪式的圣餐？”[5]“我们整天待在餐桌旁，吃啊，喝啊，”一位苦恼的母亲对我说。（第 72 页）

“在这附近的某些教区他们什么都不再做。在我们这儿，下午[3]有颂信词仪式，持续不到一个小时[4]，没有弥撒或者圣餐[5]，孩子们次日再去参加弥撒。”（第 87 页）

“人们如何看待某些神父（在一些教区里是所有神父——这肯定是传染性的）的态度呢？当他们把圣体取出或者送回圣体盘时竟没有一点尊敬的表示[5]，哪怕是行屈膝礼或者鞠躬一躬。”（第 82 页）

“过去人们常说：‘让我们不要堕入诱惑’，但是现在人们说[6]：‘让我们服从’或者‘引导我们不要堕入诱惑’。真可

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自己这样说。”(第 50 页)

“出乎意外,在一座古老的哥特式教堂里听到‘万福,玛利亚(*Je vous salue Marie.*)’这一正式称呼采用了一种特别随便的称呼形式‘嗨,玛利亚(*Je te salue Marie.*)’。这种随便[6]与我们法语的精神很不般配。”(第 86 页)

“回来时,经过两天的‘静修’[6],严肃的圣餐被削减成五点钟[3]的坚振仪式,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3],穿着日常的服饰[7](没有弥撒[5]也没有圣餐)。“私人”圣餐已经只不过是片面包[8]了。而且……没有忏悔[6]!”(第 87 页)

“但是我建议,考虑到‘身份’[5],你必须格外提及那些接受圣餐时匆匆忙忙[4]的人,这很令人震惊。”(第 49 页)

“一点预兆都没有,副主教在随便什么时候[3]小跑着过来,所有的事情突然就都准备好了。饼从口袋里[5]拿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啦!我们还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不是什么世俗人员[1]用小粉盒[8]或者廉价的镀金药盒[8]装着圣餐到来。”(第 120 页)

“他特意采用了下面的圣餐方法:信仰者在圣坛后面站成一个半圆,装有圣餐的盒子互相传递。然后神父亲自捧上圣餐杯(每个星期日——我认为教皇将此作为了例外)。我感到我不能自助式地去享用圣体[5](上帝保佑那些自己去碰触救世主圣物的人们……但是对于救世主自己呢?……),为了要求按照传统的方式把圣餐送进我嘴里,我必须进行协商和争论[5]。”(第 62—63 页)

“今年冬天,病情恢复并且有几个星期没有领圣餐了,我

去附近的一个小教堂庆祝弥撒。我发现自己被拒绝〔5〕领圣餐，因为我无法自助式地享用圣体〔5〕和从圣餐杯里喝水〔5〕。”（第 91 页）

“行坚振礼的女孩的祖父被圣饼的个头吓坏了〔8〕；任何一块圣饼‘都是一道地地道道的点心’。”（第 82 页）

“我自己在一座教堂里发现做弥撒的神父请来了流行歌手〔1〕。我不懂音乐，我想他们或许表演得很好，但是以我愚见，这种音乐于祷告无益。”（第 58—59 页）

“今年我们行坚振礼的代表既没有书也没有念珠〔8〕，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他们一无所知的圣歌，并且由一群业余歌手演唱〔1〕。”（第 79 页）

“因此我要为我们如此轻易地放弃了圣物〔7〕提一点请求（教堂入口的圣水，复活节前星期日献祭的黄杨树枝，这些他们开始要打发掉了……），对圣心（或多或少被杀死了），对圣处女，对濯足节‘坟墓’的忠诚，很难——实际上是不可能——与晚祷和谐一致；当然还有格列高利圣咏，以及我们已经被剥夺了的许许多多美妙的文字。甚至去年耶稣升天节前三天的祈祷仪式，等等。”（第 60 页）

“最近在一所寺院里——在那里来自法国各地的、具有‘神父的雄心’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神父做弥撒时既没有用装饰也没有用圣物〔8〕。穿着便服〔7〕，他使用一张普通的餐桌〔2〕，用普通的面包和酒〔8〕，以及普通的餐具〔8〕。”（第 183 页）

“我们从电视上看到这样令人发窘的弥撒……近乎于读

圣(在里尔^①用的小桌子,神圣的(?)圣餐由挎篮子[8]的妇女[1]奉上,伴随着爵士乐[5],等等)以至于我今后将避免参加这些不可思议的典礼!”(第158页)

“妇女[1]公然地在布道坛后诵读使徒书,唱诗班只有几个或者根本没有孩子[1],并且甚至由妇女奉上圣餐[1],就像在阿朗松^②一样。”(第44页)

“……这就是在那些副主教更有可能是过剩而非不足的教区里,当圣餐没有像糖果那样由世俗人员[1]分发时的情况。”(第49页)

“当圣餐时间来到时,一位妇女[1]从队列里冒出来,拿起圣餐杯为助手们斟上圣餐酒[8]。”(第182页)

* 所有这些引文(圆括号中的数字指页码)摘自 R. P. 勒隆的著作《庄严圣餐的黑色卷宗》。方括号中的数字指示被信徒记下的仪式的错误:[1]主持人错误;[2]地点错误;[3]时间错误;[4]速度错误;[5]举止错误;[6]语言错误;[7]服饰错误;[8]圣礼错误。

礼拜仪式的危机指示着神父制度(以及整个牧师场域)的危机,而神父制度的危机本身就暗示着宗教信仰的普遍危机。它通过一种准实验式的拆除,揭露了“恰当的条件”,即允许从事仪式的一系列代理者恰当地完成仪式的“恰当的条件”;它还回溯性地展示了,这种客观和主观的恰当性是基于对这些条件的一无所知之

① 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译者

② 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城市。——译者

上的,而这种一无所知界定了其与社会仪式的观念性关系的范围,建构了使仪式有效完成所最必不可少的条件。仪式的施事性魔力,只有在负责执行它的宗教官员以集体的名义并且作为集体与它自身之间的一种媒介而运作时,才能完全发挥其功能:是集体通过其媒介,以其自身的力量,实现了施事话语之中所包含的巫术性效力。

词语的象征有效性仅仅在此时,即在受其支配者对这一事实——即执行者是授权如此做的这一事实——给予认可时才能施行;或者,换一种说法,只有在他没有认识到他自身通过认可与服从,而促成了其实现时才能实行。它完全建立在一种信仰之上,这种信仰是被称为教士的社会假想的基础,并且比教士所祷告和保证的信仰与神迹更深一层。⁶这也就是为什么宗教语言及其施事有效性的危机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限于一种表征世界的坍塌;它是其所组成的整个社会关系世界瓦解的一部分。

2. 制度的仪式

利用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的概念,阿诺尔德·范热纳普(Arnold Van Gennep)命名了,实际上是描绘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我不认为他所做的远多于此,那些像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这样的人也没有;后者接受了他的理论,并且对仪式的各阶段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确和系统的描述。实际上,在我看来,要将过渡仪式的理论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提出一些这一理论尚未提出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关于仪式的社会功能以及这种仪式允许人们以合乎法律的方式忽略或者逾越界限或者限制的社会意义。人们可以自问,通过强调时间的过渡——例如从孩提到成人——这一理论是否掩盖了仪式的基本影响之一,即区分那些受礼者与那些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会经历此仪式的人(而不是那些还未受礼的人),也即在那些这一仪式适用的人与其不适用的人之间,建立了永远的区别。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把它们描述为过渡仪式,我宁可称它们为圣职授位仪式(rites of consecration)或者合法化仪式(rites of legitimation),或者更简单地称之为制度仪式(rites of institution)——使用这一词所具有的最积极的意义,可以体现在例如“institution d'un héritier”(“指定继承人”)的表述中。为什么要这样用一个词语来代替另一个词语呢?我将引用彭加勒(Poincaré)的

话,他把数学的概括定义为“给予不同事物以同一名字的艺术”,并且坚持词语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如他过去经常说的,当语言选择得比较好时,关于已知物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就可以应用于所有种类的新事物。我将要推进的分析,是从对精英学校运作方式的分析结论¹的一般化中而产生的。通过一种有些风险的运用,我将努力从中引导出被理解为制度仪式的社会仪式所具有的恒定特征。

谈到制度仪式,就要假设,所有的仪式都趋向于使一种任意的界限神圣化或合法化,这种神圣化或合法化是通过促进对这种限制的任意性的误识,以及鼓励将其认可为合法化而做到的;或者换个角度说,它们趋向于卷入一种对构成了社会和精神秩序的限制——仪式之所以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不计一切代价地维护这种限制——的严肃违反,即个人以一种合法的和超常的方式做到的,例如关于婚姻仪式的性别区分。通过严肃地标志出对于构成了社会秩序之基本区别的界限的逾越,仪式把观察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过渡上(由此产生了“过渡仪式”的表述),然而最重要的却是这一界限。这条界限实际上区分的究竟是什么?显然,它分开了一个以前和一个以后:已经过割礼的孩子和未经割礼的孩子,或者甚至是所有未受割礼的孩子们与所有已经受过割礼的成人。实际上,最重要却没有被注意的区别,是其在所有那些须经受割礼的人们,男孩或是男人、小孩或是成人,与那些不必经受割礼的人们,即女孩或者女人们之间做出的区分。这样,被授职的群体就因其与隐藏着的一系列个体的关系而被界定出来。这一仪式最重要的影响是仪式中最少被注意到的:通过对男人与女人的区别

对待,仪式使这一区别神圣化,也就是说仪式实施了这一区别,同时将男人设定为男人,即受过割礼的;而女人之为女人,即无须接受这一仪式手术。对于卡比尔人^①(Kabyle)的仪式的一种分析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割礼不仅使年轻男孩同他的孩提时代,或者同仍处于孩提期的男孩们分别开来,而且同女人们即女性世界,即同母亲、同与她有关的所有事情——湿润,绿意,原始,春天,乳汁,温和,等等——分别开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制度的过程是由指定的社会性质的属性构成的,以使其看起来好像是自然的属性的方式,所以制度仪式从逻辑上趋向于如皮埃尔·森提里维尔(Pierre Centlivres)和卢克·德·胡斯科(Luc de Heusch)所观察到的,将具体的社会对立,例如男性的与女性的,统一为一系列宇宙之中的对立——如男人之于女人就像太阳之于月亮——它体现了将其自然化的一种有效的方法。由此,性别区别的仪式使两性之间的差别神圣化:它们建构出一种简单的事实区分,以作为合法的区分,作为一种制度。在这种仪式中所完成的分隔(仪式本身就产生一种分隔)起到了一种神圣化的效果。

但我们是否真的明白神圣化的意义,尤其是使一种区别神圣化的意义呢?我所称之为“巫术般地”使区别神圣化的效果是如何达成的,它的技术影响又是什么呢?通过一种建构行为,社会性地为一种早已经存在的区别——例如性别间的分隔——进行制度化这一事实,是否仅仅具有象征性的影响——当我们提及象征性礼物时给予这一词的含义——或者换句话说,它根本就没有影响?

① 卡比尔人,住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地的柏柏尔人。——译者

有一句拉丁语谚语的意思是“你在教鱼游泳”。这也正是制度仪式所做的。它所说的意思是：这个男人是一个男人——暗示着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而这一点并非总是那么明显的。它趋向于使一个最小、最弱，简而言之，最为女子气的男人，成为一个真正具有男子气的男人，在属性和本质上与最男子气的、最高大强壮的女人相区别。建立制度，在此例中就是使之神圣化，即认可并且使事物的一种特殊状态或者一种既定的秩序神圣化，以与宪法(constitution)这一词以其法律与政治含义所做的完全相同的方式。授权(investiture)(骑士、下院议员、共和国总统，等等)是通过使之家喻户晓和得到认可，而使差别(先已存在或未存在的)受到承认和尊崇；它包括使其作为一种社会区别而存在，并为被授权的代理人和所有其他人如此认识和认可。

简而言之，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要理解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样发生的(其发生的程度就如护身符是巫术的一部分一样)最基本的社会现象，社会科学必须要考虑到制度仪式的象征效力，也就是说，它们所拥有的那种通过作用于其表征而作用于现实的权力。例如授权的过程，在它确实改变了被神圣化者方面，发挥了非常真实的象征效力：首先，它改变了别人对他的印象，尤为重要是，它改变了他们对他所采取的态度(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被授予了尊贵的头衔这一事实，并且这种尊贵确实是与这些宣告相关的)；其次，因为它同时改变了被授权者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为了与这一看法相一致，他感觉自己有义务采取的行为举止。由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理解所有关于信用和信任的社会头衔——各种信用证明——的效力，例如贵族头衔和学术职称，通过增加对其价值

的信任的程度和密度,它们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提高了其持有者的价值。

制度的行为是一种能够从虚无中创造出差异的社会巫术行为,或者(实际上更常见)通过利用先已存在的差别,例如性别的生理差别,或者,如在以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继承人设定的情况中,年纪的差别。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如同涂尔干对宗教的评价一样,它是一种“理由充分的欺骗”,是一种象征性的强制,但是这种强制从根本上来说是实际的(*cum fundamento in re*)。最有效的社会区分是那些以一种基于客观区别之上的面貌出现的区分(例如,我想到地理学中关于“自然边界”的概念)。无独有偶,如在社会阶级的例子中一样,很显然,由于不同的分类原则产生出不同的并且从来就不会完全一致的分割法这一事实,所以我们总是在处理连续统一体,处理连续不断的分类。然而,社会巫术总是能够从连续性中产生出不连续来。此方面的例证,也是我的出发点,就是竞争性的学术考试(竞赛):在最末一名通过者与最初一名不及格者之间,竞争性考试创造出了可以历尽一生的拥有一切和一无所有之间的差别。前者可以从像综合工科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那样的精英学校毕业,并且享受所有相关的优势和好处,而后者则将成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我们可以用来技术性地判断高贵差别(被理解为合法的差别)的所有标准,都不会是完全契合的。例如,最贫穷的贵族剑术家仍保持着高贵(即使他的形象被玷污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这种程度随民族传统和历史时代而有所不同);而与此相对,最好的平民剑术家还是平民(即使他能从其典型的贵族式优秀表演中获得“高贵”

的形式)。同样地,在任一时期,每一种界定高贵的定义都是如此:风度、优雅等。一种身份的制度可以成为高贵或者耻辱(“你只不过是一个……”)的头衔,这是一种名称的强加,即社会本质的强加。设立制度,即指定一种本质,一种能力,也就是强加一种权力,一种以这样的存在(或者将这样存在)为义务的权力。它向某人指示他是什么并且因此他应当如何表现自己。在此情况下,所指示的就是强制的。荣誉的符号只是一种说某人是“人中之人”的发展了的表达形式。设立制度,即给予一种社会界定,一种认同,也就是强加了边界。因此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 oblige*)或许可以翻译成柏拉图的“*ta heautou prattein*”,即为了维持自身的本质而行动,在贵族的例子中就意味着行事应当与自己的地位相称,不要辱没了自己的身份。对贵族来说就是要举止高贵,高贵性的源泉在高尚行为之中,这与高尚行为的源泉就在于高贵性本身之中一样清楚。今天早晨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下文:“对于库特·富格勒^①,联邦委员会的主席来说,星期二晚上在埃及总统安沃·萨达特^②去世后对埃及人民表示了联邦委员会的慰问是适合他的身份的。”被授权的发言人是应该并且有义务代表群体讲话的。这既是他的权力也是他的义务,是他的适当的功能,用一句话说,这是他的权能(从这一词语的法律意义来说)。社会本质就是那些社会属性和社会归属,是由作为一项严肃的分类行为、趋于产生其所指定效果的制

① 库特·富格勒(Kurt Furgler),时任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译者

② 安沃·萨达特(Mohamed Anwar el Sadat, 1918—1981), 1970—1981年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与以色列贝京(Menachem Begin)共获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1981年在任内遇刺逝世。——译者

度行为所产生的。

因此,制度的行动是一种交流活动,但是它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别:它向某人指示出他的身份是什么,但是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即通过在所有的人面前宣布(即 *katagorein*,最初的意思是当众指责)并且由此以一种权威的方式告诉他,他是什么,他必须做什么,将这些东西既向他表明又强加于他。这在辱骂中非常明显,一种咒骂(*sacer*,也是表明诅咒的)试图将其对象限定在描绘了其命运的诅咒之中。但这在授权或者命名的行为——即一种对指定给相关者的社会定义中内含的所有属性的具体社会判断——中更为真实。通过依法指定的影响(贵人行为理应高尚),制度仪式产生了其最为“真实”的效果,被指定者感到有义务奉行其定义,奉行其功能性的地位。指定的继承人(按照一种或多或少任意武断的标准)被整个群体——从其家庭开始——如此认识和对待,而且这种区别和不同的对待只会鼓励他实现其本质,使其行为与其社会本质相一致。科学社会学显示,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由来自最著名学术机构的研究者所取得的。这可以从高水平的主观抱负来进行解释,这些抱负由群体(即客观上)对它们的认知以及他们之被指定为属于某类人(男人、精英机构的学生、有成就的学者等)所决定,对于他们来说,抱负不仅仅被作为权力与特权被授予和被认知(与妄想者自命不凡的自诩相反),而且还像责任和义务一样,通过强调、激励和不断的号召而被指定并且被强加。我想起在舒尔茨(Schulz)的卡通片中,史努比(Snoopy)坐在它的狗窝上说:“一个最优秀的人怎能做到谦虚呢?”我们只能这样说:当其成为共识——这是正式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大家都认为某人是最优秀的,

是贵族(*aristos*)^①的时候。

“成为你所是的人”，这是在所有制度行动的施事性巫术背后隐藏着的一条规则。通过命名和授权而指定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种命运[这对于训诫(*injunctio*)来说也是并且尤其是真实的，这些有时是心照不宣有时是清楚明确的戒令，是由家族的成员不断地对小孩子提出来的，在其意图和强度上按照社会阶级而有所区别，并且在强度上，按照性别和亲属关系整体内部的级别而有所区别]。所有社会命运，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被神圣化了的还是带有耻辱烙印的，都同样是决定性的——我指的是在道德上的——因为它们把那些被认定属于限制之内的人们局限在了这种限制之内，而这种限制是指定给他们并且要求他们给予认可的。自尊的继承人将举止像一个继承人，并且按照马克思的表述，将被世袭财产所继承：即投资于这些事物并且被他自己所占用的东西占用。这当然不包括意外事故。这里有例外：不配名份的继承人，不听从召唤的神父，辱没了自己的贵族和变成平庸的资产阶级。然而界限，即神圣的边界，仍然清晰。欧文·拉铁摩尔^②经常说，中国的长城不仅是为了阻挡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且还是为了阻挡中国人离开。这也就是所有巫术式界限的功能(无论这界限在男性与女性之间，还是在那些被教育所选中和拒绝的人之间)：阻止里面的人，在界限的正确的一侧不要偏离，不要辱没或者贬低自

① “*aristos*”是“*aristocrate*”的简写，意思是贵族。——译者

②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美国东方学家、著作家和教育家。——译者

己。帕累托^①过去常说,当精英不再相信自己,当他们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和美德,开始向错误的方向跨越界限时,他就注定将要被“废弃”了。这也正是制度行动的功能之一,永远阻挡任何要跨越界限,即违反、擅离或者放弃边界的企图。

所有贵族都必须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去劝说那些被选中者关于接受由特权——或者是为了取得作为保持特权之条件的持久的性情倾向——所暗示的牺牲的必要性。当那些占据支配性地位的群体就是文化群体,也即几乎毫无例外地是禁欲主义的和紧张而竞争的群体时,制度的工作就必须要认真对付由人性或者反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诱惑了。(我想附带加上一点,在提到制度的工作和通过把对持久的性情倾向或多或少痛苦的灌输作为社会制度行动的基本要素时,我只是试图给予“制度”这个词以其充分的重要性。彭加勒已经强调了词语选择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如下建议或许会有所帮助:即只要集合 *instituere* 与 *institutio* 的不同意义^②就能够形成一个关于设立、创办,实际上是关于发明的就职行为的观念,它通过教育,达到持久的性情倾向、惯习和用法。)为了有效防止降低自己身份的诱惑,一种普遍采用的策略就是使差异自然化,即通过灌输并且把它合并到惯习的形式之中,而将它转化为第二种本性。这就解释了在如涂尔干所说的,注定要创造超

① 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32),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洛桑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讲义》、《政治经济学提要》、《普通社会学》等。——译者

② 此二词都是拉丁语词,前者意为“建立、创立”,后者意为“体制、构造、习惯、教导”。——译者

常的人(一句话,杰出的人)的否定仪式当中,苦行行为甚至是身体痛苦被赋予的角色。这也解释了在普遍施加于未来“精英”成员身上的训练(学习已死亡的语言,感受长时间的隔绝,等等)的作用。所有群体都把他们的最珍贵的东西委托于身体,就像对待一种记忆一样;并且,如果人们认识到,如心理学实验所显示的,人们对于制度的坚持与其入会仪式的痛苦和严厉程度是直接成正比例的,那么所有群体的人入会仪式所加于身体的痛苦的功用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通过灌输工作,可以达到对任意武断的限制进行持久强加的目的,能够起到使构成了任意武断的文化界限的决定性断裂自然化的作用。而这些以基本对立,例如男性的/女性的等表现出来的文化界限——以界限的意义形式,使一些人倾向于维护自己的级别与距离,使另一些人知道自己的地位并且满足于此,成为他们所必须成为的人,由此恰恰从剥夺的本意上剥夺了他们。它还趋向于灌输持久的性情倾向,例如阶级品味,作为隐藏于表达了社会地位的、对外在符号的“选择”背后的准则,它同服饰,还有身体魅力或者语言一起,使所有社会能动者都成为了独特标志的承载者,对于这些独特的标志来说,区分的标志仅仅是在阶级之下的,能够像明确的禁令或屏障那样团结或者分隔人们——在这里我想到了阶级内婚制。比装饰身体的外部标志(如装饰品、制服、军服上的条纹、徽章,等等)更具有说服力的,是支撑着所有实践生产的合成标志[例如仪态,讲话的方式(口音),走路和站立的姿态(步态,姿势,举止),餐桌礼仪以及品味等],无论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通过区分性差异的相互作用,它们都以指示并且是指示社会位置为目标,这些标志注定了要按照众多要求的命令发挥作用。凭

借这种力量,那些或许已经忘记了其位置(或忘记了自己)的人们重新记起了由制度所指定给他们的地位。

通过制度得以实现的、给属性分类的判断标准之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能够抗拒所有实践的拒绝。常见的一个例子是坎托罗维奇^①关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分析:被授权的国王要比作为凡人的、有可能会生病、愚笨或者死亡的生理上的国王更长命。同样地,如果一个像综合工科大学那样的精英学院的学生,在数学方面表现出他的无能,大家会认为他是故意的,或者他把精力花费在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但是最能阐明与成就相关的归因的自治性(*ascription*)(这一次我们可以参考塔尔科特·帕森斯^②),以及与作为相关的社会存在的自治性的,无疑就是退而选择屈尊策略的可能性。屈尊策略允许把对社会定义的否定推至极限,而仍旧按照这种社会定义被看待。屈尊策略是对界限的象征性违反,它同时提供了来自对社会定义的承认的利益和来自违背它的利益。有一个例子是拍他车夫屁股的贵族,人们会这样说他,“他是个直率的家伙”,认为对于一个贵族来讲这是直率的,即从理论上说,对于一个本质上优越的人,原则上其本质不会使他做出这种举动。

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而且我们不得不引入一种区分:在叔本华的一部著作中他提到了“学究式的滑稽”,即当一个角色做出一

① 坎托罗维奇(Hermann Kantorowicz, 1877—1940),德国法学家。社会法学派和自由法学派在欧洲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学与社会学》、《独裁制》、《为法律科学而科学》、《法的定义》等。——译者

②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5),美国社会学家,提出并论证了“社会行动论”和结构功能论的系统观点。主要著作有《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进化的与比较的观点》、《现代社会的体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行动的进化》等。——译者

种并非在其概念定义范围内的行为时所引起的笑声——以一种叔本华所谓的舞台上的马匹开始在台上拉粪便的方式。他提到了一些教授,尤其是德国的教授,如《蓝色天使》(*The Blue Angel*)中的垃圾(Unrat)教授^①,由于他们是在如此强有力的和狭窄的定义范围中构思出来的,所以他们对界限的违反就显得特别突出。与被热情冲昏了头,失去了所有荒谬感或者——换句话说——所有尊严感的垃圾教授不同,被神圣化了的屈尊者有意选择超越界限;他享受关于特权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包括享有可以随意对待其特权的自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语言方面,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可以允许他们自己采取次准确的以及放松紧张的形式,而这对于小资产阶级个人来说则是禁止的,后者被注定了要超准确。简而言之,神圣化的特权之一在于这一事实,即通过授予被神圣化的个人以一种不可否认和无法抹去的本质,它授权了一种越界,而这种越界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遭到禁止。确信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人可以玩弄文化游戏规则;他可以坦言他喜欢柴科夫斯基或者格什文^②,甚至有勇气说他喜欢查尔斯·阿兹纳乌尔^③或者“B”类电影^④。

① 垃圾教授是德国小说家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 1871—1950)的小说《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中的主人公。这部小说后被改编成电影,更名为《蓝色天使》,1930年代曾在欧洲轰动一时。——译者

② 格什文(George Gershwin, 1898—1937),美国作曲家,初为流行歌曲的作曲者,曾汲取黑人舞曲以及爵士乐的节奏、音调特点和配器风格,创作交响乐及歌曲。主要作品有《蓝色狂想曲》和歌剧《波吉与贝丝》等。——译者

③ 查尔斯·阿兹纳乌尔(Charles Aznavour),法国20世纪著名乡村音乐歌手。——译者

④ “B”类电影是一些大片厂为了促销,除放映自己片厂的作品之外附送的由二三线片厂生产的成本低廉的电影。这类电影大多追求暴力血腥、恐怖色情,故事内容往往愚蠢肤浅,主要针对15—35岁的寻求刺激的男性。——译者

社会巫术行为是多样化的,例如婚姻或者割礼,头衔或学位的授予,骑士称号的赋予,官员的任命,通告或表彰,某种品质标签的赋予,或者通过署名或首字母予以确认,都是制度活动,即意味着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向某人或某事物赋予这种或那种职位或者特权——并且是只有以整个群体或某种认可制度作为保证才能成功的一种制度。即使这种行为是由某一位获得了正式授权的单个能动者以被认可的形式完成的(也就是说,按照习俗,在时间、地点、方法等方面都是适合的,整个一套要素都是正确的,即从社会角度来说是正确的并且因此是有效的仪式),它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存在于整个群体(他们可能亲自在场)的信仰之中的,也就是说,存在于社会风尚对有效仪式的制度条件的了解和认同之中(这暗示着仪式的象征效力,这种效力依仪式的目标受众或多或少的准备程度,或者或多或少被安排接受它的程度而有所变化,同时地或者相继地)。

这也是被那些步奥斯汀后尘、在词语自身之中寻找它们作为施事话语有时所具有的“话语施事力量”的语言学家们所忘记了的。与表里不一,换句话说说是盗世欺名,篡夺他人的头衔、权力和荣誉的冒名顶替者相反,也与单纯的“替身”,即不具备资格而扮演教师或校长角色的被训练者或替代者相反,合法的代表(例如被授权的发言人)是被确信之人,是被认证为正确的。他在实际中表里如一,他真的就是人们相信他是的那个人,因为他的真实——无论是神父、教师或者部长——不是基于他本人的确信或者自命(这种自以为是总是会受到抵制和冷落:他是干什么的?他以为自己是誰?等等),而是在于群体的确信,以及由制度所保证并且通过资

格和象征——例如军服的条纹、制服以及其他的属性——所确证了的。尊敬的标志,例如那些建立在以头衔作为称呼(总统先生、阁下,等等)的基础之上的,都是众多关于制度的授权行为的重复,这种行为是由被广泛认同的权威所执行的,因而是基于总体的合意(*consensus omnium*)之上的。它们作为忠诚的誓言,作为被授予的个人获得了承认的证明,是有效的,但是首先,它们是与授权给他的制度相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对形式的尊重和尊重的形式——礼貌正是由此界定的——具有如此复杂的政治性的原因)。先于这一仪式存在的每个人的信仰是仪式有效的条件。人们只对皈依者说教。而且,如果人们一旦看到词语的巫术仅仅是释放事先已卷紧的“弹簧”,即性情倾向,那么象征效力的奇迹就会消失。

我将以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来结束此文,恐怕这一问题有些玄奥:无论它们是什么,制度的仪式能否发挥它们的力量(我想最明显的例子是拿破仑称之为“小摆设”的,即装饰品或其他特征),如果它们不能至少给予那些没有目标的存在者们——正是这些存在者构成了人性——以一种意义、一种目标的表象,给予他们一种角色感,或者更简单地说,一些重要性,以便把他们从无意义的魔爪中拯救出来?毫无疑问,制度行为所产生的真正奇迹存在于这一事实中,即它们努力使被神圣化了的个体相信,他们的存在是正当的,并且他们的存在具有某种目标。但是,由于象征性权力根本上的变动、差异以及区分的性质,通过一种诅咒,随着杰出阶级上升为存在,作为其不可避免的对立面,其补充阶级则滑落到虚无或者最低级的存在。

3. 认同与表征：

对地区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所需要的元素

围绕着那些涉及地区概念的争论的困惑，以及更普遍地，围绕着那些关于“民族群体”或“族群”概念（用来替代“种族”概念的科学委婉语，后者在真实的实践中仍然经常出现）的争论的困惑，部分地源自下一事实，即服从于对常识意义上的范畴——标志或标记——的逻辑批判的愿望，以及要用科学标准（以逻辑控制和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标准）来替代日常批判的实践准则这种愿望的事实；这种愿望导致人们忘记了下面这一点，即实践性的分类总是从属于实践功能的，并且总是针对社会影响的生产而定位的。人们还趋向于忘记这一事实，即最容易遭到科学批判的实践表征[例如地区论者的斗士们所做的关于奥克坦语(Occitan)^①之统一性的论述]或许有助于生产他们所明确描述或者指定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些东西也就是客观论者的批判为了展示它们的谬误或者无条理而引用的客观现实。

但是在更深层次上，对关于“地区的”或“族群的”认同的“客观”标准的追踪，不应当使我们忘记，在社会实践中，这些标准（例

① 参照本章尾注5。——译者

如语言、方言和口音)是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s)的客体,即关于能动者把自己的利益和成见赋予其中的看法与爱好、认知与认可的行为的客体,也是关于客体化了的表征的客体,即象征操纵的自利策略在事物(标志、旗帜、徽章等)或行为中客体化了的表征客体,其目标在于决定其他人对这些属性及其拥有者可能形成的(精神)表征。换句话说,被客观主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注重的特征与标准,在实践中,它们一度被作为符号、标志或烙印,以及权力的功能而得到衡量与评价。鉴于事实就是这样,并且在实践的意义上,没有什么社会主体能无视这一事实,因此可以(客观地)推断出,象征性属性,即使是最否定性的,也可以按照其拥有者的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利益而被策略性地使用。¹

仅当人们能够超越科学在表征与现实之间所建立的对立(为了摆脱自发社会学的成见,科学首先必须做到的),仅当人们在现实中包括了对现实的表征,或者更为精确地说,为了表征的斗争——不仅在心理形象的意义上,而且还在其目标在于操纵心理形象的社会展示(甚至在委任的意义上,这种委任的责任就是要组织起改变心理表征所必需的展示)的意义上——的时候,才能理解由关于定义“地区的”或“族群的”认同斗争所构成的分类斗争的特殊形式。

关于族群或地区认同的斗争,换句话说,关于通过出身的地点以及与其相联系的恒久标志,例如口音,而与出身相关的属性(烙印或象征标志)的斗争,是关于分类的不同斗争的一种特殊情形,是一种权力垄断的斗争,它要使人们看到并且相信,使他们知道并且认可,要强加关于社会世界分类的合法定义,并且因此制造和解

散群体。在这里举足轻重的是通过分类准则强加对社会世界看法的权力,当这种分类准则被强加于整个群体时,它确立意义并且确立关于意义的合意,尤其是关于群体的统一和认同的意义和合意,它创造了群体统一的现实和认同的现实。地区(*regio*)一词的词源学,如艾米莉·帮旺尼斯特所描述的,把我们引向了分类的根源:一种通过政令(*decree*)在自然连贯性(在空间地域以及在年龄、性别等等之间)中引入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连贯的、神秘的并且由此是关于临界区分(*diacrisis*)的基本社会行为。*Regere fines*,即“用直线描划出界限”,划定“内部与外部,神圣的王国与世俗的王国,本国的疆域与外国的疆域”的行为,是一种由被赋予了最高权威的人——*rex*,此人的责任为 *regere sacra*,即确定使裁决生效的规则,发表权威的讲话,在通过一种可强行实施的发言而使其实现的意义上,来预测使他所言说的未来成为现实的人——实施的一种宗教行为。² 地区(*regio*)及其前沿(*fines*),仅仅是权威行为的遗迹,这种权威行为存在于标示出国家领土(也被称为 *fines*)的边界之中,存在于强加合法的、众所周知的和得到认可的关于前沿与领土的界定(*finis* 的另一种意义)——简而言之,社会世界合法分类的源泉——之中。这种合法行为,存在于以权威宣称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真相,它是一种认识行为,它与所有的象征性权力一样,基于认可之上,将其所宣称的东西引入存在[正如帮旺尼斯特再次提醒我们的,权力(*auctoritas*),就是赋予作者(*auctor*)的生产能力]。³ 即使当他只是权威地陈述已经成为现实了的事情,即使当他满足于仅仅把所是之物宣布出来,这个作者也使事物的存在状态发生了改变:由于他以权威陈述事物这一事实,即在每一个人面前以每一

个人的名义公开地、正式地陈述,他使它们脱离了任意武断的属性,他维护了它们,使它们神圣化,使它们固定下来,使它们具备了存在的价值,使它们与事物的属性相一致,并且由此而成为“自然而然的”东西。

今天,没有人愿意宣称存在着某种能够确立由“自然的”边界所分割出来的、关于“自然的”地区的“自然的”分类标准。边界只不过是分类的产品,并且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这种分类,按照其所集合的诸要素在其内部是否表现出的或多或少的数量或者是或多或少的强烈的相似性(假定我们总可能对非同等因素——这些因素在分类学中被看作是相似的——之间的变体的界限进行争论),可以说或多或少是基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的。所有人都同意,按照不同的构想标准(语言、居住地、文化形式等)而分割的地区很难完全重合。但这还不是全部:在这一例子中的“现实”是彻头彻尾地社会性的,并且最“自然的”分类,是基于一点都不自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作为任意强加的结果的特征之上的;换句话说,它是先前合法分界斗争领域的权力关系状态的产物。边界,一种关于定界的法律条文的产物,创造了文化差异,正如文化差异创造了它一样:我们只要考虑一下教育系统在语言发展中的角色,就可以发现,政治意志可以取消历史上已经形成了的东西。⁴因此,那些宣称推进了现实中最为确定的标准的科学,应当被提醒,要记住,它只不过是记录了关于分类的斗争状态,换言之,是在两类人之间的物质的和象征力量的斗争关系的状态,一类是那些与这种或那种分类模式有利害关系的人,另外一类是那些如科学所做的,经常援引科学权威,以达到把他们寻求强加的任意的分类建

立在现实和理性基础之上的人。

地区论者的话语是一种施事性的话语，其目的是强加一种关于边界的新的合法定义，并且使人们认识且认可与支配性定义相对立的、如此定界的地区，而支配性定义是被错认为就是如此的，并且已经被如此认可和合法化了，它并不承认这一新的区域。分类化的行为，当它获得认可，或者当其由被认可的权威所实施时，其自身就施行了一定的权力：“族群的”或“地区的”范畴，如家族的种类一样，通过话语中的客体化所施加的启示和建构的权力而构造了现实。把由于他们讲这门语言（一种没有人讲或没有人正确地讲的语言，因为它只是很大数量的不同方言的总和）而被称为“奥克坦人”的人所讲的语言，叫作“奥克坦语”⁵的事实，以及把讲这一语言的地区（在自然空间的意义上）称作“奥克坦语区”，并且由此宣称使其作为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按照历史构成的含义，这些概念当前还在考察中）而存在，并非是无效的虚构。⁶如果这件事的操作者，能够通过他争取这种权力的言语而获得认可，那么努力使命名的事物成为现实的社会巫术，就有可能成功；这种争取权力的言语，通过挪用权力为自己服务，强加了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的新的看法和新的分类，即划定界限，确定使裁决生效的规则，从而使一种新的界限神圣化。在宣称行为中宣布把自己所宣称的事物变为现实的施事性话语的效力，直接与宣称者的权威成正比。惯用语“我许你走”，仅当言说者有权批准时才是理所当然的命令。但是由话语中的客体化这一事实所带来的认知影响，并非仅仅依赖于赋予说出这一话语的人以认可；它还取决于向群体宣布其身份的话语植根于其对象群体的客观性的程度，也就是说，取决

于该群体的成员给予它的认可与信任的程度,以及该群体成员共同分享的经济与文化属性(鉴于仅仅在与给定相关原则相一致的前提下,这些属性之间的关系才能显现出来)的程度。对一个群体的权力——这个群体即将作为一个群体而被引入存在——不可分割地,是一种通过对其强加看法与分类的共同准则,并且由此把一种关于其认同的惟一看法与关于其统一体的共同看法强加于其上而创造群体的权力。⁷

这一事实,即为了身份——被理解为根本上是通过他人的认可而存在的——而进行的斗争涉及了对各种看法和各种看法种类的强加,有助于解释展示或示威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manifestation or demonstration*)在所有地区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中都占据的决定性的地位,例如文艺运动中的宣言策略。⁸ 词语所具有的几近于神奇的力量,来自这一现实,即客观化和事实上的官方化——由在所有人面前进行的公共命名行为所带来的——具有使特殊性(存在于认同之所有意义的源泉之中)从想像不到甚至是无法想像之处脱离出来的效果。(这正是当一种无名的“方言土语”被宣称作为一种能够公开讲述的语言时所发生的事。)而且,官方化是在展示之中得以完成的,这种展示是一种典型的巫术(这并不意味着无效)行为,通过它,实践性的群体——事实上的、被忽视的、被拒绝的或者被压抑的群体——使自己对于其他群体和对于自己来说成为可见的以及明显的,并且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被知晓的、被认可的群体的存在,同时提出了制度化的要求。社会世界也是意志与表征,而成为社会性的存在也就意味着被感知,并且被感知为独特的。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在以下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这

二者一方面是客观主义的任意武断,它以“现实”来衡量表征(取这一词语的所有含义),而忘记了这些表征可以通过唤起(evocation)的特殊效果使他们所表征的事物成为现实;另一方面,主观主义的坚持,这种坚持,即通过赋予表征以特权,在科学的范围内认可了社会学作品的不真实性,而斗士们正是通过这些社会学作品的不真实性,把现实的表征转化成了表征的现实。我们可以通过把它看作一个客体,或者更为准确地,通过在关于客体的科学之中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选择的客观基础——正是这种基础划分了科学——纳入考虑,阻止其理解关于社会世界的特殊逻辑——“现实”正是界定现实的永久斗争的场所——而避免这种选择。为了同时抓住被制度化的东西(不要忘记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上,这仅仅是一个要实现某种事物,或者消除某种已经存在的事物的斗争之结果的问题)和表征,施事性的陈述寻求实现它们所陈述的东西,同时恢复客观结构以及与这些结构之间的主观关系,它是从声称要改变它们的宣言开始的:这将给予个人以更为完全地解释“现实”的手段,以及更为准确地理解并且预见它所包含的潜在性的手段,或者更为准确地理解它客观上为不同的主观需要提供机会的手段。

当科学话语被卷入它试图将其客体化(并且,除非禁止把科学话语公开,否则很难知道如何才能避免这一作法)的分类斗争中时,科学话语再次开始在分类斗争的现实中发挥作用。这样就注定了它或者表现为批评性的,或者表现为同谋性的,这取决于读者自己与所描绘的现实之间是批评性的还是同谋性的关系。由此,仅仅是展示(showing)这一现实,就像用手指指点点地咒骂(kat-

egorein)一样,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就像指引和安慰方式一样发挥作用。这也适用于对社会阶级的分类,就如适用于对“地区”或“族群”的分类一样。因此,对于那些斗争——为了合法分类的源泉而进行的斗争,它们或者发生在科学场域里,或者发生在社会场域里(而且,由于其特殊的逻辑,它赋予知识分子以一种占有优势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做出完全精确的研究就成为必要的了。任何一种被宣称“客观性的”关于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或者一个社会阶级的实际的或者潜在的、真实的或者可预见的立场,以及由此关于在“党派性的”表征中所宣称的对制度的要求,都构成了一种现实主义₁的明证或者乌托邦主义的判断,而这种明证或判断则帮助决定了社会实体成为现实的客观机会。⁹科学话语,通过使一种分类状态和对分类的看法达到一种神圣化的状态而产生的象征性效果是更为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争取认知和认可的象征性斗争中,所谓的“客观”标准,也就是科学家们所熟知的那些标准,被用作了武器:科学家们指出了那些特征,也就是象征性动员行为为了创造真正的统一体或是对统一体的信仰(既包括在群体内部也包括在其他群体中)而以之作为基础的那些特征;而这种对统一体的信仰,最终将趋向于创造真正的统一体,尤其是通过对合法身份的强加和反复灌输的行为(例如那些由学校或军队所做的行为)。简而言之,最为“中性”的科学判断将有助于改造科学的对象。一旦地区或族群问题在社会场域中被客观地提出了,即使仅仅是由少数积极分子——他们有可能利用其弱点,通过使用恰当的挑衅(provocation)和证明(testimony)的象征性策略,以达到引出反驳的目的,无论这种反驳是否是象征性的,都暗示着一定的认可——所提出

的,任何关于地区功能的言语,作为争论,都有助于促进或者阻碍该地区获得认可并且由此获得存在的机会。

没有什么东西比以下这一问题要幼稚的了,即关于是否应该在恰当标准的系统中既包括进所谓的“客观”种类(例如祖先、领土、语言、宗教信仰、经济活动等),又包括进所谓的“主观”属性(例如归属感),即社会能动者用以设想对现实分类的表征(这种表征有助于确立分类的现实)这一划分了科学世界的问题。¹⁰当研究者受其教育水平和特殊利益的驱使,努力把自己当作所有评判的法官和所有标准的仲裁者时,他们使自己无法抓住斗争的特殊逻辑,在这种斗争的逻辑中,社会表征的力量未必与其真实价值(其真实价值,是按照它们的表达程度,即对当时所考虑的物质力量关系状态的表达程度来衡量的)成正比例。事实上,如预期的一样,如果它们努力把自己强加于集体信仰之上,并且通过其动员能力来创造它们自身得以实现的条件,那么这些“科学的”神话就能够创造出自己的证据来。但是,如果它们在话语——这种话语不能给自己提供描绘此游戏(正是在此游戏中产生了这种表征)和支撑着此游戏的信仰,因此只不过是信仰(这种信仰的基础或者社会效果是应当得到描述的)的生产作出贡献的众多因素之一——中,放弃了观察者的距离,而采取能动者和参与者的表征,那么它们就绝不会做得更好。

可见,只要他们的实践不接受社会学批评的审视,社会学家在其与客体的可能关系的世界中,在主观主义或者客观主义的两极倾向中,就由社会因素所决定,例如他们在学科的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位置(换句话说,他们得到了认证的能力水平,这种水平在社会

等级化了的地理空间中,经常与他们的中心的或地方性的位置相合,当所研究的问题为地区主义时,这尤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以及他们在技术等级制度中的位置即不同的“认识论”策略,其对立的极端—是作为理论正统性的护卫者的教条主义,一是参与运动的追随者的自发主义;当他们既不愿意也不能满足科学工作的要求时,或者当他们仅能满足其最肤浅的要求时,他们或许会有一种共同的方法,在不放弃自己对作品(*auctoritas*)的所有权的条件下回避科学工作的要求。但是由于与研究对象的直接经验的关系,他们仍然有可能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在批评与赞扬,在神秘化和故弄玄虚的同谋关系与简约主义者的反神秘化之间摇摆不定,因为他们接受了客观的或然性——换言之,正是在斗争场域的结构中,地区与地区主义存亡攸关——而非将这种或然性客观化;因为他们加入了关于标准的论战,这种标准使人能够陈述出地区主义运动的意义并且预测其未来,而无须追问自己斗争的逻辑。这种斗争的逻辑正铭刻在运动意义(是地区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是积极的还是倒退的,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等等)的决定之中,以及能够决定这一意义的标准之中。

总之,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为了使客观现实中相互联结的东西保持联结,就必须回避在记录客观标准的“去神秘化”与对意志和表征的神秘化以及故弄玄虚的认可之间作出选择:一方面,是客观分类,无论是具体化的还是客观化的,有时是以制度的形式(例如法律界限)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是与这些分类的实践关系,无论是做出的还是表征出的,尤其是那些个人与集体的策略(例如地方主义者的要求),即能动者用以寻求使这些分类为他们

物质的或者象征性的利益服务的策略,或者是保留与改变它们的策略。或者换句话说,是在与物质的和象征性权力的客观关系和实践性的规划(含蓄的、困惑的并且或多或少是矛盾的)——这种实践规划是能动者用以为其他能动者进行分类,并且评估他们在这些客观关系中的地位,同时也是他们用以反对其他人强加给他们的分类和表征的(关于他们自己的)表征与他们的自我表征的象征性策略——之间的选择。¹¹

简而言之,正是通过驱除“皇家科学”之梦——它被赋予了划定界限和确定使裁决生效的规则的正严权力,以及颁布统一和分裂的政令的立法或法律给予的权力——科学才能把这一游戏——其关键在于控制神圣边界的权力,即控制关于世界看法的准神圣性的权力,在其中人们如果试图操演它(而非遵从它),则除了神秘化和去神秘化之外别无选择——作为它的研究对象。

4. 描述与规定：

可能性的条件与政治效力的限制

特定的政治行动是可能的，这是因为作为社会世界的一部分的能动者具有关于这一世界(或多或少充分的)的知识，并且还因为，人可以通过作用于他们所具有的关于这一世界的知识而作用于社会世界。这一行动的目标是创造并且强加社会世界的表征(精神的、语言的、视觉的或者戏剧的)，这样或许就能够通过作用于能动者对世界的表征而作用于这一世界了。或者更准确地，这一行动的目标是创造群体或者使群体解体——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所从事的集体行为是为了按照他们的旨趣来改变社会世界——其方式是通过生产、再生产或者摧毁群体的表征，而正是这种表征使群体能够为他们自己以及为其他人所看到。

作为那些居于经济和社会世界之中的能动者的知识对象，经济和社会世界不是以机械决定的形式，而是以知识影响的形式，对能动者施加了一种力量。显然，至少是在被支配个人的例子中，这种影响并非是倾向于对政治行动有利的。我们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秩序的永久性归功于这一事实，即它强加了分类规划，而这种为了适应客观分类已经作了调整的分类规划，能够生产出对这种秩序的一种认可形式，也就是对其基础的任意武断性的

误识所包含的那种认可形式：在客观区别和分类图式之间，客观结构与意识结构之间的一致性，支撑着一种对既存秩序的初始信奉；严格地说，政治开始于对这种心照不宣的信奉契约的谴责，该契约推崇一种既存的秩序，而正是这种秩序界定了最初的信念；换句话说，政治颠覆以认知颠覆，即以一种世界观的转换作为先决条件。

但是对既存秩序的异端违反，以及对性情倾向与表征——它是由既存秩序在按照其结构所塑造的诸能动者当中所产生的——的异端违反，其本身即预设了关键性话语与客观危机的结合，并且能够打破合成结构与生产了它们的客观结构之间的紧密关联，能够创立一种实践性的新纪元(*époque*)，一种对既存秩序原初信奉的暂时悬搁。

异端颠覆(*heretical subversion*)利用了这种可能性，即通过改变对这一世界的表征——正是这种表征帮助构成了这一世界的现实——而改变社会世界的可能性，或者准确地说，通过使某种似非而是的预见(*paradoxical pre-vision*)，即一种乌托邦，一种计划或者程序，与通常把社会世界理解为自然而然的世界的看法对立起来：施事话语，政治的预见，其自身就是一种以带来其所言说之物为目标预见。它通过言说之、预见之以及使之成为可以预见的，使之成为可以想像的，并且首要的是可以相信的，且由此创造出集体的表征和有助于此表征之生产的意愿这一事实，而对其所宣称的事实作出实践性的贡献。每一种理论，如这一词语本身所暗示的，都是一种看法的纲领，但是对于有关社会世界的理论来说，尤为如此。而且毫无疑问，相对来说极少有这样的例子，在其中词语的建构性力量，它们所具有的看似描述实为命令和看似阐明实为谴责

的能力,是如此一目了然。如果人们知道一个人可以通过改变能动者对社会现实的表征而改变社会现实的程度,那么许多“知识界的辩论”就比它们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实际得多了。人们可以看到关于某些事物,例如酗酒(其他如堕胎、毒品或安乐死)的社会现实随着其是否被认为和看作一种遗传弱点、一种道德沦丧、一种文化传统或者一种补偿什么的方法而被改变的程度。一个词语,例如家长式统治(paternalism),因质疑所有事物而引发混乱,这些事物通过对自我利益的永久否定,把支配性关系转化成了一种魅力化了的的关系。像按照吸引关系的模型组织起来的等级关系(家庭群体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典型场所)一样,所有形式的象征性资本(名望、卡里斯玛、迷人的风度)以及这种资本用来进行资本积累的交流关系——服务、礼物、关注、关心、爱心等的交换——当面对使之暴露并予以除魅的词语的毁灭性影响时,尤其脆弱。(宗教的或者政治的)语言的建构性力量,及其导致的知觉与想法的图式的力量,在危机的情况下最为清楚:这些似非而是的、超常的情况,要求超常种类的话语,这种话语能够把社会精神气质的实践性准则提高到一种能产生(准)系统性反应的明确准则的水平,并且能够表达所有关于由危机引发的情境的从未听说过的、无法言传的特点。

异端话语(heretical discourse)不仅必须通过公开宣称其与普通秩序的决裂来帮助割断对常识世界的遵奉,它还必须生产出一种新的常识,在这种新的常识的内部综合以前整个群体所心照不宣的或者被压抑的实践以及整个群体的经验,并且赋予它们以一种合法性,一种由公众表达和集体性认可所赋予的合法性。事实上,由于每一种能够使自己被整个群体都听到的语言往往是一种获得

了认可的语言,它被赋予了这一群体的权威,因此,它在表达的同时就授权给了它所指定的东西,它从群体之中获得合法性且在群体之上实施它的权威,并且通过为群体提供关于其经验的单一表达而帮助创造了这种权威。异端话语的效力,并非存在于语言所固有的力量的巫术之中,如奥斯汀所说的“话语施事力量”;也不在于其作者个人之中,如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这两种类似于屏障的概念,阻挡了我们去考察这些效果的原因,而它们自己仅仅是指明了这种效果);而是存在于进行授权与被授权的语言,同授权给它和授权其自己使用它的群体的性情倾向之间的辩证之中。就每个被涉及的能动者而言,而且最重要的,就创造异端话语的人而言,这一辩论过程是通过以下过程得以完成的,即通过为了使其本质外部化而必需的阐述的劳动(the labour of enunciation)——这种阐述的劳动是为了使内在的东西外在化,为了给无名者命名,并且给予前言语的(pre-verbal)和前反思的(pre-reflexive)性情倾向以及不可言喻的和不可观测到的经验以一个客体化的开始所必不可少的,并是通过那些从其本性来说就是共通的和可以交流的词语,因此也是有意义的和可以由社会裁决的词语。它还可以在戏剧化的劳动(labour of dramatization)中得以完成,这尤其在典型的预言中可以看到,这种预言单凭其自身即能摧毁信念的不证自明的真理,并且在为了给无法命名者命名而必不可少的逾越中,打破那些已经被制度化或者内部化了的审查制度,因为正是这种审查制度禁止被压抑者尤其是异教创始人本身的回归。

但是,正是在群体的建构中,尤其是在词语、标语口号以及通过施加区分准则而帮助确立社会秩序的理论,以及更广泛的,在把

对世界的看法和政治分类现实化和官方化的整个政治舞台的象征性权力中,表征的效力才最为明显。政治的表征努力(不仅在词语或理论方面,还在示威、典礼或者其他的区分或对立的象征化形式中),给予了某些看待或体验社会世界的方式,即先前被归于沉默或者经常是困惑体验(不安、反叛性,等等)的实践性的性情倾向的状态,以公开话语和典型实践的客观性。这样,它就使得能动者能够在自身之中发现共通的属性,而这些共通的属性是隐藏于孤立的、分裂的、遣散的特殊情况的多样性之外的;而且它还能够使能动者在特征或者经验——如果缺乏恰当的准则(正是按照这种相关的准则,这些特征或经验被建构成同一阶级的成员的指标),这些特征或经验就看似是全然不同的——的基础之上建构他们的社会身份。

从实践群体的状态到获得了授权的群体(阶级、民族,等等)的状态的转化,以分类准则的建构为先决条件,它能够创造构成这一群体的整体成员之特征的独特性特征,并且还能够取消其部分或所有成员在其他方面所具有的、可能作为其他建构体的基础的不相关特征(例如民族、年龄或性别特征)。因此,斗争正是存在于阶级(社会、伦理、性别等)建构的基础之上的:每一个群体都是强加关于群体建构之合法准则的斗争地点,并且每一种属性的分布,无论它涉及性别或年龄,教育或财富,都有可能成为具体政治分歧或者斗争的基础。受支配的群体在诸如此类的具体区别上的建构,是与建立于一般属性或品质(男人、老人、法国人、巴黎人、公民、飞行员,等等)的基础之上,在其他象征性权力关系的状态中界定了社会身份,有时甚至是界定了相关能动者之法律身份的组织的解

体不可分割的。事实上,任何要建构新的区别的尝试,都必须认真考虑那些在如此划分的空间中占有支配性地位的人们的反对,这些人们的利益就在于使这种与社会世界的信念关系永存,而这种关系导致把既存的区别接受为自然而然的,或者导致通过对更高统一体(民族、家族等)的肯定而象征性地否定它们。¹换句话说,占据支配地位的个人偏爱集体的合意,一种涉及了社会世界的含义或意义的基本协议(由此转换为信念的、自然的世界),它建立在关于分类原则的同意的基础之上。

异端批判的推动力量遭遇了正统观念的阻碍力量。受支配的个体与话语和意识联合起来,实际上是与科学联合起来,因为除非他们对社会秩序的分类看法提出质疑,他们就不能把自己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动员起他们自己或他们自己的潜在能力;而这一看法,作为社会秩序的产物,趋向于使他们认可它并且如此地遵守它。

当先前的斗争过程中所积累的颠覆性力量与批判力量相对较弱时,作为其结果,受支配的个体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界定了他们的肯定性的属性,或者可能性更大的,否定性的属性时,受支配的个体不大可能发动一场象征革命——而这是他们重新占用社会身份的条件,但是他们对于支配性分类的接受却(甚至是主观地)剥夺了他们的这一权力。因此,他们也被剥夺了能够意识到他们被剥夺了这一事实所需要的经济和文化条件,并且被局限在由他们的知识工具所许可的知识的限度内,亚无产者和无产阶级化了的农民,为了推翻使他们成

为牺牲品的社会秩序而生产的言语和行为,是按照作为这一秩序之根基的逻辑分类原则组织起来的(参照各种宗教战争)。

与此相对,占据支配地位的个人由于不能够恢复那种信念缄默(*silence of the doxa*),便通过一种纯反动的话语,尽力创造一种能够取代被异端话语的存在而威胁到的所有事物的替代品。找不到任何可以谴责社会世界如此存在的理由,他们努力通过一种充满了常识的简单而透彻的话语,来普遍施加由这一世界所强加给他们的明显性和必要性的感觉;因为对他们来说,让事物保持其所是的样子是符合他们的旨趣的,他们试图以一种非政治性的话语来破坏政治,这种话语是通过一系列中性化措施或者更有效地,是通过否定措施生产出来的;这种否定寻求把信念恢复到其最初的无知状态,而且由于其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秩序自然化,因而总是借用自然语言。

这种没有政治标志的政治语言,以不偏不倚的修辞学作为其特征,以对称、平衡、中庸之道的效果作为其标志,并且以适宜与体面的社会精神气质为支撑,以避免最激烈的辩论形式,以谨慎、以一种坦率承认的对敌手的尊敬,作为其典范。简而言之,以所有表达了否定——对政治斗争是一种斗争的否定——的东西作为其特征。这种中性策略(合乎道德的)是在科学的辩术中自然地完成的。

这种对回到原初信念的怀旧渴望,是在对“体面人们”(经常由农民来具现的)的敬慕中以幼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而这种幼稚的敬慕是所有保守主义都表演的;所谓的“体面人们”,其基本属性被作为正统话语之特征的委婉语(“淳朴的人们”,“劳动人民”)明确地指示了出来,即他们对既定秩序的遵从。事实上,发生在政治场域中的正统与异端之间的斗争掩盖了另外一个对立:一方面是在被作为一个整体的(无论正统的还是异端的)政治主张体系,也就是在政治场域中可以政治性地说出来的那部分;另一方面是所有仍不予(在场域内)讨论的那部分,也就是说在话语的触及之外,被放逐到信念的状态,不需要讨论或审查即被那些在已经宣布的政治选择的层次上互相对立的人们所心照不宣地接受的那部分。

如果,每一个能动者都能在其自身之中,发现关于自己在社会空间中的状况与位置的确实可靠的知识的源泉,那么令社会世界的知识存亡攸关的斗争就将是毫无意义的;而如果同一能动者不能够在不同的话语和分类(按照阶级、伦理、宗教、性别等)中,或者在由同一分类准则所造成的对产品的对立评价中认识自己,那么同样也会令这些斗争毫无意义。但是如果对信念变体(allo-doxia)、对知觉中的错误以及最重要地,对表达中的错误的限制,如果在所提供的不同话语和分类中认识自己的倾向在所有能动者当中都具有同等的可能性,那么无论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还有他们的性情倾向)是怎样的,无论这一空间的结构是怎样的,而且无论作为其实际组织之根据的分布形式和分类性质是怎样的,这种斗争的影响都将完全是不可预测的。

预见或者理论影响(被理解为只要当试图使某事物明晰时就

会发生的区分原则的强加影响)在不确定性的边缘发挥作用,而这种不确定性,是由社会精神气质的缄默及其不证自明的真实,与标语和口号的公开表达之间的不连贯性所造成的:得益于由实践秩序与话语秩序之间的距离而使之成为可能的信念变体,同样的性情倾向有可能被认作非常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立场。这意味着,科学注定了要发挥一种理论影响,但是这种理论影响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通过在连贯一致的、并且从经验上来说是正确的的话语中表达那些先前被忽略了的东西,也即那些(在我们所讨论的情况中)含蓄的或者被压抑的东西,科学在改变社会世界的表征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世界本身,至少从它使与改变了的表征相一致的实践成为可能的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因此,如果人们真的可以追溯(实际上可以随意追溯至历史中任一时候)关于阶级斗争的最初表现,甚至第一个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或多或少精心地表达(通过提到“先驱们”),事实上仍然是只有在马克思之后,并且实际上只是在能够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组织有能力强加对社会世界的看法的(大规模的)政党被创造出来以后,严格意义上说,人们才能够提到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些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前资本主义的(或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中寻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人们犯了一个理论性的错误,即非常典型地,他们把科学实在论和经济论结合了起来,而这则总是趋向于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世界的现实中寻找阶级的传统被简化到了经济场域:²一个悖论是,在历史上发挥了无与伦比的理论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关于历史和阶级的理论中,没有对理论影响有任何奉献。

现实和意志:阶级(或阶级斗争)在其是意志的程度上是现实,

并且在其是现实的程度上又是意志。在长期受阶级斗争理论影响的社会里,在某一特定时刻可以及时被观察到和加以衡量的政治实践与政治表征(尤其是划分为阶级的表征),部分是理论影响的产物——可以这样理解,这一影响的象征效力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事实,即阶级斗争的理论客观地植根于客观属性和合成的属性之中,并且作为结果,得到了政治倾向的同谋。类别,即群体按照它设想自己并且按照它表征自己及其特定现实的类别,帮助实现了这一群体的现实。这暗示着整个工人运动的历史以及理论的历史——它正是由此建构了社会现实——总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及时地呈现于所考虑的这一运动的现实当中。正是在形塑了社会世界历史的斗争中,对社会世界看法的分类以及按照这些分类所产生的群体同时被建构了出来。³

即使最严格记述性的科学描述,也总是具有以一种规定性的方式发挥功能的可能性,能够通过施加理论影响而确认自身,而这种影响有助于产生其所宣称的东西。像短句“会议开始了”,命题“有两个阶级”,可以被理解为记述性话语或施事性话语。这也就是创造了所有政治论题的内在不确定性的东西,如对阶级、地区或民族的存在肯定或否定,对现实的不同表征之现实或对其创造现实的能力,采取一个明确的立场。通过为这些相关位置的现实主义程度提供一个客观的衡量尺度,科学有可能被诱惑而穿越这些争论;如果科学要合乎逻辑地推进,它就必须描述这些斗争发生的空间——在这些空间里利害攸关的,除其他事物外,还有斗争参与力量的表征以及它们成功的机会——并且它在如此做的同时还必须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任何对现实斗争中存亡攸关的现实的

这些方面的“客观”评价，都有可能产生完全真实的影响。人们如何会看不出，预见不仅在其作者的意图中发挥了作用，而且还在其社会实现的现实之中发挥了作用，例如作为自我应验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一种施事性的表征，能够施加使既存秩序神圣化的特殊政治的影响——或者是作为一种驱妖符(*exorcism*)，能够引出有可能反驳它的行为？如甘那·米尔达^①所清楚地证明的，经济学词汇中的关键词语，不仅有诸如“规则”、“均衡”、“生产力”、“调整”、“功能”等等，而且还有更核心和更不可避免的概念，例如“效用”、“价值”、“真实的”或“主观的”成本，等等，更不必说像“经济的”、“自然的”、“公平的”(对此还可再加上“理性的”)之类的概念，它们总是同时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定性的。⁴

最中性的科学可以施加除了中立之外的任何影响。因此，仅通过确立或者发表某一事件的可能性功能所假定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波普尔^②所提出的，事件发生的倾向(*propensity*)力量；在事物的本质之中所固有的客观属性——就有助于强化这一事件“存在的要求”，如莱布尼兹^③所经常说的，通过使能动者决心为它做准备和顺应它，或者相反地，通过煽动他们起来，运用他们关于其可能性的知识去阻止它，即使不能使它不发生，也要使其发生更为困难。同样地，仅仅以以下问题来取代两种对社会区别——如一

① 甘那·米尔达(Gunnar Myrdal, 1898—1987), 瑞典官员, 经济史学家。——译者

② 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 批判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原籍奥地利, 后移居新西兰、英国, 1945年入英国国籍。在“科学的哲学”和“社会哲学”两方面都有重大影响。——译者

③ 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 德国数学家、哲学家。数理逻辑的先驱。——译者

套等级阶层或一套对抗性阶层——的不同看法之间的学术对立，是不充分的；这一问题对于任何革命策略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即在所考察的时刻，被支配阶级是否建构了能够界定其自身目标的对抗力量？简而言之，他们是否构成了一个已经动员起来的阶级，或者相反，它们仍旧是一个位于等级制度空间中的最低点、以其与支配性价值的距离来界定的阶层；或者换句话说，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革命性的斗争——其目的是推翻既存的秩序——还是竞争性的斗争，即一种竞赛，在其中被支配者努力去适应支配者的属性。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更容易被现实所驳斥，并且因此而更不够科学的了；这一问题只考虑到当下讨论的能动者的实践和性情倾向，却没有考虑到能动者或者组织的存在与非存在——这种能动者或组织能够在对一种可能性或其他可能性的客观前景的或多或少的现实主义的预见或预言的基础之上，肯定或者否定一种看法或另一种看法，而这种预言和前景自身，也易于受到那些关于现实的科学知识的影响。

所有迹象都表明，理论效应有可能在现实本身之中，由能动者和组织予以强加，这些能动者和组织能够强加关于区分的准则，或者如果你喜欢，能够象征性地生产或者强化有利于现实中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系统倾向；而当客体化的过程和使事物明朗化的过程根植于现实之中，并且因此，思想上的差异与实际差异更相适应时，理论效应也将更加强有力，并且最重要地，更为耐久。换句话说，当分类属性——通过它群体具有了更为明确的特征，并且在其中群体认可了自己——更完全地包括了那些构成了群体的能动者被客观赋予的属性（正是这些属性界定了他们在占用生产

手段的分布中所处的位置,而这种生产手段是用来占用累积的社会产品的)时,由象征性的建制所动员起来的潜在力量将更为重要。

关于社会机制——例如与教育系统的功能相联系的文化继承机制,或者与经济和文化物资市场的统一性相联系的象征性支配机制——的科学,具有确保既存秩序的再生产的趋势,能够为一种机会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提供便利,而这种机会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目标,正是要使这些机制的运作方式合理化(在两种意义上)。但是这门科学也许同样轻易地能够作为两种趋向于不同结局的政治的基础,它可以脱离无知或者失望的唯意志论,也同样可以脱离自由放任主义的道路,它将利用这些机制的知识来武装自己,以试图运用它们,并将它们中性化;并且它在可能性知识中所发现的既不是必然要放弃的煽动,也不是不负责任的乌托邦思想,而是拒绝某种可能的的基础,它是基于对那种控制着被拒绝的可能性的生产规律的科学的掌握之上的。

第Ⅲ部分 对话语的分析

不存在被认为在自身中且为了自身的话语科学；只有当人们将作品一方面与作品生产的社会条件——也就是它们的作者在生产场域中占据的位置——另一方面与作品为之生产的市场（市场只能是生产场域本身），而且如有必要，与作品被接受的连续市场联系在一起时，作品的形式特征才显出意义。作为社会学语用学的话语科学今日尚处空白，尽管它有众多先驱者，如写《外省人书简》的帕斯卡尔，写《反基督》的尼采或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实际上它致力于在最典型的形式话语特征中发现话语生产和流通的社会条件的作用。在某种既定的修辞学中是制度在说话，而且形式的手法表现了客观上存在于一种社会位置中的局限性和必要性。分析者同时抓住了风格的社会特征和作者的社会特征：在这种修辞学作用背后，马克思发现了学校，学校通过生产这种作用的生产者的位置和配置生产了这种作用；在这种或那种修辞学作用中，马克思和尼采明确了圣职式策略的不变因素。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在马克思反施蒂纳（Stimer）的论战中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适用于对马克思的法国式阅读的分析并不奇怪。或者，宏大话语的最典型手法可在像阿尔都塞和海德格尔那样在理论空间中相距甚远的哲学家身上碰到，因为他们都有构成哲学家身份的高度理论意识。孟德斯鸠力求借助修辞策略赋予一种准私人性的神话以科学的外表，对这些修辞策略的分析清点了今天和昨天所有伪科学自发找到的手法。

但是,为了彻底地说明这种方法同时使之变得精练,应该增加个案研究,¹由此逐渐得出一种真正社会学语用学的原则。

1. 审查与塑形

Louche [斜眼的, 曲解]。这一词语在语法的上下文中, 用来指初看是一种含义, 但实际却指示完全不同的含义的表达。它尤其用于那些其构造有歧义以至于干扰了其表达的清楚性的短语。使用这一短语产生歧义的原因就在于构成它的词语的特定配置, 最初看时它们具有一种特定的联系, 但实际上它们还有另外一种联系: 就像斜眼的人看似在望向一个方向, 实际却是在看别的地方。

M. 博泽 (M. Beauzée), 《方法论百科全书, 语法与文学》

(*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 grammaire et littérature*,

vol. 2), 第 2 卷

各种学派的专家们通过对普通语言的系统改造, 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专业语言, 同所有的话语一样, 是表达旨趣 (*expressive interest*) 与审查制度 (*censorship*)——由该话语生产和流通的场域的结构所建构的——相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的形成”, 从弗洛伊德学派的意义上来说, 其“成功”的程度取决于生产者的特殊才能, 是委婉化策略的产物, 这种委婉化的策略是同时存在于强加的形式和遵奉的俗套之中的。这些策略趋向于保证表达旨趣、生理驱动或者

政治旨趣(在这一术语的广义上)在物质或者象征利润——它是不同形式的话语按照不同生产者在场域内的位置,也就是说,按照在这一场域中存亡攸关的特殊资本的分布结构,能够为这些生产者所取得——的机会结构限度之内的满足。¹

审查制度的比喻不应引起误导:是该场域自身的结构,通过控制表达途径的获得和表达的形式,来控制表达;而不是什么专门改造过、以用来指定和压制对某种语言代码的违反的法定程序在控制着表达。这种结构性的审查制度,是通过该场域的裁决媒介发挥其作为市场及形成不同种类的表达的价格的功能的;它施加于所有象征性产品的生产者之上,包括获得了授权的发言人,其权威的话语比其他任何话语都更要受正式的恰当规则的控制,而且它还把处于受支配位置者置于或者沉默或者令人瞩目的恣意妄言之境地。这一审查制度以由制度化的权威所强加和裁决的明确禁令的形式表现自己的需求,随着其机制——保证把代理人分配在不同位置上的机制(正是这种机制成功地确保了他们的匿名)——能够确保其不同位置被合适的代理人(即能够并且愿意发表与该位置的客观定义相匹配的话语,或保持沉默的代理人)所占有的能力的增加而递减。[这解释了联合选择程序(co-optation procedures)总是给予遵奉正式礼仪的性情倾向中明显不重要的指标以重要性的原因。]当每一位代理人除了他被客观授权所讲的东西之外就无话可说时,审查制度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或不着痕迹:在此时他甚至都无需做自己的审查官,因为以某种方式,他已经通过早已被他内在化了的感受和表达的形式,一劳永逸地被审查过了;并且这种感受和表达的形式在它所有的表达形式之

上都强加了它们的形式。

最有效的和最隐蔽的审查制度,是所有那些通过把特定的能动者排除出讲话的群体或者排除出允许发布权威讲话的场所,从而把他们排除在交流之外的审查制度。为了解释在群体中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以说的,人们必须不仅考虑到以下这种系统性权力关系,它建立于群体内部,剥夺了特定个人(例如妇女)讲话的可能性,或者迫使他们通过强力去克服这一权限,还要考虑的是,作为首要的审查制度而发挥作用的群体自身的组成法则(例如有意或无意的排除逻辑)。

因此,象征性产品最特有的属性应当归因于其生产的社会条件,并且更准确地,归因于生产者在该生产场域中的位置。它通过各种形式的调节,不仅控制着表达旨趣和施加于其上的审查制度的形式与力量,而且还控制着允许这种旨趣在这些约束的限制内被满足的能力。在表达旨趣与审查制度之间所确立的辩证关系,阻止我们从已经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当中区分形式与内容,也就是说,区分说的内容与说的方式甚或是听的方式。通过塑形,由场域的结构所实行的审查制度决定了形式——所有形式主义的分析都试图把它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并且必要地,还决定了内容;而内容,因为它是与恰当的表达不可分割的,因而若是脱离了已知形式和公认的规范,简直就是无法想像的。审查制度还决定了接收的形式:生产具有充分正式性的哲学话语——也就是说,具有一系列协议标志(特定的句法、词汇、引用等的使用)的话语,

通过这种协议,哲学话语得到了认可,并且能够确保其作为哲学的东西被认可²——即生产一种要求以应有的正式性被接受的产品,也就是说,以对其所采取的形式的应有的尊重,如我们在文学中所见,对其作为形式的性质的尊重。合法的著作由此就施加了一种暴力,这种暴力保护它们免受另外一种暴力,而后者,如果我们要洞察仅以否认它的形式才能表达出来的表达旨趣时,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历史验证了塑形策略的效力,被神圣化了的作品正是以此施加关于它们自己感觉的术语的;并且如结构分析或者是符号学分析之类的“方法”——它们试图脱离功能而研究结构——也毫无例外地适用于这一规则。

依此类推,一部作品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都同样被束缚于一个特殊的场域之中:想像海德格尔用另一种形式——例如用 1890 年在德国采用的哲学话语的形式,或者用现今耶鲁或哈佛的政治科学文章所采用的形式,或任何其他的形式——将如何说话,就是在想像一个不可能₁的海德格尔(例如一个哲学的“流浪者”,或者 1933 年的反向移民),或是在想像在海德格尔活跃时期德国的一个同样不可能存在的生产场域。象征性生产在其生产的社会条件中最直接分享的形式,也正是其最特殊的社会影响得以发挥的手段:特殊的象征性暴力只能由实施它的人来实施,也只能由承受它的人来承受,并且只能采取一种导致它被如此误识的形式,换句话说,导致把它确认为合法的形式。

虚假脱离的修辞

“特殊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区别，就在于它在自治的面孔后隐藏着他治：离开普通语言的帮助它就无法运作，它必须运用随场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的程序，并且当处在同一场域内时，按照位置与时刻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的程序，通过创造一种虚假脱离（false break）的策略，来造成一种独立的错觉。例如，这种语言能够模仿所有科学语言的基本属性：通过一种元素在系统中的成员资格来确定它。³ 纯科学从普通语言中借用来的词语，其所有意义都来自已经建构好了的系统；当语言作为集体努力的仓库而发挥作用时，选择使用普通词语（这经常是不可避免的）而非新词或单纯任意的符号，是一种只能如此的选择——与一套正确的方法论相一致——即通过那种利用语言在某些时候所具有的、描绘迄今为止尚无疑义的关联的能力的愿望，而进行的选择。⁴ 数学家所使用的“群”这个词，是一个完美而自足的符号，因为它完全是按照作用与关联——正是这种关联界定了其特殊的结构，并且还是其属性的来源——来界定的。相反，词典里所罗列的这一词的大部分专门用法（例如在绘画中，“几种特征在某一艺术作品中汇集到一起，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或者在经济学中，“由多种联系结合起来的一系列企业”），相对于其最初的含义，只有低水平的自治，并且对不具备该含义之使用知识的任何人来说，仍然都是不能理解的。

海德格尔从普通语言中借用来的词语不可胜数，但是它们都被塑形的过程变形了；这种塑形过程产生了哲学语言的明显自治，

而自治是这样产生的：即通过对词法联系的系统性强调，把普通词汇插入到以具体语言形式表达的关系网络之中，并且由此暗示，话语的每一元素都同时既作为能指又作为所指而依赖着其他元素。由此像 *Fürsorge*（操持，牵挂）这样一个普通的词语，通过其形式变得与以下同一族内的整个系列的词语都明显相关了：*Sorge*（关心），*Sorgfalt*（细心），*Sorglosigkeit*（疏忽，粗心），*sorgenvoll*（关涉的），*besorgt*（全神贯注的），*Lebenssorge*（对生命的关怀），*Selbstsorge*（自私自利）。关于同根词的把戏——这种把戏在格言和谚语中非常普遍，而这在所有大众的智慧中都是可以找到的——只不过是一种正式的手段，但无疑是最可靠的手段，它常常被用来给予两个所指的词语之间以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印象。由头韵或者准押韵建立起来的关联——它们在形式和声音方面建立了准物质性的相似关系——也能够生产出正式的、必要的关联，这种关联有可能把所指之间隐藏着的关系牵引出来，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仅仅通过形式的把戏就能使这种关系成为存在：例如，后期海德格尔的哲学双关语，*Denken = Danken* [想 = 谢 (thinking = thanking)]，或者与 *Sorge als besorgende Fürsorge*，“作为充满牵挂的关怀”这一概念有关的词语游戏的结果，如果不是由于其词法形态的暗指模式以及词源的交叉互指创造了一种完全的、形式连贯的错觉，由此而来的关于意义的错觉，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关于话语的必要性的错觉——“然而，决心恰只是操心本身的本真状态，是操心中为之操心的本真状态，而它只有作为操心才可能成为操心本身的本真状态 (*Die Entschlossenheit aber ist nur die in die Sorge gesorgte und als Sorge mögliche Eigen-*

lichkeit dieser selbst) ”^① ——那么一定会招致冗词的非难。⁵

普通语言的所有潜在的源泉,都用来创造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所有能指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并且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通过哲学概念系统的中介而确立的,“技术的”词语是普通词语贵族化了的形式(*Entdeckung*,发现或揭发;*Entdecktheit*,解蔽或去蔽),传统概念[“此在(*Dasein*)”,被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Jaspers*)和其他一些人所共同使用的一个词语]被以一种暗含着某种细微的差别的方式使用着,并注定要标示着一种寓言般的偏离(*allegorical deviation*)(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等等),经过重新铸造的旧词新义有意地却又无预谋地建构了区分,或者至少产生了一种激进克服的印象[*existentiel*(存在者的)和 *existential*(存在的)(存在主义的); *zeitlich*(时间性的)和 *temporal*(时间状态上的)——这些除了在《存在与时间》之外更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对立词]。

塑形产生了系统性的错觉,并且由这种错觉以及它所引出的专业化语言与普通语言之间的脱离,又产生了系统自主的错觉。通过被插入到词法相似又词源相关的词语的网络之中,并且由此编织进海德格尔学派的词汇当中,*Fürsorge*(操持)一词被剥夺了其最初的含义,这在 *Sozialfürsorge*(社会福利)这一表达中明确地体现了出来。一旦被如此转化和变形,这一词为了假定一个改变了的含义(考虑到其词源学含义,“获得”一词或多或少会影响其表达)

^① 此段话采用了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的译法,三联书店,1999年,第343页。

而失去了它的社会身份和普通含义。这样,(社会)救助的社会幻象,被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或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以一种不大婉转的语言谴责为“福利状态”或“保险状态”的象征,能够在合法的话语当中表达自己[*Sorge*(操心)和 *Fürsorge*(操持)是瞬时性理论的核心],但是需要以一种看来它并非在此,或者并非有效在此的形式。

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即一个词语被合成到哲学系统之中,导致该词语否定了它的原义,也就是说否定了这一禁忌词相对于普通语言系统所拥有的含义,并且尽管这一含义被公开系统正式禁止了,却仍旧在私下里存在。这种否定就是二重性——由在话语的每个元素中都注册了的双重信息所授权的二重性,并且总是由同时属于两个系统,即哲学个人习语的公开系统和普通语言的潜在系统,而得到界定的二重性——的来源。

如果一个人想使表达旨趣脱离不可言说和无以名状的状态,使之承受为了加入既定场域的秩序所必需的改变,那么他必须做的,就不仅仅是用一个词语来代替另一个词语,用可以接受的词语代替被审查的词语了。这种委婉的基本形式隐藏着另外一种更为精妙地使用语言的基本属性的方式,即根据由索绪尔所确立的对立,在重要性方面,关系高于成分,形式高于内容,通过把它们统一于关系的网络之中来隐藏被压抑的“成分”,这样就可以在不改变其“内容”的同时改变它们的价值。⁶只有在由专业人员明确的系统化意图所生产出来的专业化语言的情形中,通过塑形而实现的隐藏效应才能充分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如在通过形式隐藏的例子以及在所有适当形式(all due form)的例子中一样,类似于格

式塔理论(*Gestalttheorie*)^①所分析的被禁止了的含义,虽然在理论中可以将其辨别出来,但是在实践中仍旧是不可分辨的;它虽然作为内容是存在的,但是作为形式却是缺席的,就像隐藏在树丛中的脸。这类表达所起的作用,是要掩盖关于社会世界的最初经验和作为其源泉的关于社会的幻象,其程度与揭示出它们的程度相同;允许它们被说出,却又以一种暗示它们不能被说出的表达方式。这些专业化了的语言只有在表达形式——正是这些表达形式使之被误识——之中才能够明确地表达这类经验,因为专业人员不能认识到他在表述它这一事实。服从于特殊场域之沉默的或者明确的规范,原初的内容可以说是化解在形式之中了;通过塑形和对礼仪的遵奉,它变成了它的形式。而这种塑形既是形式的改变又是实质的改变:所指的内容正是在表达的形式中实现的。

塑形把否定(*negation*)简化成它所否定的东西,简化成作为其来源的社会幻象,这既是合理的又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一现实,即压抑的“扬弃”(*Aufhebung*),如弗洛伊德运用黑格尔的术语所给予它的名称,同时既否决了又维持了压抑者与被压抑者,它可以获得双倍的利润:即说的利润和通过说的方式来否定所说内容的利润。显然“本真性”(*Eigentlichkeit*)与“非本真性”(*Uneigentlichkeit*)之间的对立——被海德格尔称为“此在的原初方式”,并且他的整个工作就是围绕其展开的(即使从最严格的内部阅读的视角来看)——只是一个特例,是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一般对立的一种特别

① 指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又称为完形心理学,主要代表人有考夫卡(Karl Koffka)、柯勒(Wolfgang Köhler)和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等。——译者

微妙的形式。“常人”(das Man, 字面上的意思是“某人”)是暴君式的(“常人”的专政),像调查官(这个“常人”搀和每件事),并且将所有事物都降格到其最低水平;“常人”逃避责任,退出自己的自由,并且滑入了一种“凡事无所谓”的趋势;简而言之,“常人”表现得就像是靠社会供养的不负责任的福利接收者。

我们可以列出在下面这一段常被引用的话语⁷中反复出现的学术贵族作风的共同点,作为学校(scholè)的对立面,广场(agora)上则充满了陈词滥调(topoi),闲暇对立学校;统计学的恐怖(即“平均”的概念),象征了所有威胁到了“个人”(这里被称作“此在”)及其最为珍贵的优点(其“创造性”和“私人性”)的“拉平”操作;对所有“拉平”力量(被另一些人称为“大众化”)的轻蔑,其中首先并且最重要的,就是对平等的意识形态的轻蔑,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威胁到了通过努力所获得的东西(“艰苦劳动的成果”)——意指文化(文化是达官贵人的特殊资本,他们是其著作的孩子)——并且它鼓励了“大众”不严肃态度的意识形态;对诸如公众意见(它是哲学家的世袭的敌人)等社会机制的拒绝,又一次通过 öffentlich 和 öffentlichkeit,即公众(public)和公众性(publicness)的把戏传达了出来;另外还有对所有被“社会救助”所象征着的事物的拒绝,例如民主、政党、带薪假(危及到了学校的垄断和在自然中的冥思隐居)、“大众文化”、电视以及柏拉图的简装本。⁸海德格尔用他无与伦比的田园诗的风格,在写于1935年的《形而上学导论》中,把所有这些东西表现得更为出色;在此他试图展示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和技术精神是如何在“诸神的逃遁,大地的毁灭,人类的群众化,那种对

一切具有创造性的和自由的东西怀有恨意的怀疑”^①(*die Flucht der Götter, die Zerstörung der Erde, die Vermassung der Menschen, der Vorrang des Mittelmässigen*)中得以完成并且完美化的。⁹

但同样明显的是,在哲学之杰出头脑当中的杰出与庸俗之间的对立是不能采取庸俗的形式的。学术贵族作风区分出了贵族作风的杰出的与平庸的形式。正是这一意义上的哲学区分¹⁰,挫败了海德格尔的批评者们要从他的著作和政治手稿中找到明显的纳粹主义理论的企图;并且也正是这一点,经常会被海德格尔的支持者们拿来用以证明他与那些对大众最为明显的轻蔑形式划清界限的意志。¹¹这种所谓“原初的”(“初始的”和“首要的”的两种含义)对立,在他的著作中只能以这样一种形式发挥作用,即以其最初并且永久地被引进时所采取的形式发挥作用,并且这种形式还不断地随着他的其他静态系统的演化而不断改变自己,取得一种新的但总是高度升华了的形式。

塑形本身就是一种警告:由于其升华的本性,它指示着与所有决定的不折不扣的距离,甚至是与那些将一种不可分解的思想系统整体简化为逻辑类别一致性的“主义们”之间的距离;它还指示了与所有决定主义并且尤其是将一个思想者无比珍贵的个性简化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平庸性的社会决定主义之间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这种以本体(*the ontological*)和实体(*the ontic*)(或人类学意义上之物)之间对立的形式在哲学话语的核心中被明确设定了的

^① 此段引用文字采自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中译本,熊伟、王庆节翻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8页。——译者

差异,为已经委婉化的话语提供了第二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从此以后,每一个词语都带上了一种永不磨灭的脱离的痕迹,这种脱离把真实的本体论意义与普通庸俗的意义分离开来,并且有时被一种音韵学的把戏(*existentiell/existenzial*)印刻在表达形式的实体当中,而这种把戏常常被人们加以模仿。由此,一个关于双关词语的双面游戏就自然而然地扩展到了以下的警告之中,这种警告是针对“庸俗”与“庸俗人类学”的解读的,它试图揭示出那些被否定但是并未被驳斥、而且被哲学升华(*philosophical sublimation*)注定了要以一种幽灵式的形式,即以缺席为出场的形式,而存在的意义:“术语‘操心’(concern)首先具有其流行口语(*vorwissenschaftliche*)的意义,并且可以意味着执行某事物,完成它(*erledigen*),‘解决它’。它还可以意味着‘提供某物给某人’。当我们说‘我关注这一措施的成功’时,我们还可以从该短语的另一个特征性的角度使用这一表达,在这里‘关注’意味着类似于理解、懂得之类的含义。与这些口语的实体性意义相对,对于一个存在主义者而言,‘操心’这一表达在这一研究中将作为一个本体论术语来使用,并且它将指明以某种可能的存在形式在世界的存在。选择这一术语并不是因为此在碰巧最接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的’和经济的,而是因为此在本身的存在要作为操劳(*care*)而得以显现。这一表达也被当作本体论的结构主义概念。它与‘苦难’、‘忧郁’,或者‘生命的爱护’毫无关系,虽然从实体来看,在每一个此在中都可遇到这些东西。”¹²

在神圣的知识与世俗的知识之间强加一道鸿沟——这隐藏于所有学派的专家们通过指定其他人为世俗的,以寻求确保对知识的垄断或者对神圣实践的垄断的声明之下——由此就取得了其最

初的形式：它无所不在，将每个词语自身分割开，如其看似的那样，它通过令词语指示其不指示其看似指示的东西，通过在其内部刻画——通过把它放在引号中或者有效歪曲其真实的含义，或者只是从词源学或者音韵学的角度将其置于一串具有倾向性的词语中间——把“本真的”和“庸俗的”或者“无知的”含义分隔开来的距离而对每个词语进行分割。¹³通过使那些原初含义（这些含义仍继续为构成公开系统的许多关系隐蔽地发挥着支柱的作用）成为不可信的，个人为其两面做法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的可能性。事实上，尽管有扑面而来的谴责，这些被否定了的含义仍然完成了一个哲学功能，因为它们至少可以作为一个否定性的关系项，只有与之相对，哲学距离才能确立起来，即“本体论的区别”把“本体的”从“实体的”当中分隔出来，把已被启蒙者从世俗者当中分隔出来，后者由于无知和固执应当独自为应受谴责的庸俗含义的唤起而负责任。通过用其他方式使用普通词汇，通过复兴微妙的真理，即已经为日常用法所失落了的词语的原义（*etimon*），个人把词语之间的正确关系转化为语文学/哲学的炼金术得以维持或失败的准则。“如果一个心和灵魂都未启蒙的炼金士在实验中失败了，这不仅是因为他使用了不纯的元素，而且首要地，还因为他所想到的是这些不纯元素的普通属性（*properties*）而非理想元素的功效（*virtues*）。因此，一旦完全绝对的复制完成了，理想（*ideality*）也就被充分体验到了。”¹⁴语言也是如此，它具有其微妙的元素，被语文学/哲学的精妙释放出来，例如希腊语“*on*”（存在）的语法二重性，既是名词形式又是动词形式，这引发了海德格尔的议论：“这里所陈述的，最初可能被当作琐碎的语法，但实际上这正是存在状态之谜。”¹⁵

这样,确信了哲学否定的效力,我们甚至可以回想起被审查的含义并且在由被压制物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所引起的隐藏系统与公开系统之间关系的完全颠倒中发现一种副作用:实际上,很难不把此看作“本质思想”将如幼稚可笑的、非确定的“社会安全”——极不值得思考因而使用加了引号的名称¹⁶——之类的现实建立在存在的基础之上的强大能力的证据。因此,在这个“上下颠倒的世界”里——在这里事件永远只不过是“本质”的说明——基础被其作为基础的东西作为基础。¹⁷“例如,实际社会‘福利事业’(Fürsorge)这种‘操持’,就植根于作为共在的此在之存在建构状态中。之所以实际上迫切需要福利事业这类操持,其原因就在于此在首先并且大部分是在社会福利的不足方式中维持其生存的。^①”¹⁸这种既喧哗却又不易察觉的提示——不易察觉是因为它喧哗——通过其声音,帮助隐藏了下一事实,即在声称致力于探讨此在的本体属性的整个著作中,不断提及社会福利,而此在对救助的“经验性的(即普通的、粗俗的和平庸的)需求”仅仅是偶然的表现。拉康用轶事所说明的被偷换的信件的范例^②——“为什么你告诉我你要去克拉科夫(Cracow)^③,所以我相信你要去利沃夫(Lvov)^④,而实际上你真的是要去克拉科夫呢?”¹⁹——被海德格尔

① 此段译文参照了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中译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1页。——译者

② “被偷换的信件”的范例是指拉康所分析的爱伦·坡的小说《被偷换的信》。拉康通过对这篇小说的解析,分析出这样一个现象:真理通过公开的方式隐藏自身。——译者

③ 波兰南部的一个城市。——译者

④ 前苏联的一个城市,位于今乌克兰境内。——译者

用来鼓励以下这种信念,即通过声明他真的在做的事情,他并没有真的在做他总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事实上毫无疑问:社会福利, *Sozialfürsorge*, 实际上“关心”和“替代”了那些接受帮助的人,解除了他们关心自己的重任,并且准许他们形成“满不在乎”和“凡事无所谓”的倾向,正如哲学的操持 (*fürsorge*) 一样,作为前者(指社会福利)的升华了的变体,它解除了此在关心的责任,或者如萨特在 1943 年所说的(或也许说过的),将 *Pour-soi* (自觉的存在)从其自由中解放了出来,由此注定了它的“不好的信念”和对“非本真”存在的“焦虑”。“常人就这样卸除每一个此在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责任。不仅如此,只要在此在中‘凡事无所谓’的思想倾向,常人就用这种卸除存在之责的办法去迎合此在。又因为常人经常用卸除存在之责的办法迎合每一此在,这样就保有并且增进了他的顽固统治权。”^①²⁰

关于语言的可感知的形式的游戏,当其所涉及的是成对的词语而非单独的词语时,将更为成功;也就是说,当它所注重的是彼此对立的词语之间的关系时,将更为成功。与基于押韵与头韵的直白的哲学双关语相对照,“原初的”双关语,那些调整和组织了海德格尔深层思想的双关语,利用动词形式的技巧,发挥了它们既作为可感知的形式,又作为分类形式的功能。这些总的形式——它们使得声音和意义彼此独立的必要性,在双重需要的表达奇迹中和解到一起——是已经被政治地塑造了的语言纤维的变形的形

① 此段译文参照了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中译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9页。——译者

式,也就是说,它们是已经被对立的客观政治准则所塑造、并且被记录和保存在普通语言之中的形式。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能更好地解释学术语言对二元思维(binary thinking)的特殊偏爱了:在这种情况下,被审查和压抑的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孤立起来的禁忌语了,而是始终暗示着社会群体之间对立关系的词语的对立关系。²¹

普通语言不仅是诗歌与哲学游戏所能利用的可感知形式的无尽宝库;或者,对于晚期海德格尔和他的追随者们来说,是用来表示在尼采所谓的概念文学(*Begriffsdichtung*)之中的自由关联;它还是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觉形式与普通的表达形式的储存器,在其中存储有控制着整个群体对社会世界之共同看法的准则(德国的/罗马的或者拉丁的、普通的/杰出的、简单的/复杂的、乡村的/城市的,等等)。阶级关系的结构只能通过分类形式被命名和掌握,而这些分类形式,即使在由普通语言所传达的那些例子中,也从未独立于这一结构(这是某些被民族志方法论学者和对这些形式的所有形式主义的分析所忘记了的东西)。事实上,虽然最具有社会“标志”(平庸的/杰出的)的对立,也许会按照其用法和使用者的不同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但是普通语言,作为被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所支配的累积的思想劳动的产品,更不必说作为被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旨趣和价值所支配场域的产品学术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使它们自身更为“自然地”屈从于与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的价值和旨趣相一致的用法。²²但是鉴于委婉语的一般实践(例如在“政治科学”中所追求的)是用一个词语来替代另一个词语,或者通过明确的谨慎(例如引号)或独特性的定义而使过于显眼的词语的普通含义明显地中性化,海

德格尔以一种无限的、更为复杂的方式向前推进：通过在词法上具有内部关联的词语网络之中使用普通词语，他把一种能够同时唤起和废止普通含义、能够在明显压抑它的同时又暗示它（伴之以对它的贬损）的解读，引进到了庸俗和庸俗“人类学”的理解秩序之中。²³

哲学想像——它，就如神话思想一样，为（在实质上被同音异义所范例化的）纯语言关系被附加到了意义关系之上而感到庆幸——作用于同时也是分类形式的语言形式之上。这样在文集《真理的本质》（*The essence of truth*）（德语名称为“*Von Wesen der Wahrheit*”）中，本质与非本质之间的对立被添加到了根本的对立之上，即同时被唤起和被废除的、在秩序（一种虚拟的术语）与无秩序（非本质的可能意义之一）之间的对立。平行的对立，即关于特定的“原初”对立的不同程度的委婉化变体，其本身可以粗略地还原为彼此，在海德格尔“倒转”之后的著作中出现过不可胜数的例子，重申了——以一种升华了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越是植根于误识，在其应用中也就越发普遍（就像实体与本体之间的对立一样）——这种基本对立，而其本身就属于被禁忌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通过把这种对立铭刻于存在（本体化效果）的同时却又象征性地否定它，而建构了这种对立；或者是通过将绝对完全和清楚划分的对立降格为可以从其中引出的一种肤浅、片面的二级对立，甚或是二级对立的最为简易操纵的状态（如在上面非本质的例子中），或者是通过一种并不排斥前者的策略，简单并且单纯

地把这种关系术语中的某一个进行虚拟的普及化,而否定根本的对立。它以一种镌刻在此在的普遍性中的“虚弱”和“无力”的方式,以一种不幸中的平等和稳固的形式作为基础。那些关于非本质的双关语利用了这些效果,并且在对立之间取得了一种只有发生在巫术中之事物才能与之比拟的调和:通过把那些在确立了这种秩序的支配性关系中惟一可见的词语普遍化,而使那种与象征性否定相一致的既存秩序(只凭其对立来用魔法召唤出的,比如在梦境里服饰可以指代裸体)绝对化。²⁴

所有事物都已经如此安排好了,目的是把任何在文本中实施暴力的企图,都作为不体面的东西排除掉,而对于这种暴力的合法性,海德格尔本人在将其施于康德时也意识到了,并且这种暴力独自就能使人“抓住顽固的语言沉默之外的含义”。任何对最初想法——它拒绝对无法翻译的个人语型进行富有灵感的意译——的揭示,都预先被神圣殿堂的护卫者们定罪了。²⁵当他们拒绝头脑简单地说出他们的意思时,或者换句话说,当他们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说出这些内容时,惟一可以说出词语所意味的东西的方法,就是简化不可简化的东西,翻译不能翻译的东西,就是用他们的首要功能所明确否定的幼稚词语说出它们所意味着的东西。“本真性”不是一种对社会指定的“精英”所专有品质的幼稚指派。它指示了一种普遍的潜力——如“非本真性”一样——但是这种潜力只属于那些通过努力理解它是什么、同时努力“使自己脱离”“非本真性”来适应它的那些人。它是一种原罪,由此作为一种错误而被烙上了由

于其自身的失败所导致的罪过,因为只有被选中的少数人才能够被转化。对于这一点云格尔曾经做过明确的论述:“或者承担自己的命运,或者被作为一个客体来对待:这就是现今每一个人都必须解决并且必须独自决定的两难处境……将人置于其自由的原始状态中,例如在被上帝创造出来的那一时刻来思考他。他不是特例,也不是精英。与此相去甚远:因为自由人隐藏在每个人之中,并且差异仅仅存在于这一自由的范围之内,即个人能够发展作为其生来就有的权利的自由的范围之内。”²⁶

虽然具有同等的自由,但是人类在真正地运用其自由的能力上却是不平等的,并且只有“精英”才能够利用普遍可用的、成为“精英”的自由的机会。这种伦理道德的唯意志论——被萨特推进到了极致——把客观社会命运的二重性转化成了存在关系的二重性,使真正的存在成为一种对日常存在的一般理解方法的“存在主义的更改”,用平白的话说,也就是,思想上的革命。²⁷当海德格尔从以下两个角度来探讨存在时,而即或者从对非本真性的感知出发来制造本真性时——在这个关键时刻,此在通过其抉择而将秩序映射于世界之中的焦虑被揭示了出来(一种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向着未知的一“跃”)²⁸;或者相反地,当他描述人之沦为工具的状态——另外一种理解“日常存在”的方式,即当常人把自己当作工具对待,并且因他们的工具性用途而“关心”工具时所采用的方法,这样他们自己也成为了工具,调整自己以适应别人就像调整工具以适应其他工具一样,完成一种其他人同样也能完成的功能,并且一旦当他们以这种方式沦为一个整体中可以互相替换的基本元素的状态,在完成其功能中忘记了他们自己——时,他把社会条件

的客观二重性降格成了存在方式的二重性,而后者正是被前者以一种非常不平等的方式所明确鼓励的;并且他由此既考虑到了那些确保自己进入“本真的”存在的人们,也考虑到了那些“放弃自己”到“非本真的”状态的人们,这二者都应当为其所是的状态负责,前者为他们将自己从日常存在中脱离出来以开发其潜能的“决定”负责²⁹,后者为他们注定要与“堕落”和“社会福利”连在一起的“放弃”负责。

这种社会哲学与用以表达它的形式珠联璧合。实际上,要想看到这种特别荒谬的风格组合与其所负责传达的意识形态的联合之间有着突出的相似,我们只要把海德格尔的语言重新置于当代语言的空间中就可以了,在这里其特征与社会价值已经被客观地界定了:也就是说,仅仅为了突出那些恰当中肯的观点,在斯蒂芬·格奥尔格^①的风格之中的这种传统和神圣的后马拉美^②的诗歌语言,在卡西尔^③的风格之中的新康德派理性主义的学术语言,还有最后像毛勒·范·登·布拉克(Möller van den Bruck)³⁰,或者当然地,与海德格尔在政治上更加接近的恩斯特·云格尔的“保守主义革命”的“理论家们”的语言。³¹与后象征主义诗歌高度格式化和净化

① 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 1868—1933),德国诗人,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曾经创办《艺术之页》杂志,发表他的艺术理论和创作。著有诗集《颂歌》、《朝圣》、《灵魂之年》、《第七枚戒指》等。——译者

② 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法国诗人,初期属于巴纳斯派,后成为象征主义的代表,其作品充满神秘主义色彩。——译者

③ 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74—1945),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之一。提出“象征形式哲学”,著有《象征形式哲学》、《近代哲学和科学的认识问题》、《实体概念和功能概念》等。——译者

了的语言(首先在其词汇中)相反,海德格尔式的语言,作为其哲学秩序中的变奏曲,由于在概念文学(*Begriffsdichtung*)的严格概念逻辑中所暗含的自由,引进了被那些伟大的专家的深奥话语³²所排除了的词语(例如 *Fürsorge*)和主题,同时还引进了被高度中性化了的哲学学术语言。从鼓励充分利用普通语言和常识谚语中所包含的思想的无限潜能的哲学传统中得到提示³³,海德格尔通过把作为哲学传统特征的所有问题和象征强加于先前所禁止的词语和事物之上,并且通过把它们统一进由概念诗歌的词语游戏所编织的织品中,而授予它们以新的高贵性,从而把这些先前被禁止的词语和事物[按照他自我标榜地提到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炉火寓言]引入到了学术哲学中。“保守主义革命”的发言人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后者把前者所有的主题和大部分词语引入哲学的——完全在于这些主题和词语的被误识的形式。但是,如果所有在这种教授式话语的田园变奏中所实现的远与近、傲慢与淳朴的最初关联,都被简化为它的这种或那种的对立面,那么海德格尔式话语的特征无疑就会消失:这种杂牌语言充分包含了精英主义这种在大众可及的限度内为最“普通”的人们提供哲学拯救的目标,提供他们能够听到的、高于邪恶牧师们的堕落的信息的哲学元首的真正的思想,而这种哲学元首只不过是一个代言人(*Fürsprecher*),一个由于他传达了神圣的话语而被认为是圣者的人,而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低贱的鼓吹者。

内部解读与对形式的尊重

弗里兹·英格(Fritz Ringer)从1932年施普兰格尔^①相信“民族学生运动就其内容来说是真实的,但其形式却失去了原则”的话语中辨别出德国的“达官贵人们”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应的真相,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正确的。³⁴对于学术上的理性中心主义来说[其局限已经被海德格尔派哲学——杰出的爱好逻辑(philo-logical)的哲学——的词语拜物教所设定了],这是很有意义的好形式。哲学贵族主义(学术贵族主义的超级形式)与任何其他形式的贵族作风之间的关系——包括容克们(Junkers)^②和他们的发言人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式的贵族作风——在塑形和对任意种类的“还原论”的禁止中表达了出来;也就是说,反对任何以把话语恢复到其最简单的表达形式为目标的对形式的摧毁,以及反对借此回复其生产的社会条件。对此所需要的惟一证据,就是哈贝马斯在回忆海德格尔时所采用的形式:“自从1945年以来,关于海德格尔的法西斯主义的话题就从四面八方提了出来。从根本上说,是1933年的就职演说——当时海德格尔庆祝了‘德国存在的迸发’——处于辩论的核心。然而所有的批判都到此为止,保持纲要式的形式。另一方面,更为有趣地,是发现《存在与时间》的作者(自黑格尔的《现象

① 施普兰格尔(Franz Ernst Eduard Springer, 1882—1963),德国哲学家,著有《青年时代的心理学》、《生活的方式》等。——译者

② 容克是德语“Junker”的音译,原指没有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指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译者

学》之后最为重要的一项哲学事件),如此伟大的一个思想家,如何能够堕落到这样一种明显是初级的思想方式,对此任何头脑清楚的分析都能从这种无风格的感召因素(*unstylized pathos*)中辨认出对德国大学之自我维护的呼唤”。³⁵为了达到与话语“擢升”的关注——这种在哲学家与语言的关系中表达出来的基本哲学尊严感——相分裂的目的,仅仅防御“马丁·海德格尔作为一个作家的语言学姿态的‘擢升了的’品质”³⁶,这显然是不够的。

“擢升了”的风格并不仅仅是哲学话语中的一个偶然属性。它是一段话语宣称自己是权威化了的,是得到了授权的话语的手段。由于它与某个群体的人们,尤其是与被委任来行使一种概念职权(主要是逻辑的或者道德的,这取决于作者和年代)的人们所具有的权威相一致的特点,它能够确保在恰当的话语中没有位置的特定事物,或者找不到能够给予它们正确形式的发言人的特定事物,不会被说出;反之,它还能确保,其他一些如果不如此就无法说出和无法接受的事物,能够被说出并且得到理解。在普通言谈中,与在充满知识的话语中一样,风格是有等级的,并且是被等级化了的;一种“擢升了的”语言对“顶级思想者”来说是合适的,这也就是使海德格尔1933年所发表的“无风格因素”在所有那些具有哲学尊严感,即具有其作为哲学家的尊严感的人眼里是如此的不适宜的原因:而同样是这些人,声称《存在与时间》的哲学风格化的感召因素是一哲学事件。

正是通过话语的这种“擢升了的”风格,它在话语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以及与该地位相应的尊重才得以产生。“真正的居住(*dwelling*)困境存在于此,凡人们重新寻找居住的本质,他们必须

学会居住/思考^①”³⁷，像这样的短语不会得到像普通语言的陈述一样的对待，例如“住房危机正在恶化”，或者是技术语言的陈述，例如“在豪斯沃格埃普拉斯(Hausvogelplatz)，柏林的商业区，每平方米土地的价格在1865年是115马克，1880年是344马克，1985年为990马克”。³⁸作为一种具有其自己的形式的话语，哲学话语支配着对哲学话语之看法的条件。³⁹塑形将世俗者拒于千里之外，并且保护原文不会被“平凡化”(如海德格尔所称)，它是通过将其保留为内部解读(internal reading)而做到这一点的；这种内部解读有两种含义：局限于文章本身范围之内的解读，以及与之相伴的，将其保留为专业读者的封闭圈子之内的解读，而这些专业读者则接受了这一看法，即把解读的“内部论的”定义当作不证自明的。我们只要观察一下社会习俗就可以发现，哲学文本是被界定为(实际上)只能被“哲学家”，即被准备认可并且确认哲学话语的读者所阅读的；并且是按照其所要求被阅读的方法解读的：与纯粹的和纯然哲学的意图同出一辙，“哲学般地”是对所有借助于话语自身之外的东西之解读的排斥，以自己作为自己的基础的话语，除其自身之外不承认任何东西。

制度化了的集体误识的圈子，作为对意识形态的话语价值的信任基石，只有当该话语生产和流通的场域的结构使它所引起的否定(仅仅通过暗示它没有被说出来这一形式来说出它所要说的东西)与能够如实地再次误识(misrecognize again)这一否定信息的

① 单词“dwelling”既有居住的含义，又有思考的含义，这里正是利用了这一词语的双关含义。——译者

解释者一起出现时,才能确立起来;换句话说,仅仅当被形式所否定了的东西被以这种形式并且仅以这种形式得到理解和认可时,也即这种形式通过否定自己而得以实现时,这一圈子才得以确立起来。简而言之,否定的话语需要一种承认,并且再生产了对其最初否定形式的(或形式主义的)解读,而非为了发现其所否定的内容而对其的否定。任何意识形态的话语所暗含的象征性暴力,在其基于要求再次误识的误识之基础上,仅在它能够使它的接收者按照它所要求对待的方式对待它的意义上,才是有效的,即带着应有的尊重,奉行其正式属性所要求的正式形式。当意识形态的生产能够把任何试图将其还原为其客观实际的人置于错误之中时,将益发成功。能够指责关于意识形态的科学是意识形态,这是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意识形态所特有的属性:说出一段话语所隐藏着的真实是丑恶可耻的,因为它说出了“最不应该被说出的”东西。

最为复杂的象征性策略也永远无法生产出其自身成功的所有条件,并且如果他们不能指望由那些维护正统并且将对还原解读的最初谴责和谐地结合起来(通过将其扩大化)的人们所组成的整个群体的积极同谋,那么它注定会失败。⁴⁰

海德格尔只需宣称“哲学从根本上就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是那些永远不能在现存中找到即时回应的少有事物之一”⁴¹;或者,如他在对尼采的介绍中所提到的,“这属于所有真正哲学的本质,同时代的人毫无例外地都误解了它”⁴²——这是在他的论述中尤其丰富多彩的、关于“被指责的哲学家”这一主题的变体——所有评论者就都会立即亦步亦趋:⁴³“这

是所有哲学思想的命运,一旦其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力量和严密,就会被它所挑战的同时代人所误解。把这样一位其唯一与不断的关注就是真理问题的哲学家归类为文化逻辑的传道者、虚无主义的倡导者和逻辑与科学的反对者,是最为奇怪的歪曲之一,而这正是这个轻浮时代的罪过。”⁴⁴“他的思想在我们的时代和所有当代人看来都是某种异端。”⁴⁵

因此“关于人文主义的来信”,在所有其目标在于策略性地操纵公开的系统与潜在的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且由此操纵这部著作的公众形象的仲裁中,最引人注目,也被引用得最多。它发挥了一种牧师公开信的功能,成为了一种无限注解的源泉,它使简单的关于存在的福音传教士能够为自己再生产出铭刻在每一个主教的警告之中的谨慎,并且由此使自己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在授职者与凡俗者之间的对立中站对立场。随着传播浪潮的推进,随着它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场域,从权威的解释者和自发的评论者到学术报告、介绍文章并且最终到文本,随着解释尺度的下降,与之相伴的是描述或者释义的高贵性的削减,公开通俗的话语越来越趋向于回归基础的真理;但是,按照流溢论(emanationist philosophies),这种传播也伴随着一种价值的丧失——如果不是内容的丧失——而且这种“平凡化了的”和“通俗化了的”话语带有其堕落的标志,因此就益发为其最初的或者奠基的话语增添了价值。

在伟大的阐释者的著作,与其所引发的解释与过度解释之间确立起来的关系,或者,在其目标为纠正和避免错误或恶意解释的自我

解释,与那些合法的、权威的解释之间的关系,完全类似于——除了它们缺乏幽默感之外——那些自迪尚^①以来在艺术家与其解释者群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中,生产都预期到了解释,并且在其解释者所玩的双猜游戏中,又诱发了过度的解释,而同时又保留着以著作本质的无穷性名义来否定这一点的权力;由于其创造性力量的超越性权力(它也以批评权和自我批评权表现出来),这种无穷性会导致人们接受,或者同等地,拒绝任何解释。毫无疑问,海德格尔的哲学是最初的并且也是最为成功的现成的(*ready-made*)哲学创造,它是天生就需要(*made to be*)解释的著作,并且是由解释所衍生(*made by*)的著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必要地、过于推进的解释者与通过其拒绝、修订和纠正而在其著作与任何特殊的解释之间建立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的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作用。⁴⁶

这种类似并非如其最初看似的那么不真实:通过确立“本体论区别”的意义——这一区别区分了他的思想与所有先前的思想⁴⁷,也区分了“通俗的”、前本体论的和幼稚的“人类学的”解释(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如萨特的解释)同本真的解释——海德格尔把自己的著作置于不可触及之地,并且预先谴责了所有的解释;因为无论这些解释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将把其自身局限于其粗俗含义之中,并且将——如一些好心却刚愎自用的解释者所做的,以及社会哲学家按照一种完全不同的目的所做的——把对“非本真”存在

^① 迪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现代画家,被认为是达达运动的国际领导人之一。——译者

的分析还原为社会学的描述。通过在作品自身安排两种对其的不同解读之间的区分,海德格尔使自己相当有理由说服那些支持他的读者,使他们在面临最为困窘的双关语或者最为喧闹的陈词滥调时,从这位大师那里去寻求指导。当然,也许读者已经理解得很好,但是他仍然被说服去怀疑自己理解的真实性和真实性,并且禁止自己评价这样一部作为其自身理解之衡量标准而建立起来的著作。如韦伯所述的神父,他们有机会使世俗的人们为文化事业的失误而承担责任,由此,伟大的教士般的语言,即使遭遇了意外、转变和时间的流逝,或是发现它们自己被抛掷到了“谬误”(error),或者更好一点,“歧误”(errance)之中的情况下,都能够确保解释者们的同谋关系,而这些解释者除了追寻和认可著作的必要性之外别无选择。

在此,附带地,有一个关于解释癖的突出的例子,为了避免如预先被权威的双关语所斥责的过分简单化,它用上了国际翻译协会的综合资源:“按照以下理由,在英语中这一措辞(即‘errance’)是生造词:拉丁语‘errare’的最初含义是‘漫游’,第二含义是‘迷路’或者‘犯错’,取‘迷失正确道路’之义。在法语‘errer’中保留了这一双重含义。在英语中,这两种含义保留在了形容词形式‘errant’中:第一种含义(‘漫步’)用来形容漫步寻找历险的人们[例如‘游侠骑士(knights errant)’,第二种含义指‘偏离真理或偏离正确的’,‘犯错误的’。名词形式‘errance’,并非是标准英语用法所认可的,而是我们自己引入的(根据法语译者的榜样,第96页及其后),目的是指出‘四处漫游’和‘迷路的’(‘犯错的’)两种含义之间的细微差别,前

者是后者的基础。这样做应当是忠实于作者的原意的,而且可以尽量避免简单化的翻译,即那种由译作‘error’(‘谬误’)所自发引致的简单化。”⁴⁸

作为权威和保证的源泉,文本自然就成为那些在这些领域里只有如此隐藏才有效的策略的目标,并且尤其是——这是信奉的结果——在其作者自己的眼里;对他们的象征性资本的分享通过与对恰当性的尊重相交换而获得,这种恰当性,按照著作与解释者之间的客观距离,在每一个例子中,界定了他们之间将要确立的关系的风格。这里所需要的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分析,即在每一个特定的例子中,按照被解释的著作以及解释者在给定时刻在其对应的等级制度中的相关地位,对解释者——无论是研究者、官方发言人、自发的评论者还是坦率的教师——的特殊旨趣的分析,并且确定他们如何引导和向哪里引导解释。因此,如果不清楚海德格尔式粉饰的努力恰好及时满足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期望,即那些为了急于使自己摆脱困境而把典型的庶民哲学(*pleibeia philosophia par excellence*)——当时被强烈地怀疑为“琐屑”——与当代最有声望的哲学联系到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期望,如此要理解如法国海德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例如马尔库塞(Marcuse)⁴⁹与赫伯特(Hobert)⁵⁰的追随者——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的位置就是相当困难的了。⁵¹在所有隐藏于“关于人文主义的来信”当中的操纵性工具中⁵²,再没有什么能够比二级策略(second-degree strategy)——致力于讲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富有成效的对话”的语言——能更有效地影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了,这种二级策略包括了为新的

政治背景重新解释典型的海德格尔式的以(伪装的)激进化取胜的策略,这种策略,是早期海德格尔曾经用来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Entfremdung)概念的:“基本的本体论”是基于马克思在最为激进和最基本的人类异化中所描绘的“异化的经验”(尽管保持了一种过于“人类学的”方式)之上的,即他们对于存在的真理的忘却,确实代表了激进主义的完美形式。⁵³

为了向自己证实,这种出人意料的哲学联合与所谓严格的“内部”辩论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我们只要重读一下关于简·比欧弗瑞特(Jean Beaufret)、亨利·勒斐弗尔(Henri Lefebvre)和考斯塔斯·阿克塞罗斯(Kostas Axelos)⁵⁴之间讨论的记述就足够了:“我被一种景象所迷惑并且被深深地吸引了——这还不是特别准确的描述——与这些年出现的大部分哲学命题的浅薄相对照,它益发令人刮目相看”(亨利·勒斐弗尔);“在海德格尔的宇宙-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历史-实践的概念之间没有对抗性”(亨利·勒斐弗尔);“为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提供了共同基石的,并且我认为是联系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正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本身,这个有着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和全球技术扩散的时代……最终,这两个思想家确实至少是分享了同一个对象……与此不同的是,例如社会学家只分析这儿和那儿的具体表征”[F. 查特莱特(F. Châtelet)];⁵⁵“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推进了对现在世界以及过去世界的激烈抨击,而且他们共享一个共同的、为这个星球的未来做计划的关注”(考斯塔斯·阿克塞罗斯);“海德格尔的基本贡献是帮助我

们懂得了马克思所说的东西”(简·比欧弗瑞特);“成为纳粹的不可能性是《存在与时间》和《时间与存在》之间颠倒的重要部分。如果《存在与时间》不能保证海德格尔与纳粹的界限,那么《时间与存在》——不是一本书而是1930年以来他的思考以及他1946年以后的出版物的概要——则使他与纳粹永久地划清了界限”(简·比欧弗瑞特);“海德格尔是彻底的和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亨利·勒斐弗尔);“海德格尔以一种非常不同的风格,继续了马克思的工作”(F.查特莱特)。

解释者的特殊旨趣,以及在此领域中,用解释圣徒传的最伟大的才能和投入,把最有声望的著作传播给读者的那种逻辑,都不能够解释以下这一点:即如何在特定的点上,在哲学场域的各个派别中,海德格尔派哲学被当作哲学雄心的最杰出的成功而得到了认可。这种社会使命,只有在先已存在的性情倾向之类同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而这种类同,其自身源自哲学教授队伍的补充和训练,以及哲学场域在大学场域和智力场域结构中的位置,等等。这种关于由哲学教授们所构成的教授群体之“精华”的小资产阶级精英主义(这些哲学教授们通常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最低阶层,由于他们在学术上的杰出才能而得以征服各人文学科级序的高峰,并且达到了教育系统之象牙塔的制高点,高于世界和尘世的任何权力),几乎毫无例外地能够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具有同类性情倾向的典范产品——产生和谐的共鸣。

海德格尔式语言所显现出来的所有最特殊的影响,尤其是所有构成软弱无力的说教修辞的影响,即神圣文本——作为无休止

的、持续不断的评论的源泉——的词语变化，被竭尽主题的意图所引导，而这种主题，按照其定义是无法竭尽的，它表征了典型的局限，并且由此表征了职业小把戏的绝对合法性，而这些小把戏则保证了韦伯所称的“来自权威方面的预言者”（*Kathederspropheten*）“在世俗之上世俗地再生产关于存在的错觉”。因此，这些神父式的预言的效果，只有建立在深谋远虑的同谋关系上才能够充分成功，这种同谋在对某些先决条件的接受之中联系了作者和他的解释者，而这种接受是“次要的牧师预言者”（再次如韦伯所称的）之功能的社会学定义中所暗示的；而在这些先决条件当中，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由任何自尊的、有文化的读者所赋予的文本的神圣化更能适应海德格尔的旨趣和要求了。为了提出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的问题，就要求一种异乎寻常的、对中立学术戒律的超越，而讨论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这一非凡事件，但随后这种要求又被放到一旁，就好像它是一项不合时宜的提议，是另一种形式的中性化一样：这种定义排除了任何在哲学中对政治的公开指涉，它被哲学教授们如此复杂地内在化了，以至于他们在努力忘记，海德格尔的哲学从头到尾都是政治性的。

但是在既定形式之内的理解，如果不是经常以某种理解——它是一种既更复杂又更模糊的理解，建立在或多或少位置完全相应和惯习完全类同的基础之上——作为面具，那么就将始终是空洞的和形式化的。理解还意味着不必被告知就能理解，即通过以实践的方式再确定（在多数例子中都是无意识的）由生产者最初确立起来的语言的关联和替换，并且读出其言外之意：这就是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之具体矛盾的解决办法是如何被发现的，而意识形

态的话语正是从其二重性当中获得效力的,它只能以佯做不知或者背叛的形式,合法地表达社会的旨趣。位置的类同以及对各不相同的惯习的成功的综合,鼓励了对读者所表征的旨趣的实践性认同,也鼓励了对审查之具体形式的实践性的认同(这种审查禁止了它们的直接表达);并且这一认同给予了直接进入话语所意味的东西的通道,它独立于任何有意识的解码行为。⁵⁶这种前语言的理解,是由一种尚未说出的、事实上被压抑了的表达旨趣与其已经被接受的表达方式(已经按照场域的规范而表达)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⁵⁷

2. 宏大话语：

关于“对《读〈资本论〉》的几个评注”* 的若干社会学思考

“当一个人有神圣的任务时，他本人不是已经被一种相同的任务神圣化了吗？”祝圣者被神圣化行为神圣化的神圣辩证法通过谦卑的表白（比如“并非无用”、“无任何权威”、“有限但是重要的”，等等）和夸张的表现（比如浮夸的重复：“就论点和表达方式”、“引用和使用”、“在法国和外国”、“提出和解决”；或对行为的夸张指涉：“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在集体劳动中”“确实应该在以后的日子对这种用法进行一种既是批评的又是完善的特定历史分析”、“如同我们现在开始知道的”、“应该分析的一个结论重点”、“这种转移后果严重”、“阿尔都塞从一种对列宁的实践和思考这种实践的文本的分析出发走到这个方向，绝非偶然”，等等）显示出来。这种话语包含了关于这样一种话语的话语，它除了表明话语和把持话语的人的知识或政治重要性之外没有其他功能（比如“重要”、“基本问题”、“这关键的一点”、“最基本的和最严重的”、“深远得多”、“这一点具有一种基本的政治重要性”、“我们借此接触到了某种更加深刻的东西”，等等）。

资本的转移

神圣的我从最初的预言家那里取得权威；但是，无论禁止他以第一人称说话的谦卑（分享被继承的权威资本的条件）多么深重，他也不能忘记他有某种通过脱俗化恢复资本原状的功绩，这种脱俗化是对阅读的革命，阅读决定了文学修养的革命。在另外一种关系中，他也知道他注定要受到“偏离”的“诱惑”，但他也被对激起他深刻的疑问的文本的尊敬保护起来（“只是，作为理论，马克思的解释真的是唯物主义的？它难道能在不引起重大的矛盾情况下……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问题相容？”）。

普通的僧侣人员引述和背诵；伟大的僧侣人员激发和再现。后者有时甚至敢于暴露在追本溯源方面遇到的（“全部这些问题在最后的分析中，不过是一种稳定而矛盾的……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问题的一个确定变种”；“这种形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必要的角色，但它恰恰在它所批评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依旧是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从根本上说，这种情形毫无惊人或过度之处”）不和甚或矛盾（我们想到了阿伯拉尔）。照此做法，他成了维护启示真实性的人，惟他能够阻止所有那些人“重犯”“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那些人，“尽管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

在哲学上相当平庸的脱俗化策略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原始的形式：这不仅意味着比马克思本人更理解马克思，以（老年）马克思的名义超越（青年）马克思，以一种比马克思还马克思主义的“阅读”

所产生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名义修正在马克思身上残存的“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而且因此兼有与原始预言家同一的利益——也就是与从属相关的知识和政治权威——和区分的利益。

赌注是相当“大”的：将一部本身即为科学的作品变成科学，就是由此推进认定这部作品即是科学的对象的科学。对理论文本的理论阅读变成了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兼并或消除，摆脱了“所谓社会科学”的竞争，哲学家，即保管人和保证人，被恢复了（他们曾被免除的）科学实践的（他们总是要求的）“终审”法官职位。

决定神圣的预见力的双重游戏因此有助于集中通常为专有的利益，知识权威的两个可能根源提供了这些利益：一是作者的个人权威，这种权威总是受到对预言的质疑和对神圣的谴责的支配；一是代理人的制度权威，代理人对整个团体的团结一致很有把握，他属于这个团体或把自己当成这个团体的全权代表，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当成被公认的全体马克思主义者的全权代表，由于赞同正统解读而被如此构成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赋予正统解读以社会权力。为争夺对《资本论》的合法评论的垄断权的斗争不会如此激烈，如果它事实上不以马克思主义——既能在政治场域又能在知识场域有效的关于社会世界的惟一理论——代表的巨大象征资本为赌注，由此而来的是人们可称之为列宁综合症的东西——知识分子当中的哲学王梦想所采取的形式之一。这种资本的转移本身就是有助于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策略转移到知识斗争领域并且以“斗争”的需要为名搁置支配一个相对自主的知识场的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则的东西。

理论罪恶

理论神职人员依靠理论错误为生,表明、揭露和消除理论错误是神职人员的责任:“诱惑”、“偏离”、“重犯”无处不在,甚至在他自身的话语中。神圣权威意味着修正的权利:它甚至到原始预言家的话语中搜寻错误(这使人想起令人嫌恶的语文学家的“增补”),即使不该清除和删除,至少也该改正和不断地改正,“越改越正”。神职人员拟定罪恶的目录(带“主义”的词)。按照一种完全类似于致使海德格尔的住持教士在正统阐释和人类学-存在主义阐释之间建立一种基本“差别”的逻辑的逻辑,神职人员不断重申他对合法解读的垄断权,在合法解读和世俗解读之间建立一条绝对的“鸿沟”,这条鸿沟尤其表现为经典概念的二分法。他确定什么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即什么是被某些人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惟有这些人在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当中应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他通过某些策略实现这种界限的划定,这些策略是宗教领域的法则,表现为代替分析的咒骂。这些策略也是政治领域的法则,表现为产生腐败、耻辱和影射的大杂烩;由于被贴上了分类的标签,这种大杂烩引起了怀疑,更不用说受到公开的谴责了,这些标签将全面受到斥责的阶级指定为政治和理论的“敌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虽然它们表面上将这个阶级归入概念和逻辑类型。

明证的语调

权威话语以明证的语调(*l'évidence*)表明主张(如:“这根本不是偶然的”、“很清楚的是”、“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并非偶然的是”,等等)。一种兼具两条合法化原则即兼具大学权威和政治权威的话语,可能有双重权威。毋庸置疑的修辞学无疑从具有理论高度的符号和简单直接行事的坚决意愿的标志的组合中,得到特定的色彩和无疑最难以觉察的效果(在卑微弟子中,这种高度普及的修辞学假装进入可能以简略主义为乐的领域——从而倾向于达到高等-师范-学校的效果)。因此职业意味超过权威意味的“可以说”,在这里是为了放过如此惊人地不和谐的一个系列:“可以说这是物质的、本体论论据的和‘惯性定律’的永久哲学。”除了威胁的句子、惊叹号和着重号的大量使用,这种不容置辩的和简化的节略修辞学最典型的形式是马克思也采用的突兀并置:“伏尔泰、黑格尔,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一流的大学教员与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双重合法性并不过分,这样,人们就能接受如此随意的对比和“等等”中所包含的狡诈暗示。这种合法性的兼备为存在于神圣预言能力之中的双重游戏策略开辟了一个几乎是无限的场域,尤其是有助于兼有防备和利益而又无需付出通常相应的代价和风险。但关键是权威可以说是在确立的过程中确立的:从那些涉及风格的特征如极端的简约和断然的命令开始窃取权威的一般特征,是篡夺象征权力的可能策略之一。

意识形态怀疑

并置也是传染(contamination)策略的物质基础,传染策略的目的是通过接触产生污迹(比如:“结构主义=黑格尔+费尔巴哈”)。好像在神话话语中一样,人们无需就有关联的两个词语[这里是结构主义和黑格尔或费尔巴哈;“类型论者或(?)结构主义者”],也无需就它们被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发表任何见解。传染尤其是意识形态怀疑的权力和经济武器。理应强加于人并且让人敬畏的权威语言,通过方程式展开:这个“等同于那个”,“不过就是那个”,“等于那个”,“恰好意味着”。这些形式的表达式“博罗罗人是鸚鵡”(les Bororos sont des Araras)^①,在参与逻辑中起作用,既说明了这是什么,又说明了应该说什么、做什么或想什么,它对被命名的事物实行一种真正的本体论转化。

神学家的神正论

“这些福音,”尼采说,“人们不能过分谨慎地阅读:在每个词后面都有其困难。”圣经连同它的(德语)“双关”词、它“真正的困难”、它“严重的矛盾”、它“理论的障碍”本身,证实了阐释甚至过度阐释的神圣垄断权(海德格尔或弗洛伊德一直享受其恩惠),惟有阐释

^① 参见涂尔干和莫斯:《原始分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6页,“博罗罗人实心实意地把自己想象成鸚鵡……”——译者

和过度阐释能够保护文本不受头脑简单的外行的普通阅读的侵害。阐释者主体反对“偏离”和“重犯”：惟他知道抓住双关键词的褒义；惟他知道将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资产阶级”用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用法区分开来；惟他能够决定正确路线；惟他能够“更深入”并且就“普遍范围的问题提出普遍的论题”。总之，他造就文本的困难，文本的困难把他造就成惟一能够克服困难的人，这样他就成了神圣文本的真理的绝对把持者，神圣文本是所有关于社会世界的确定的和标准的真理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作为自我颂扬的最高形式的自我批评

神圣的错误并不是一种错误而是神职功能的困难和必要性的一种补充证据。自我批评不仅消除了错误；它还有利于兼有错误的象征利益和公开认错的象征利益（如：“我无法摆脱”、“我继续考虑”，“我引进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的萌芽”、“我引进了一个可无限更新的疑难”，等等）。因此“读者”便可以一个一个地抛弃对“阅读”的成功作出最大贡献的创新，好像抛弃了那么多罪恶一样：让“理论工作”见鬼去吧，因为它是一种“纯理论主义倾向”的症候；让“组合”见鬼去吧，因为它是“结构主义者”的卖弄；让“结构因果关系”见鬼去吧，因为它是“斯宾诺莎主义”的残余；等等。需要怎样的智力能力和严格性才能产生“自我审讯的诉讼案件”，连马克思主义的最狂热的敌人，“反马克思主义者”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想到的最细微的异端痕迹都在这种案件中被无情揭露！

占统治地位的学科受到它自身的统治的统治：支配经验知识和产生经验知识的科学的意图，在这哲学野心的变种中，导向从本质中推断事件、从理论模式中推断历史条件的意图。如果自我批评进行到底，它就会发现这意味着不仅要放弃从一种可能的生产方式及其变化的经院式组合中推断现存生产方式的原始野心（如：“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推断，如果这种构成方式”；“可从普遍的社会形成机构的模式中推断出来的”），还意味着放弃“理论”意图，理论意图是这种野心的根源并且在对“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拒绝中找到它的“理论”证据，即无科学实践的一种“科学”的证据，被归约为一种关于其他科学的合法话语的“认识论”的证据。

3. 科学性的修辞：

对关于孟德斯鸠效用的一种分析的论证

“加斯科尼人比诺曼底人的想像力更丰富。”

马勒伯朗什,《寻求真理》

对于想要分析一种文学传统之功能的人来说,不会有比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论引起的全部评论更切题的例子了:一个上溯到古典时代被学士院到处[直至波(Pau)城,在1743年,《论法的精神》问世前几年]在各种竞赛中提出的问题:“人们生长的地理环境的差异是否造成了他们的精神差异?”许多真实的或被推测的“来源”是为了激起或维持博学的争论而造就的;鉴于体裁的法则,数不清的评论全都部分隐没且对待经典文本过分严肃但又嫌不足;不是不足以对经典文本所宣称的论题的真实性(或创新性)提出疑问,而是不足以对经典文本为了产生一种真理作用所使用的论证方式的逻辑提出疑问。

无需费力打断主祭的连祷,若只是为了企图将崇拜的对象变成科学的对象,或更确切地说,变成供社会科学的科学使用的文献,如果说这种衰落的状态没有提供一个抓住依旧纠缠着社会科学的科学神话的良机,这是因为新生态的社会科学在这种状态中

在神话和科学之间犹豫不决。地理环境论事实上是“科学”神话，即建立在信仰(或偏见)基础上的话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范式，这种信仰垂涎科学，其特征是两个混杂的一致性原则的共存：一个是公开的、具有科学外表的一致性，它通过许多科学性的外在符号显示出来；另一个是隐秘的、根本上是神话的一致性。这种双重游戏和双重含义的话语从以下这个事实得到它的存在和它的有效性，即在科学时代，无意识冲动导致以神话或宗教的方式给予一个从社会方面来看重要的问题一个统一的和全面的答案，但这种冲动只有借鉴科学的思想方式或表达方式才能得到满足。

科学机器

当人们考虑到认识论规律，尽力展示合理化神话的不合逻辑时，¹同时却禁止自己把握赋予这种神话一种足以引起这样的批评——和抵制这种批评——的社会逻辑性和有效性的东西，也就是把握(具有独立于其真实价值的象征有效性的)“科学”外表与神话意义网络的联合，神话意义网络为科学“机器”提供另一个范畴的一种逻辑性。换句话说，与自然而然地导致主祭们解释一切的圣徒传记配置(disposition)最彻底的决裂²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不考虑科学性修辞的所有因素，这些因素除了证明一种意愿的科学性，还有助于“科学”神话的特殊有效性。这首先是对18世纪的医学即体液理论尤其是约翰·阿巴斯诺特(John Arbuthnot)创立的纤维理论的所有借鉴。³“寒冷的气候抑制了身体的外部纤维末端；这增加了它们的活力并促使末端的血液回到心脏。它减少了这些纤

维的长度；但它由此增加了它们的力量。相反，炎热的气候放松了纤维末端，增加了它们的长度；但它减小了它们的力量和它们的活力”(XVI,2)。⁴对于科学精神的一种精神分析必然要指出借一词多义(平衡、力量、活力，等等)进入解剖学和外观描述的原始意象和特有对立：扩张的比喻与紧张(或紧缩)和放松的模式结合在一起，以便在科学描述的外表下建立寒冷与力量(或炎热与软弱)之间的等值，人们会看到，这种等值是神话逻辑性的根源。⁵而且我们同样可以指出体液理论如何与食物(比如猪肉，第XXIV章)的最深刻表现结合在一起，以解释饮食制度，即气候与身体的和精神的配置之间的另一个假定中介的。但是“科学”外观和装饰并不限于使用科学术语和模式，也不限于求助于实验(在显微镜下观察一条羊舌)。一切都说明，孟德斯鸠以笛卡尔体系为榜样，试图建立一种能够像物理学一样把握“来自事物本质的必要关系”的历史事实的科学(I,1)。他就是以科学、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和对依靠科学进步的信仰(以非常典型的笛卡尔措辞表现在1725年的《论应该鼓励我们面向科学的理由》中)的名义，违背了科学认识的界限，服从于某种在一种更进步的科学看来是一种推断的甚至篡夺的形式的东西。

神话逻辑性

但是，在科学外观下，神话基石无处不在。无需进入一种长篇大论，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简图的形式下重建神话的对立和等值网络，即支持整个“理论”的真正奇特结构。

这个关系网络是从少数对立出发形成的,情况一向如此,这些对立大部分时间都是仅仅由它们的一个词表示的,⁶而且导致一种生成的对立,即(自己的,进而别人的)主人与(感官的和主人的)奴隶之间的对立。北方男人是真正的男人,“活跃”、有男子气概、紧张,像弹簧一样紧绷(“男人”,孟德斯鸠在某处说,“像弹簧一样,绷得越紧越好”),这径直体现在他们的癖好即打猎、战争或饮酒之中。相反,南方人注定要受感官、感觉还有想像的奴役和支配,像是色情贪婪狂的根源,同时也是怀疑和嫉妒的痛苦根源;他们被指责为尤其在被动的激情面前表现出(女性的)被动、贪得无厌的和必不可少的肉体之爱,即女人的激情,此种激情被理解为为了女人的激情以及女性的和女性化的激情,让人委靡、软弱、剥夺人的活力、精力的激情。⁷这些放松的和怯懦的配置,一句话,女人气⁸的配置,造就了一种受双重奴役的人类,这人类注定要遭受统治,因为他们不知道统治自己。基本对立的整个这方面在关于后宫的幻觉中实现,⁹后宫即“不断产生和停止的”的爱情和一夫多妻制即女人表面上遭受奴役之所,这种奴役在男人对感官因而对女人的奴役中找到了根源。我们看到,通过男女在根源上的对立,与女人和性的关系主宰着这个神话,这个神话通常是社会幻觉和社会教授的性幻觉相结合的产物。孟德斯鸠最终明确提出“本国政府与政治之间的关联”问题无疑并非偶然(XVI,9):实际上在此除了性和政治之外还结成了有意识的理据网络和社会筹划的无意识幻觉的隐秘链条,在这个网络中,涉及的是“对女人的支配权”意义上的“家庭奴役”,而在这个链条中,涉及的多半是女人(以诡计即弱者的力量为战术)实施的支配权和作为逃避女人支配权的惟

一手段的专制,女人的支配权是留给专门服从这种**普遍不吉利**的权力的男人的。¹⁰我们看到,不应该向神话,即便是“合理化”的神话,要求更多的它不能提供的逻辑。

北方 = 寒冷

寒冷的疾病,自杀

(XIV, 12)

绷紧(紧张) = 坚强

身体和精神的强大

自信 =

勇气 = 坦诚

对痛苦(a)和快乐(b)

无动于衷(c)

宁静的音乐(英国歌剧)

(微弱的想像力)

(XIV, 15)

(活跃) = **男子气概(f)**

(高贵的)举动 = 慷慨的情感 =

好奇心

打猎、旅行、战争、饮酒

(XIV, 2)

南方 = 炎热

炎热的疾病、麻风病、梅毒、鼠疫

(XVI, 11)

放松(怯懦) = 软弱

软弱 = 灰心 =

(报复心 =

怀疑、诡计、罪恶) =

怯懦(XVII, 2)

对(感官的)快乐非常**敏感(d)**

= 爱情 = **后宫(XIV, 2)**

疯狂的音乐(意大利歌剧)

强烈的**想像力 =**

多疑(e) = **嫉妒**

(XVI, 13)

身体的**被动,**

精神的**懒惰**

法律和道德的**不变(g)**

僧侣生活

(XIV, 7)

(一夫一妻制 - 性别平等)	多配偶制(“家庭奴役” (XVI,2,9)
自由(XIV,13) =	奴役
君主制度和共和制度	专制制度(h)
基督教	伊斯兰教

a——“要让一个莫斯科人有感觉,非得给他剥皮不可”(XIV,2)。

b——“爱情的物理学几乎无力让人感受到”(XIV,2)。

c——“感觉不那么强烈”(XIV,2)。

d——“人们为爱本身而爱;爱是幸福的惟一原因;爱是生命”(XIV,2)。
“享乐的国度”(XVI,8)。

e——“自然赋予这些人一种使他们害羞的弱点,也赋予他们一种如此强烈的想像力,以致一切都让他们过度震惊”(XIV,3)。“德国人的法律……并不惩罚想像的罪恶,而是惩罚眼睛的罪恶。但如果一个日耳曼国家被搬到西班牙……人民的想像力被点燃,立法者的想像力也被激发;法律为了一群可能怀疑一切的人民而怀疑一切”(XIV,14)。

f——“好战的、勇敢的和活跃的人,直接影响女性化的、懒惰的、害羞的人”(XVII,3)。“依据人们在欧洲各地所作的计算,欧洲生的男孩比女孩多;相反,对亚洲和非洲的描述告诉我们那里生的女孩比男孩多”(XVI,3)。

g——“如果这种使东方人接受对世界的最强烈印象的官能弱点,再加上某种与身体懒惰自然而然地连在一起的精神懒惰,这种精神懒惰使得这个人无所事事、无所成就、无所用心,你们就会理解一个人一旦接受这些印象就再也无法改变。这就促使法律、习俗和风格……今天在东方如同千年前一样”(XIV,4)。

h——“在炎热的气候中,通常盛行专制制度,激情感受得快,但减弱得也快”(V,15)。“在炎热的气候中,女人在八、九或十岁就发育成熟了,因此童年与婚姻几乎总是密不可分的。她们20岁就老了:因此理性从来不与美丽一道出现在她们身上。美丽需要制约时,理性拒绝了制约;理性能得到制约时,美丽已经不在。女人必然处在依附之中,因为理性在她们年老时无法向

她们提供一种美丽在她们年轻时不曾为她们提供的制约”(XVI,2)。“有这样的气候,在这气候中,人体有如此大的力量,精神几乎无能为力。让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在一起:诱惑将成为堕落,成为必然的进攻,没有丝毫的反抗。在这些国家中,需要锁扣,而不是教训”(XVI,8)。“我们曾经说过炎热让人精疲力竭,丧失勇气;而在寒冷的气候中有某种身体和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能够从事漫长的、艰苦的、伟大的和勇敢的活动……炎热气候下的人们的懒惰几乎总是使他们受到奴役,而寒冷气候下的人们的勇气使他们保持自由”(XVII,2)。

尽管神话体系总是完全体现在作者及其读者(他们把女性特征理解为被动)的头脑中,但这个体系从不原样呈现而且话语的线性逻辑只允许逐个地进而连续地实现构成这个体系的关系。给“科学”神话下定义的合理化意愿通过一种“合理”的关系掩盖神话关系,并不受到任何禁止,“合理”关系既加强又压抑了神话关系。比如,被动和女性特征之间或主动与男子气概之间的神话关系从不原样出现,而是在一种人口统计学的“法则”的伪装下建立,将男孩过剩归于北方的“好战”民族而将女孩过剩归于南方的“女人气”民族(XVI,4);同样,“烈酒”即强者的强劲饮料(和激情),这种饮料使得“好战”的民族“狂怒”而非如别处那样“愚蠢”,并且,“好战的”民族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一种“科学”的蒸腾作用理论才能建立起来(XXIV,10),而这种理论也用来为某些南方文明拒绝食用猪肉提供论据(XXIV,26);同样,将被动或官能享乐与一夫多妻制直接连在一起的关系可能建立在不容置疑的逻辑层次上:要么在生物学的伪装下,以南方女人早熟为主题(XVI),要么在人口统计学的伪装下,以已经出现的女人过剩为主题。科学话语像一个委婉措辞的网络那样发挥作用,这个网络允许社会冲动以一种社会认可

的甚或被赞同的和权威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因此，一上来就被宣告的神话真实，以在科学上被委婉化进而被掩盖的对立形式出现，这种对立发生在收缩纤维的冷空气和放松纤维的热空气之间，这神话真实在 50 页之后由于概要的逻辑允许和实施的制裁“放松”而昭然若揭：“不应该感到奇怪，炎热气候中的人的怯懦几乎总使他们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中的人的勇气总让他们保持自由”（XVII, 2）。纤维的松弛，风俗的松弛，生命动力和男性能量的松弛、怯懦：为了产生社会认可的神话，人们看到，只要玩弄词语、放纵词语的游戏、放纵言语的游戏就够了。如同怯懦同时具有轻松、放松、怠惰、软弱、胆怯的意义，大部分词语有许多的意义，这些意义相当不同而且独立，以致它们的对比产生一种惊人的效果，比如精神这个词；同时这些意义又相当类似，以致某种一致性的要求看来是合理的。作家的被培养的无意识引起的社会幻觉得到一种语言和文化的同谋和服从的保证，这种语言和文化是在同样的社会无意识过程中积累的产物。孟德斯鸠并不需要博学者们不断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博丹、夏尔丹、杜波斯神父、阿巴斯诺特、埃斯皮亚·德拉博尔德，以及所有“未知的来源”以创立他的地理环境“理论”的基本原则：¹¹他只要在自身挖掘，也就是说在一种社会无意识中挖掘就够了，这种社会无意识是他与他同时代的所有文化人共有的，¹²而且仍旧是这些人可能是对他施加的“影响”的根源。无论如何，文人传统，通过它赋予社会幻觉的许可或加强和它为社会幻觉的表达带来的权威和合法性，构成了学者神话的可能性、学者神话的形式，也就是学者神话拿来装饰的、有科学外表的言语，无疑还有学者神话存在本身的社会条件。但文人传统也构成了学者神

话接受的社会条件：人们很难理解为何在那么多评论者当中，没有人想到分析“科学”神话的特定逻辑，这个在地理环境理论中非常明显的逻辑，无疑是在整部《论法的精神》中形成的：¹³合法作品所要求的服从和逢迎与逻辑警觉性的降低互相结合从而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人们可以把自视为崇拜客体和科学主体的东西作为科学客体对待，一旦社会无意识得逞，逻辑警觉性就会降低。¹⁴

因此，作为一种公正的评价，我们可以将《论法的精神》的作者的名字归于一种非常特定的象征强制作用，这种象征强制作用是人们通过将科学的表象附加给社会幻觉的投射或偏见的前构造而产生的，这种科学的表象通过一种更完善或仅仅是更权威的科学的方法或手段的转移而获得。这种对于物理学或生物学并不陌生的作用，¹⁵在社会科学中找到了它的福地，在这里人们不再重视通过对生物学尤其是物理学的机械模仿得到的“理论”。¹⁶

注 释

第 I 部分 语言交换的经济

- 1 我已在别处试图分析结构主义认识论的无意识性,亦即索绪尔在建构语言学的特定客体时所非常清楚地予以表达,但被后来的索绪尔模型的运用者所忘记或压抑了的预先假定[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的逻辑》(*The Logic of Practice*),尼斯(R. Nice)翻译(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第30页及其后]。
- 2 见莫林(G. Mounin),《诗的交流,写在〈你们有二轮马车吗?〉之前》(*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précédé de Avez-vous lu Char?*)(Paris: Gallimard, 1969),第21—61页。
- 3 同时掌握一个词语的不同意义的能力(常常是以所谓的智力测验来测量的),更不必说实际操纵这些意义的能力(例如,像哲学家们所喜欢做的那样,通过恢复日常词语的原初意义来实现的这种操纵),是一种典型的学术能力的很好的衡量尺度;这种能力要求学者们把自身从情境中分离出来,将那种连接着词语和实际语境的实际关系予以消解,把词语限定在其所具有的一个意义上,以便就其本身且以其本身为目的来考虑它,也就是说,把这个词语看成所有可能发生的关系的中心,从而,也就把各种情境看成“关于可能性的众多个别实例”。如果说这种成功地,尤其是同时性地对不同语言变体加以操作的能力,无疑是属于那些其分配最不均衡的能力,那么这是因为,对不同语言变体的掌握——尤其是作为其前提的、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存在条

件下才能获得,而这种条件能够许可一种与语言的分离的、无涉的关系[参见布尔迪厄与帕斯隆(J. - C. Passeron)的《教育学报告与交流》(*Rapport Pédagogique et communication*)(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1965)中根据语言音域的广度(*breadth of linguistic register*),亦即不同语言变体被掌握的程度的社会起源而对变异进行的分析]。

- 4 旺德里埃斯,《语言:历史语言学导论》(*Le langage. Introduction linguistique à l'Histoire*)(Paris: Albin Michel, 1950),第208页。
- 5 关于生产的,甚至是关于支配的强制规则迫使不同阶级之间产生最低程度的交流;从而使得那些最被剥夺的阶级(比如移民)只能获得一种决定性的最低程度的语言能力。

1. 合法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

- 1 孔德,《实证政治体系》,4卷本(*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 4 vols*)(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75—1877),第2卷,第213页。
- 2 N. 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5),第3页(着重号为我所加)。亦见N. 乔姆斯基与M. 哈利(M. Halle),《英语的声音模式》(*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8),第3页。
- 3 乔姆斯基本人明确作出了这种认定,至少就其关于能力是“关于语法的知识”[乔姆斯基与哈利(Halle),《英语的声音模式》(*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或者“被人们内化了的生成性语法”(generative grammar internalized by someone)[N. 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中的当代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London and the Hague: Mouton, 1964),第10页]的这一意义而言是如此的。
- 4 将相对的事物予以绝对化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印刻在乔姆斯基的能力理论对其避而不谈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宣称,其关于“沟通能力”的纯理论——对沟通情境的实质论分析(essentialist analysis)——具有诸种意图,它们与生产力的压抑程度和发展程度有关,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摆脱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J. 哈贝马斯,“走向沟通能力的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见H. P. 德雷泽

(H. P. Dreyzel),《新近的社会学》(*Recent Sociology*),第2集(New York: Macmillan, 1970),第114—148页]。即便“理想化”(idealization)(清楚地见于诸如“对言说—建构命题的掌握”或“由纯主体性所决定的言说情境”这类观念的使用中)是纯方法论的和暂时性的,且仅是旨在使对“纯粹的主体间性的曲解”的研究成为“可能的”,它仍然具有实践效应,即从各种沟通关系中去掉那些以一种变形的形式遍布于它们内部的权力关系。这一点被人们对一些概念的不加批评的借用所证实,比如“话语施事的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这种借用倾向于把词语的力量置于词语本身之中,而不是置于其应用的制度性条件之中。

- 5 F.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由巴斯金(W. Baskin)翻译(Glasgow: Collins, 1974),第199—203页。
- 6 L. 布龙菲尔德,《语言》(*Language*)(London: George Allen, 1958),第29页。正如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忘记了一种语言并不是被其自身的力量所推行,而是从一种关于制度的政治行为中获得其地理学限度(这是一种被误识为如此,并且被语言科学误识为如此的任意而专断的行为)那样,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共同体”理论忽略了“理解间性”(intercomprehension)的政治性与制度性的条件。
- 7 “formal”这一形容词可被用来描述一种审慎、润饰、紧张的语言,而与那种随意、放松的语言相对;它或者被用来描述一个古板、拘谨、形式主义的人。它也能表示与法文中“officiel”这一形容词相同的意思(比如在一个正式的宴会中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可以被用来表示经由正式同意、完全依照规则并以理所应当的和恰当的秩序来行事的意思。
- 8 只有通过对有关民族语言的表征进行置换,一个人才会感到地区性方言的存在,而这些方言本身又分为各种亚支方言(sub-dialects)——这是一种被辩证法研究所直截了当地予以否定了的观点。参见F. 布鲁诺,《从起源时代到我们当代的法兰西语言史》(*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Paris: Colin, 1968),第77—78页。并非偶然的是,民族主义几乎总是屈从于这种错觉,因为,一旦取得了胜利,它就会不可避免地再生产那种它曾对其后果进行谴责的统一过程。
- 9 这一点可以从法国革命期间对法令的翻译所引出的各种困难中看到。因

为实际语言缺乏政治词汇,并且被分成各个“方言”,于是有必要炼造出一种中介性的语言。当今奥克语(*langues d'oc*)的鼓吹者们所做的正是同样的事情,他们把表音法(*orthography*,指用文字或印刷符号标出某一语言的语音。——译者)予以定型和标准化,从而生产出一种普通言说者所不易理解的语言。

- 10 乔治斯·戴维,《社会学元素》(*Éléments de sociologie*)(Paris: Vrin, 1950),第233页。
- 11 洪堡特的语言理论(Humboldtian theory of language)产生于对巴斯克人[the Basque people, 居住于比利牛斯(Pyrenees)山山区西部,使用印欧语系及其他系统的语言,个性活泼,以喜爱冒险而知名,母权倾向甚强,有独特的文化、风俗。——译者]的语言“本真性”(the linguistic 'authenticity')的赞美以及对语言-民族这一对应关系的发扬,它与洪堡特在创建柏林大学时所展开的关于大学所负有的推行统一之使命的观念有着一种可被理解的关系。
- 12 教育制度将其证书的颁发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通过教育制度,语法被赋予了真实的法律效力。如果语法和拼写有时成为政府法令的对象[例如,1990年关于从“有”(avoir)这一动词的过去分词的一致性问题上颁布的法规],这是因为,语法和拼写使得考核与资格认证成为可能,而通过考核与资格认证,它们控制着通向工作就业和社会地位的途径。
- 13 这方面,在法国,学校的数目和登记注册的学生的数目以及与此相关的教职的数量及其在空间散布的范围在1816年后稳定上升——这在官方引入义务教育相当长时间以前就发生了。
- 14 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在19世纪不同地区的语言的差距(linguistic remoteness)同其对20世纪各级文职公务机关的影响之间所存在的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关系。根据维克托·迪尔叶(Victor Duruy)在1864年所作的调查,这些地区中不能讲法语的成年人的比率以及7—13岁的不能读或讲法语者的比率最高,但这些地区在20世纪前半期所提供的文职公务人员的比率也特别高。众所周知,这种现象本身即与接受中学教育的较高比率有关。

- 15 这一点意味着,如同那些拥护“语言保护”的干涉主义政策的人们似乎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语言习俗”(linguistic customs)不可能被法令所改变。
- 16 因此,那种在面对来自被支配阶级的言说者时,调查所记录的“解体”了的语言正是这种审核关系的产物。
- 17 相反,当一种先前被支配的语言获得了官方语言的地位时,它会经历一种革命,这种革命复杂地改变了语言的使用者与它的关系。所谓的语言冲突因此并非就是如那些仅仅考虑(狭义的)经济赌注的人们所假设的那么不现实和非理性(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直接受自身利益的驱动)。象征性权力关系和置于相互竞争的语言之上的价值等级制度的颠覆,具有实际的经济和政治效应,例如保留给合法能力的拥有者可挪用的位置和经济优势,或者与名望的拥有相伴随的象征性利润,或者至少未具烙印的社会认同。
- 18 只有可选择的(optional)能力才能够产生出区分(distinction)的效果。如皮埃尔·昂克勒韦(Pierre Encrevé)所展示的,在必须连读的情况中——那些经常被所有言说者(包括较低阶级)所奉行的——没有操纵的空间。当语言的结构限制被延缓时,如在可以选择是否连读的情况下,这时候回旋余地与相伴随的区分效应就一起重新出现了。
- 19 很显然,没有理由在(公开的或者隐蔽的)先天论者——对他们来说,讲话能力的获得以先天倾向的存在为先决条件——与强调学习过程的经验主义者之间的辩论中加入哪一方。只要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自然固有的,并且只要获得的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成熟过程,就存在着能够作为社会差别的标志而起作用的语言区别。
- 20 对合法语言能力的获得条件具有均等的获得机会的假说仅仅是一种心理实验(mental experiment),是为了阐明不平等的结构性影响而设计的。
- 21 在一些语言产品明显处于受评价影响的情形中,例如在考试和工作面试中,会唤起发生在每一次语言交换中的评价。无数的调研显示,语言特征对于学业成功、就业机会、职业成就、医生的态度(他们对小资产阶级病人及其言谈更为关注,例如给他们开不大消极的处方)有着极大的影响,并且在接受者愿意与发出者合作、协助他或者对他所提供

- 信息的可靠性给予信任的倾向等方面的影响更为普遍。
- 22 不需列举、引用无数作家和语法学家的言词——这些引语必须与对场域（在每一事例中，它们都是在这样的场域中产生的）状况的彻底的历史学分析相结合，才会呈现其全部的意义——我将给很想对这一永久斗争形成一个确凿看法的读者推荐 B. 凯默达 (B. Quemada) 的《现代法语词典，1539—1863》(*Les dictionnaires du français moderne, 1539—1863*) (Paris: Didier, 1968), 第 193 页, 第 204 页, 第 207 页, 第 210 页, 第 216 页, 第 226 页, 第 228 页, 第 229 页, 第 230 页和注释 1, 231, 233, 237, 239, 241, 242, 以及布吕诺 (Brunot) 的《法语语言的历史》(*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第 11—13 页以及书中其他部分。豪根 (Haugen) 关于控制挪威语的语言学计划的斗争的记述描述了一种类似的、作家和语法学家之间的角色与策略的分歧: 见 E. 豪根, 《语言冲突和语言计划: 挪威语的例子》(*Language Conflict and Language Planning: The Case of Norwegi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尤其在第 296 页及其后。
- 23 我们可以对照“自身的风格”(style-in-itself)——一种无意识的或者甚至是被迫的“选择”的客观产物(就像对一件家具或者衣服的客观审美“选择”一样, 是由经济必需所强加的)——与“为了自身的风格”(style-for-itself), 后者是一种甚至当感觉是“自由”和“纯”的时候, 也同样是由象征性物资的经济特殊限制所决定的选择的产物, 例如明白地或者含蓄地谈到那些没有选择的人们的被迫选择, 奢侈本身除了与必需相对之外是没有意义的。
- 24 由于使用诸如“机构”(apparatus)或“意识形态”[其幼稚的目的论在概念“意识形态国家机构(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中达到了更高的程度]等概念而导致的失误,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忽视了文化物资生产制度的经济。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 为了生产语言校正的服务和工具(诸如手册、语法、词典、通信与公开演讲的指南、儿童书报等等)而产生的文化产业, 以及数以千计的公共和私人部门的能动者——他们最重要的物质和象征性利益都投入到了竞争性的斗争之中, 而这种斗争导致他们偶然地, 并且经常是不知情地促进了合法语言的维护和典范

化。

- 25 合法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条件要对其另一个属性负责：相对于其实践功能的自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与“情境”的已被中性化和正在中性化的关系，这里的“情境”是话语或谈话者的目标，当庄严性要求语言的有节制的、紧张的用法时，所有场合都内在地要求这一点。“书面语”的口头使用，仅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实现，在这些情况下它客观地刻印于情境之中，刻印于自由、流利以及最首要地，休闲的形式之中，以及刻印在实践要求的中性化的意义中；并且它以这样一种倾向为先决条件，这种倾向是在练习中和通过练习而获得的，在这种练习当中，语言被操纵，除了为教学的目的而任意强加的必要性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必要性。
- 26 因此这并非偶然，如特鲁别茨柯依(Trubetzkoy)所注意到的，“随意的清晰发音”(casual articulation)是标志着区分的最为常见的通用方式之一：参见特鲁别茨柯依，《音位学的规则》(*Principes de Phonologie*) (Paris: Klincksieck, 1957), 第22页。事实上如皮埃尔·安克里维(Pierre Encrevé)对我指出的，紧张中的放松策略仅仅是意外地扩展到了发音的水平；假装被否定了的区分仍然可以在发音中辨别出来。并且诸如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等撰稿人，当然能够在话语的不同方面之间的水平上从对类似的差异的系统性使用中获得文学效果。

2. 价格形成与利润预期

- 1 贝阿恩语诗人西明·帕莱(Simin Palay)(其全部作品——除了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受法语文学的支配)诞辰一百周年的官方纪念庆典创造了一个完全闻所未闻的语言学现象：不仅被委任的贝阿恩的护卫者们，而且管理权威们自己，都违反了在所有官方场合中，尤其是在官员口中把礼仪上必要的法语作为正统语言的不成文的规定。因此有下述的记者观察(这无疑是普遍接受的印象的忠实反映)：“然而令人瞩目的讲话，是由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的长官蒙弗雷先生所做的，他以流利的贝阿恩方言对听众发表了讲话……拉巴雷尔先生(波市的市长)用一流的贝阿恩语回答校长拉马祖-柏特伯德小姐。听众被如此考虑周到

- 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并报以长时间的掌声。”(比利牛斯共和报,1974年9月9日)。
- 2 这在其用法保留在私人场合——主要是家庭生活——中的地区语言的例子中非常清楚,并且在任何具有社会同源的言说者之间(在农民之间)的交换场合中也非常清楚。
 - 3 在语言的范围内,惟一真正的反抗合法性的确证就是俚语;但这是一种“老板们的”语言。
 - 4 见本书后文:宏大话语:“关于对《读〈资本论〉》的几个评注”的若干社会学思考。
 - 5 参照科尔尼利耶(B. de Cornulier),“概念的自动解释(La notion d'auto-interprétation)”,见于《应用语言学研究》(*Études de linguistique appliquée*),第19期(1975),第52—82页。
 - 6 参见雷卡纳蒂(F. Recanati),《施事话语》(*Les énoncés performatifs*)(Paris: Minuit, 1982),第192页。
 - 7 同上,第195页。
 - 8 邦弗尼斯特(E. Benveniste),《普通语言学之中的问题》(*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由米克(M. Meek)翻译(Coral Gables, Fl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第236页。
 - 9 在所有语言学家当中,阿兰·贝伦多纳(Alain Berrendonner)无疑是最懂得施事性与社会性因素,或者他所谓的“制度”之间的关联的,即“一种在审查威胁之下的规范权力的存在,能够确保个人共同服从于一定的实践”;“用说来代替做毕竟只有在存在着某种能够使人为的言说(utterance-ersatz)有效的附加保证的条件下才是切实有效的”[贝伦多纳,《实用主义语用学的元素》(*Éléments de pragmatique linguistique*)(Paris: Minuit, 1981),第95页]。
 - 10 迪克罗(O. Ducrot),“话语施事与施事性(Illocutoire et performatif)”,发表于《语言学与符号学》(*Linguistique et sémiologie*),第4期(1977),第17—54页。
 - 11 侮辱、祝福和咒骂都是巫术式的命名行为,并且,严格地说,意味着将要自我实现的预言。鉴于完成一项能引进新的事实的事实的巫术般的制度行

为总是包含着或多或少的由社会许可的要求,施事话语用当前的词语创造了一种将来的影响。

- 12 “权威行为最初就是,而且总是由那些拥有说出它们的权力的人所做的言说”(邦弗尼斯特,《普通语言学之中的问题》,第236页)。
- 13 “这两个词语——*ministerium*(教士身份)和 *mysterium*(神秘性)——自从基督教初期开始,实际上就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并且在中世纪时经常被混淆”[坎特罗维奇(E. H. Kantorowicz)“状态的秘密:一个绝对主义的概念与其中世纪晚期的起源(Mysteries of state: an absolutist concept and its late mediaeval origins)”,发表于《哈佛神学评论》(*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48/1(1955),第65—91页]。
- 14 如果我们看到,按照施拉姆(Percy Ernst Schramm)的说法,正如中世纪国王的王冠既指示其自身(王冠),又指示着构成皇家尊严[例如在“crown property(王室财产)”一词当中]的一系列权力一样,语言能力也是指示作为一系列权利的——从有权发表讲话和与之相应的技术能力开始——由社会所认可的身份的象征性属性,那么能力的两种含义也就合二为一了。
- 15 这意味着把一种真正的含义赋予了“可接受性”概念,语言学家们有时候引入这一词语用以避免“合乎语法性”(grammaticality)这一概念的抽象,而这并没有导出任何结果。
- 16 这表明对学术话语(例如文学课本)的完全理解以下面所述作为先决条件:首先,关于生产者的社会能力(不仅仅是语言能力)的社会生产条件的知识,这些生产者在其每一次的生产之中,都运用了他们全部的属性(那些界定了他们在社会结构当中和在专门生产场域结构当中的位置的属性);其次,关于控制着这种能力、控制着这种相关市场特定法则的行使的条件的知识,这里的相关市场,在这种特定的情形中,与生产本身的场域相一致(学术生产的根本特征就在于这一事实,即其客户正是其他的生产者,也就是他的竞争者)。
- 17 考虑到表征与塑形的工作是为了确定表达意向之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抓住在其原初状态中的某种内容——这种内容历经多种形式仍将保持不变——的想法,就是毫无意义的。

- 18 我们可以由此把所有种类的双重含义都归纳进委婉语当中,尤其是在宗教话语中常见的那些双重含义——它们使人通过以一种避免命名的形式为无法命名者命名来规避审查制度(见“审查与塑形”,本书第Ⅲ部分),而且所有的讽刺形式,这些讽刺形式由于在陈述的过程中否定了这一陈述,也产生了双重的含义——也为花招留下了两倍的余地——由此使人能够逃避场域的裁决。(关于讽刺的防御性角色,参见贝伦多纳,《语用主义语言学的元素》,尤其见第238—239页。)
- 19 巴利(C. Bally),《语言与生活》(*Le langage et la vie*)(Geneva: Droz, 1965),第21页。
- 20 这种预期,被可见的展示——例如言说者的态度、他的表达(是关心的还是无所谓的,是傲慢的还是迷人的)以及声音、态度中所流露出来的鼓励或者不满——所引导。社会心理学的各种实验表明,讲话的速度、言语的数量、词汇和句法的复杂程度等等,都随着操作实验者的态度而有所不同,即随着其所实施的有选择的强化策略而有所不同。
- 21 对语言的学习发生在对具有非常广泛角色的人们的逐步熟悉的过程中;对于这种熟悉过程来说,语言维度仅仅是一个方面,而且从来就不是如此孤立的。这或许也就是赋予了特定词语以实践性的唤起力量的那种东西,这些词语与整个身体姿态和某种情感气氛是相互关联的,它复兴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像,一个完整的世界;无疑它还产生了对“母语”的情感依恋,其表达、短语和词语的转折看似暗含着一种“弦外之音”。
- 22 社会心理学的各种实验显示出,小资产阶级比更低阶级的成员更加善于依照发音来判别社会阶级。
- 23 我们需要把这些分析更深入一步:一方面,通过对小资产阶级特点(与理解语言倾向有关的)的更为完全和彻底地检视,就像他们的沉浮轨迹通过为他们提供不同的社会环境而使它们倾向于——尤其是当他们作为各阶级之间的中介物而运作时——一种准社会学形式的意识那样;另一方面,通过次级变量——例如按照他们在中产阶级所占据的空间中的位置以及先前的轨迹,来研究这些特点的变化[参见P. 布尔迪厄,《区分: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 Judgement of Taste*), 由尼斯(R. Nice)翻译(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第三部分, 第6章]。同样, 我们也需要在支配性阶级的内部, 辨别他们与语言的不同关系。
- 24 与拉考夫的论点相反, 缓和(attenuation)的纯语法形式, 可以由整个一系列作为象征性仪式的因素发挥作用的替代品来代替。任何一个进行过面试的人都知道, 必须预先为“难题”设定基调, 并且最保险的“打发它”的方法不是用通词和缓和的词语来包围它, 这反而会更加吸引对它的注意; 而是要创造一种共谋的氛围, 并且通过开玩笑、微笑和手势, 简而言之, 就是通过创造一个象征性整体——在其中纯语言形式仅仅是一种元素——来给予面试一种具有欣快和委婉效果的总基调。
- 25 G. 拉考夫, “与荷曼·帕雷特的会面”(Interview with Herman Parret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油印品, 1973年10月, 第38页; W. 拉波夫, 《内城中的语言》(*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3), 第219页。
- 26 几乎没有必要再提及那些尤其是对妇女实施的——这是关于市场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或者有妇女在场时严格实施的、涉及性的事物, 以及更为普遍的, 与身体部位有关的事物的初始审查制度了。
- 27 从支配性个人的角度来看, 通过符号的简单颠倒, 同样的对立在难与“易”、“校正”与疏忽、文化与自然之间的逻辑中将很是明显。
- 28 能够由直觉感觉到的、在“发音风格”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它使“口音”成为了预见社会地位的如此有力的方法——使少数几个对之作了一些努力的分析家——例如 P. 基罗(Guiraud)——作出了毫不含糊的价值判断: “这种地毯拖鞋式的‘口音’”“松散绵软”; “这种‘蠢人’的口音属于那种从嘴角、在舌尖与唇缝之间吐出词来的家伙的口音”; “这种模糊柔软的坚持, 在其最低级的形式中, 是绵软无力和令人作呕的”[P. 基罗, 《通俗法语》(*Le français populaire*)(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第111—116页]。就像所有的惯习和看似自然的历史性表现一样, 发音, 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与语音的关系, 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是一个人真实本质的流露: 阶级种族主义者, 在各种混合的特征当中为将社会区别自然化的倾向找到了超级正当的理由。

- 29 因此这并非偶然,在大革命时期想像出来、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被充分确立起来的学校制度——例如像法国的共和国学校(*École républicaine*)那样的学校制度——试图彻底塑造较低阶级的惯习,这种学校系统是围绕着对各种特定关系的灌输而组织起来的,即与语言(废除地区性语言,等等)的关系、与身体(卫生准则,消费-节制,等等)的关系和时间(计算的-经济的-储蓄,等等)的关系。

第 II 部分 言语与象征性权力

- 1 关于辱骂的语言学讨论,见鲁伊特(N. Ruwet),《辱骂的语法以及其他研究》(*Grammaire des insultes et autres études*)(Paris:Seuil,1982);米尔纳(J. - C. Milner),《辩论的语言学》(*Arguments linguistiques*)(Paris:Mame,1973)。

1. 权威化的语言

- 1 见E.邦弗尼斯特,《印欧语言与社会》(*Indo-European Language and Society*),由伊丽莎白·帕尔默(Elizabeth Palmer)翻译(London:Faber and Faber,1973),第323—326页。
- 2 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Oxford:Clarendon Press,1962),第4页。
- 3 这种巫术行为通过词语而扩展作用于自然,而这些词语是在特定条件下作用于人的身上的。它在社会行为场域中的等价物,就是试图通过词语而超越代理权威的限制的企图(在其教区范围以外的未开化地区宣讲)。
- 4 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第26页。
- 5 勒隆(R. P. Lelong),《关于庄严圣餐的黑色卷宗》(*Le dossier noir de la communion solennelle*)(Paris:Mame,1972),第183页。
- 6 具体的宗教仪式仅仅是社会仪式的一个特例,这些社会仪式的魔力并非存在于与之相伴的话语和确信之中(在这一例子中,是宗教表征与信仰),而是存在于仪式本身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的体系之中。正是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使仪式成为可能的,并且使它具有了社会操纵性(除了其他

事物,它还存在于对它所暗示的信仰的各种表征上)。

2. 制度的仪式

- 1 见 P. 布尔迪厄,“学校考试与社会的认可”(Épreuve scolaire et consécration sociale),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文录》(*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第 39 期(1981 年 9 月),第 3—70 页。

3. 认同与表征

- 1 要用足够的术语来将象征性经济概念化的困难立刻就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来,即特别是,当努力避免文化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而这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导观念),并且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对“种族”特征的操纵策略上时,帕特森(Patterson)把在他看来是这些策略之源泉的利益简化成了严格的经济利益,因此就忽略了所有在分类斗争中遵从象征性利润最大化趋势的东西。[见 O. 帕特森“种族忠诚中的语境与选择:理论框架与加勒比个案研究”(Context and choice in ethnic allegianc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aribbean case study”,见拉格泽(N. Glazer)和莫尼汉(D. P. Moynihan)(编辑)的《族群:理论和经验》(*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第 305—349 页。]
- 2 E. 蒂旺尼斯特,《印欧语言与社会》,帕尔默(E. Palmer)翻译(London: Faber, 1973),第 311—312 页(还有关于作为预测力的“*krainein*”的论述,第 332 页)。
- 3 同上,第 422—423 页。
- 4 文化差异或许是对累积的变异分化的历史性辩证的产物。如保罗·布瓦(Paul Bois)展示给法国西部农民们的——这些农民们的政治选择挑战了选举的地理布局——构成地区的并非是空间,而是时间与历史(保罗·布瓦,《自革命时期以来西部农民的经济结构及其社会政治选择》(*Paysans de l'ouest. Des structur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aux options politiques depuis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Paris and Hague: Mouton, 1960)。同样的事例可以举关于说柏柏尔语(Berber,分布于北非,主要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

亚,其次是尼日尔、马里等国,主要语言有什卢赫语、塔马齐格特语、瑞菲安语和图阿列格语,彼此极为相似。属于阿非罗-亚细亚语系。——译者)“地区”的例子,在不同的历史进化的一端,它与讲说阿拉伯语的“地区”非常“不同”。从殖民者的角度来说,这导致了对其非常不同的对待(例如教育方面的对待),并且因此就必然强化了作为其前提而发挥作用的区别,而且生产出新的区别来(例如与向法国移民有关的那些区别),等等。甚至连地理学家非常熟悉的“地形”或“乡土”实际上都是继承性的,换句话说,是由社会决定下来的产物。[见里希尔(C. Reboul),“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的社会决定性因素(Déterminants sociaux de la fertilité des sols)”,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文录》(*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第17—18期(1977年11月),第85—112页。按照同样的逻辑,与“地形”概念的幼稚的“自然主义”的用法相反,我们必须分析社会因素对某一地区变为荒漠这一进程的影响。

- 5 形容词“奥克坦的”(Occitan),以及更进一步,名词“奥克坦语区”(Occitanie)这两个新近的科学的词汇[由《将奥克语拉丁化,使之成为奥克坦语》(*Latinizing the langue d'oc into lingua occitana*)所造],是为了指明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仅仅存在于理论中的科学现实而设计的。
- 6 事实上,这一语言自身就是一种社会造物,是以对区别的决然漠视为代价而发明出来的,这里的区别在“地区”的层次上再生产了受到地区主义反对的、对独特规则的任意强加,而这种强加,仅需要以类似于对法语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语言的强制性普遍使用的系统灌输为条件,就可能成为语言实践的真实源泉。
- 7 共和国学校系统的创立者除了采用其他方法,还明确地采取了通过对“国家”语言的强加而进行灌输的目标,而“国家的”语言是关于看法与评价的共同的分类系统,它能够确立一种对社会世界的统一看法。
- 8 在地区主义运动与女权主义(以及生态主义)运动之间处处都可以证实的关联来源于这一事实,即为了反对象征性支配的形式,他们预设了种族的性情倾向和文化能力(这在所采取的策略中是清晰可见的),而这在知识界和新小资产阶级中常会碰到(见:布尔迪厄,《区分: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由奈斯(R. Nice)翻译,第265—266、357—363、365—369页)。

- 9 除了对如迪梅齐(Dumézil)所描述的、要求审查员(*censor*)具有巫术般的生产力(*auctoritas*)的众多强有力的断言之外,还能如何理解作为社会学家抱负之重要部分的要求呢:即对社会阶级之宗教法规条文的义不容辞地引用(与统计学的调查数字相比是仪式性的),或者在抱负的较高层次上以一种经典气较少的风格,宣布“新阶级”和“新斗争”到来的预言(或者“旧阶级”和“旧”斗争不可避免的衰退)——这两个在所谓的社会学生产中占有较重要位置的流派?
- 10 科学家们对“主观”标准感觉到的本能厌恶的原因,值得给予较长的分析:这里有幼稚的实在论,它导致了人们对所有无法指出或无法触摸的东西的忽视;这里有经济主义,它导致了人们只能认识那些明显属于物质存在条件之整体组成部分的东西,却认识不到社会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这里有与“中性价值论”的表面现象紧密相关的利益,它在不只一个例子中构成了“科学家”与“斗士”之间的所有区别,而且它还禁止把与恰当性相背离的问题和观念引入“科学的”话语之中;最后但绝非最次要的,还有科学的荣誉观点(*point of honour*),它导致观察者——并且越是在他们不确定自己的科学与地位的时候这一点或许也就越是真实——增加与常识意义的表征相脱离的那些标志,这就注定了他们会滑向简化的客观主义,而这种简化的客观主义是完全不可能在对现实的科学表征中把普通表征的现实包括在内的。
- 11 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或地区问题的研究或许从一开始就被国际乌托邦主义(由幼稚的进化论所支持的)和经济主义的联合影响所阻碍了,更不必说当时的策略性成见的影响了,这种策略性的成见常常预先决定了以实践为定位的“科学”的判断(并且既缺乏关于科学的真正的科学,又缺乏关于实践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在关于阶级稳定性凌驾于“族群”或国家稳定性之上的典型的施事性论题——这种论题经常是与现实相抵触的——中特别清楚地看到。但是未能使这一问题历史化(如空间关系或者社会与家族关系的首要地位一样,这一问题在同等程度上是在历史中被提出并且回答的),理论主义者一直坚持的关于指定“可行性的国家”或者创造关于国家认同的科学有效的标准的主张[见霍普特(G. Haupt)、洛依

(M. Lowy)和威尔(C. Weill)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的问题》(*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nationale*)(Paris: Maspero, 1974)],看来直接依赖于意图的程度,即帝国的意图在何等程度上控制和指引服务朝着皇家科学的前沿和极限而定位;斯大林是关于国家的最教条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定义”的作者,这并非巧合。

4. 描述与规定

- 1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保守者,从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到贝当(Pétain),总是谴责那些被他们界定为“派系和党派斗争的‘政治’行为”的原因[见马塞尔(M. Marcel),“清点法兰西的政治虚无(*Inventaire des apolitismes en France*)”,法兰西政治科学学会(*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非政治化,是神话还是现实?》(*La dépolitisation, mythe ou réalité?*)(Paris: Armand Colin, 1962),第49—51页]。
- 2 经常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手稿中的、在社会学的科学主义与自发的唯意志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无疑是由于这一事实造成的,即他们或者强调阶级是条件或者强调阶级是意志,而这取决于他们在文化生产劳动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同时还取决于社会阶级感觉到的其自身所处的状态。
- 3 这意味着历史(尤其是思想分类的历史)建构了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政治思想能够逐渐发觉其自身。
- 4 G. 米尔达(Myrdal),《经济理论发展之中的政治因素》(*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4),第10—21页。

第 III 部分 对话语的分析

- 1 在这种逻辑中,人们本来可以在这里重新采用《情感教育》的例子,在《情感教育》中,塑形作用(*mise en forme*)适合于一种形式,即统治阶级的结构(或福楼拜在这种结构中不可能占有的位置),这种结构在一种按照

文学场域的法则重新定义的形式下被重新创造出来。[参见布尔迪厄，“艺术家生活的发明”(《L'invention de la vie d'artiste》)，《社会科学研究学报》(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975年3月2日，第67—94页。]或者，重新采用对《判断力批判》的分析，这种分析说明了不容置疑的话语的逻辑性如何掩盖了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的被压抑的而且客观上合乎逻辑的话语的支离破碎(参见布尔迪厄，《区分：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1981年，第565—585页)。

1. 审查与塑形

- 1 只有通过把弗洛伊德模型看作一种更为一般的模型的特例——这种一般的模型把任何表达都看成表达旨趣与结构的必然性(作为一种审查制度而运作的某个场域的结构)之间相交易的产物——我们才能把精神分析的概念回复到政治的范围之中，也就是它们通常得以形成的地方。在家庭环境——作为特殊种类权力关系的场域，其结构随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中出现的社会压抑，在其形式上非常具体(一种心照不宣的命令和建议)，并且适用于某种非常具体的旨趣：性驱动。但是弗洛伊德学派对梦和所有“隐私的”意识形态的句法分析，确实为理解委婉语和塑形的运作提供了必要的工具，而这种委婉语和塑形是在每一次生理的或者社会的驱动与社会审查制度达成妥协时都会出现的。
- 2 当然，没有什么比例如“哲学家”的身份，还有标志和徽章——学术头衔、出版社或者仅仅是他的姓名——所能赋予其作者的东西能对这种认同作出更大贡献的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影响，我们只需想像一下如果关于水力发电厂和古老木桥的书页[见海德格尔，“技术之追问(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见于《基本著作》(Basic Writings)，由克雷尔(D. F. Krell)编辑(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第297页]——这些书页曾经使得其作者被他的一位评论者抬举为“生态斗争的首要理论家”[参见舍雷尔(R. Schérer)所著的《海德格尔》(Heidegger)(Paris: Seheers, 1973)，第5页]——带有一位生态运动领导人或者环境部长或者一群左翼学生标语的印迹，我们将如何解读它？[更不必说以下

这一点了,即除非在呈现中伴随着某些改变,否则这种不同的“属性”是不会成为真正可能的。]

- 3 “本质上任何一个系统都只知道自己的最初表达,并且不能够讨论任何其他事情”[见尼科德(J. Nicod)所著的《几何学与归纳法》(*Geometry and Induction*),由贝尔(J. Bell)和伍德兹(M. Woods)翻译(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第11页]。巴歇拉尔注意到,在同一点上,科学语言用引号来暗示那些它从普通语言中或者从先前的科学语言中所引用来的词语的已经完全改变了的含义,并且它们的全部含义都是源自它所合成的理论关系系统[见G. 巴歇拉尔(Bachelard)所著《理性唯物主义》(*Le matérialisme, rationnel*)(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3),第216—217页]。
- 4 语言为社会学提出了特殊的问题,至少如果我们接受这一事实——即当它们必须按照结论的最广泛传播而定位——时是这样的,这也是对社会关系“去迷信化”和对社会世界“重新安排”的条件。对普通语言中的词汇的使用显然暗含了一种侵犯的危险,即对与感觉的丧失——通过科学关系系统中的合成而强加的——相关联的普通感觉(ordinary sense)的侵犯的危险。向旧词新义或者抽象符号的退却体现了——优于直接使用“引号”——与共识(common-sense)的脱离,但是它仍然冒着在关于科学的社会世界观的交流中产生一种脱离的危险。
- 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由麦克奎尔(J. Macquarrie)和罗宾逊(E. Robinson)翻译(Oxford: Blackwell, 1967),第348页。海德格尔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因为他的权威与日俱增,他感到他有足够的权威致力于这种独断专行的咬文嚼字,而这也是所有权威话语的最终方向。
- 6 这是自发的礼貌策略之一,它能够把命令中或者问题中那些攻击性的、傲慢的或者令人厌烦的内容真正地中性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它只需要把它们综合到一系列的象征性表达中去就可以了,这些象征性的表达是语词的或者非语词的,它们的目标是为了掩盖其元素自身所承担的原初含义。
- 7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63—164页。
- 8 写到这里,我不能准确记起那一段话了,就是在关于“克服形而上学”

(1939—1946)的文章中的那一段话,这篇文章是致力于作为“技术”王国的一个方面“文学干预主义”(literary dirigism)的:“人类对物质的需求与对趣味性书籍和诗歌的需求支撑着同一条规则,即为所要求的动员做准备的规则,单就其产品而言,诗人并不比装订工人的学徒——他通过例如把封面从仓库拿出来准备装订来帮助印刷者装订诗歌——更重要。”M.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The End of Philosophy*),由斯坦堡(J. Stambaugh)翻译(New York:Harper & Row,1973),第106页。

- 9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第38页。这种贵族主义的另一个征候就是那种描述方式,即所有描述先前哲学存在的形容词都是带有贬义色彩的:“不真实的”、“粗俗的”、“日常的”、“公众的”等等。
- 10 我们将不得不系统地记录下整个象征性的系统,因为哲学话语正是通过它来宣称自己作为支配性话语的擢升了的本质的。
- 11 这使人联想到,例如,关于生物学主义的发展(参见M.海德格尔,《尼采》(*Nietzsche*),第4卷,特别是第3卷中的“尼采对生物学主义的攻击”(Nietzsche's alleged biologism),见于《作为知识并且作为形而上学的对权力的欲望》(*The Will to Power as Knowledge and as Metaphysics*),由克雷尔(D.F.Krell)翻译(New York:Harper & Row,1987),第39—47页。
- 1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83—84页(着重号为我所加)。如果非德语的读者们没有受到已经预先被海德格尔所剥夺了的接受条件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察觉到被隐藏了的内涵——那么这种小心谨慎的策略或许会唤起他们的怀疑(鉴于翻译在实体和本体之间相脱离的名义下系统性地“压制”了它们,因此也就越发会是这样)。确实,除了对某一作品所提供的分析的拒绝——这种系统的委婉策略的产物——在这一例子中还有关于文化产品出口的最恶劣的影响之一,即所有社会起源或政治起源的微妙符号的消失,以及话语之社会重要性的标志及其作者之智力位置的标志(经常是很谨慎的)的消失,简而言之,所有极为细微的特征的消失——面对这些特征,本语言的读者显然是最脆弱的,但是一旦他配备了客体化的技巧,就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理解它们。由此我们想到,例如,阿多诺(Adorno)

在“存在主义的”术语背后发现的所有“管理性”内涵,这些术语如“相遇(encounter)”(*Begegnung*),或者像“关心(concern)”(*Anliegen*)和“使命(commission)”(*Auftrag*),以下这个尤其含糊不清的术语,即既是“管理要求的目标”又是“内心的愿望”,在里尔克的诗歌中早就已经是变异用法的目标了[阿多诺(T. W. Adorno),《关于本真的隐语》(*The Jargon of Authenticity*),由卡恩诺夫斯基(K. Tarnowski)和威尔(F. Will)翻译(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第77—88页]。

- 13 我们可以看到同一逻辑的实际应用,在如今其他教士式的不同形式的预言对“认识论的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的使用中:这种预言是一种过渡仪式,它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并且跨越了科学与意识之间永久设置的界限。
- 14 G. 巴歇拉尔,《理性唯物主义》(*Le matérialisme rationnel*),第59页。
- 15 M. 海德格尔,“阿那克西曼德的只言片语(The Anaximander Fragment)”,见于《早期希腊思想》(*Early Greek Thinking*),由克雷尔(D. F. Krell)和卡帕兹(A. Capuzzi)翻译(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4),第33页。
- 16 另一个特别对“本质思想(essential thought)”之无限威力的滑稽模仿的例子,可以参考1951年“筑·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的讲演文稿,在这里,在赞同本体论的“居”的内涵上,住房危机被“克服”了[M. 海德格尔,《基本著作》(*Basic Writings*),第339页]。
- 17 在所有“哲学家”与“世俗者”之间的遭遇中,尤其是在那些趋向于给予社会之合法的等级制度的肯定原则以认可的专家们当中——正是这种合法的等级制度授予了哲学家既是至高无上的(crowning)又是“弃儿(founding)”的最终诉求(last appeal)的地位——这种典型的“哲学”效应预先被注定了要倾向于无限繁殖。这种教授式的“妙计(coup)”显然在“职业”用法中使用得最好:哲学文章是深奥化(esoterization)过程的产物,它以论述过程为代价使自己变得深奥(exoteric),而其深奥的本性则使这种论述过程成为不可或缺的,并且其最好的效果就在于(虚拟的)具体化,这种具体化以一种与(虚拟的)脱离完全相反的过程又导致了原初含义的复活——原初含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委婉化了,正是这种委婉化使它们变得深奥——但这是与以保留仪式距离为

目的的“谨慎”(这只是一个例子)始终相伴的。

- 18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58页。
- 19 J.拉康(Lacan),《著作》(*Écrits*),由谢里登(A. Sheridan)翻译(London: Tavistock, 1977),第173页。
- 20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65页。有鉴于海德格尔派“哲学”风格是无限重复的小数量效应的总和,所以最好在某个单独段落——关于救助的分析——的上下文中来把握它们,这一段落是它们集中的地方,并且为了看清这些效应是如何在某一具体话语的实践中清楚明白地说出来的,就必须尝试着去重新研读它。
- 21 因此那些不可胜数的二元对立,它们是由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了证实指派给人类学的社会和指派给社会学的社会之间那些事实上存在的区分而设想的二元对立:“社群(community)”/“社会(society)”,“民间(folk)”/“都市(urban)”,“传统的(traditional)”/“现代的(modern)”,“暖社会(warm societies)”/“冷社会(cold societies)”,等等。它们构成了一系列平行对立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这种对立按照定义来说是漫无止境的,因为每一特殊的对立都抓住了在无阶级社会和划分了阶级的社会之间基本对立的某一部分,它基本上是多层面的和多声部的,以一种可以与按照一个场域和另一个场域之间以及同一个场域内部一种状态和另一种状态之间的变化相一致的,即近于无限的方式表达出来。
- 22 显然,语言为意识形态的游戏提供了除海德格尔所发掘出的那些东西之外的其他的可能性。这样,主导性的政治行话主要就是利用了由阶级用法或者专门用法的(与专家的场域相关的)多样性所暗示的潜在的模棱两可与误解。
- 23 我们可以通过指出它们仅仅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海德格尔自己公开宣称的——至少在他最近的著作中——海德格尔派语言用法的属性来驳斥这些分析。事实上,如我们以后将要详细证明的,这些伪造的坦白是晚期海德格尔投入其全部写作心血的自身的解释(*Selbsterpretation*)和自我主张(*Selbstbehauptung*)的著作的一个方面。
- 24 正是通过同样自相矛盾的策略——尽管它们摆出一副科学的面孔——

这种把科学的客观性等同于“道德中立”(即在那些它无论如何都否定其存在的社会阶级之间的中立)的“政治科学”,在伪科学的支持下,通过提供所有有助于生产虚假的关于社会世界意识的机制而促进了阶级斗争。

- 25 最终,没有什么词语是无法翻译的“特殊情形下的特殊用法(*hapax legomenon*)”;因此,例如“形而上学”这一词语,对海德格尔来说和对康德来说并不具有相同的含义,对于后期海德格尔和早期海德格尔来说其含义也是不同的。海德格尔直接把语言之哲学用法的基本属性推进到这一极点:哲学语言作为部分交叉的个人习语的总和只能由那些言说者——能够把每一个词语指定到具有他们意欲使它包含的含义系统当中的言说者——充分地使用(“按照康德学派的说法”)。
- 26 E. 云格尔(Jünger),《关于人与时代的文论》(*Essai sur l'homme et le temps*),第1卷:《反抗者的论著》(*Traité du Rebelle*)(*Der Waldgang*, 1951)(Moracco: Rocher, 1957),第47—48页。第66页有对海德格尔非常清楚而准确的介绍。
- 27 “本真的自己存在并不依栖于主体从常人那里解脱出来的那样一种例外情况;它是常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而常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论上的东西”[M.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第168页;还可以参照第223页]。
- 28 同上,第341—348页和第352—357页。
- 29 同上,第380—381页,第439—440页和第464—465页。
- 30 斯特恩(F. Stern),《文化失望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 31 拉科尔(W. Z. Laqueur),《年轻的德意志:德国青年运动的历史》(*Young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London: Routledge, 1962),第178—187页。
- 32 斯蒂芬·格奥尔格的风格被整整一代人所模仿,尤其是通过“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的影响,受他的贵族理想主义和他对“贫瘠的理性主义(*arid rationalism*)”的蔑视所诱导:“他的风格被模仿并且好几段引言都被非常频繁地重复引用——那些关于他这个曾经传播了火焰并且

将永远追随着火焰的人的言语；关于其授权不再来自王冠和盾牌的新的动员需要的言语；关于将要举着纳粹种族主义（*Völkisch*）的旗帜率领他的跟随者们通过暴风雨和可怖的预兆而达到未来帝国的元首的言语，诸如此类”（拉科尔，《文化失望的政治学》，第135页）。

- 33 为了证明他对“*Gestell*”一词的“技术”用法的合理性，海德格尔明确地引用了传统的，更为精确地说，是柏拉图的对词语 *eidos*（文化逻辑）的曲解：“按照一般的用法，词语‘*Gestell* [座架（*frame*）]’的意思是某种构造，例如书架，同时‘*Gestell*’还是‘*skeleton*’（骨架）的名字。而现在要求我们使用‘*Gestell* [装框（*enframing*）]’一词看起来就很怪异了，更不必说随意谈及那些被如此误用的成熟语言的词语了。还能有比这更奇怪的事吗？当然没有。然而，这种奇怪性却是一种古老的思想风俗”[海德格尔，《技术之追问》（*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第301页]。对于同样的指控，关于强加“随机的任意武断的”含义的指控，海德格尔在“给青年学生的一封信”中以对“学习思想技巧”的提倡作出了回答[海德格尔，“事物”（*The things*），见于《诗歌、语言、思想》（*Poetry, Language, Thought*）（*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75*），第186页]。
- 34 E. 施普兰格尔，“我同1933年掌权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冲突”（*Mein Konflikt m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gierung 1933*），《科学研究之大学期刊，艺术与文学》（*Universitas Zeit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Literatur*），第10期（1955），第457—473页，由F. 英格（*Ringer*）所引用，见于《德语官话的衰落：德国的学术共同体，1890—1933》（*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第439页。
- 35 J. 哈贝马斯（*Habermas*），“同与海德格尔相反的海德格尔一起思考”（*Penser avec Heidegger contre Heidegger*），《哲学—政治侧影》（*Profil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Paris: Gallimard, 1974*）第70页（着重号为我所加）。参照该文的英语修订版，“马丁·海德格尔：巨大的影响”（*Martin Heidegger: the great influence*），在J. 哈贝马斯的《哲学政治学文献》（*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当中，由劳伦斯（*F. F. Lawrence*）翻译（*London: Heinemann, 1983*），第53—60页。

- 36 同上,第100页。
- 37 海德格尔,“筑·居·思”,第339页。
- 38 M.阿尔布瓦斯,《社会阶级与形态学》(*Classes sociales et morphologie*) (Paris: Minuit, 1972),第178页。更不必说这样的话语在以前是任何自尊自重的哲学话语都要避免的:“理论的”与“经验主义的”之间的区分意义实际上是区分之哲学意义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
- 39 为了引出这种关于哲学解读的心照不宣的哲学,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哲学历史的哲学,以下这一点将是必要的,即必须要系统地记录所有的文本(通常可以在海德格尔和他的评介者中看到),这些文本表达了一种对得到纯粹的和纯粹正式的待遇的期望,一种要求得到内部解读(而这种内部解读是被文本自身所限制了)的期望;或者换一种说法,它们表达了这种“自生的”(self-engendered)著作所具有的不可消减性,即它们不能被消减为任何历史决定,即明显与哲学的,或者至多是数学或者物理科学之自主历史的内部决定相脱离。
- 40 引进正统语言的并非是社会学家:“关于人文主义的来信(Letter on Humanism)’的收信人把一种超常规的语言天赋与对海德格尔的深刻透析联系起来,二者共同使他在法国不容置疑地成为一个关于海德格尔的最权威的解释者”[理查逊(W. J. Richardson),《海德格尔:穿越现象学而到达思想》(*Heidegger: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 (The Hague: Nijhoff, 1963),第683页,是关于由比欧弗瑞特(J. Beaufret)所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或者:“这种[由阿尔伯特·车代安(Albert Dondeyne)所做的]同情性的研究配合了这一主题,即本体论的区别是海德格尔的全部努力所惟一涉及的观点。或许并非每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海德格尔遵奉者都会对作者关于海德格尔与“哲学永恒性之伟大传统”(La grande tradition de la philosophia perennis)之间关系的程式感到满意”(同上)。
- 41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由曼海姆(R. Mannheim)翻译(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第8页。
- 42 海德格尔,《尼采》(*Nietzsche*),第2卷,《相同者的永久轮回》(*The Eternal Recurrence of the Same*),由克雷尔(D. F. Krell)翻译(San Francisco, Ca. :

Harper & Row, 1984), 第 17 页。关于这本著作,海德格尔曾经在某处说过,“它不是一个传记”,它只能“给予不属于任何人的事物以一个名字”。

- 43 以下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明知道他是如何固执地拒绝和驳斥了所有对其著作的外在的或者简化的解读[参见他写给简·瓦尔(Jean Wahl)和简·比欧弗瑞特的信、写给一个学生的信以及写给理查逊的信件,还有他与一位日本哲学家的辩论,等等],海德格尔还是毫不犹豫地使用“粗陋的社会学主义”(clumsy sociology)的提法来反对其对手(在此处萨特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这样,如果有必要,他准备重新赋予“公共王国的独裁”这一主题以严格的社会的(如果不是社会学的)意义,正如它在《存在与时间》中毫无疑问所具有的意义。并且进而,在正试图准确地确立对“他们”的“存在”的分析“绝非意味着为社会学提供意外的(incidental)奉献”的段落中[“关于人文主义的来信”,见于《基本著作》(Basic Writings),第 197 页],他也准备这样做。这种海德格尔 II 对海德格尔 I 的再循环证明了这一事实(由上述引用的句子中对“意外的”一词的强调所突出的),即如果所有事物都被再否定了,就等于什么都没有放弃。
- 44 J. 比欧弗瑞特,《把存在的概念引入哲学,从克尔凯郭尔到海德格尔》(Introductions aux philosophies de l'existence. De Kierkegaard à Heidegger) (Paris: Denöel-Gonthier, 1971), 第 111—112 页。
- 45 珀格尔(O. Pöggeler),《海德格尔的思维》(La Pensée de M. Heidegger)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63), 第 18 页。
- 46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把他与 M. 迪尚的一次特定会见[在 VH101 中, no. 3, 1970 年秋, 第 55—61 页]同他对众多解释的驳斥或警告以及故意作出的干预等相联系起来。
- 47 有人或许会反对说,这一“主张”本身在“关于人文主义的来信”(第 215—217 页)中被特意否定了,但是这并不妨碍它稍后又再度被肯定(第 235—236 页)。
- 48 理查逊(Richardson),《海德格尔的》(Heidegger's), 第 224 和第 229 页(着重号为我所加);参见同上,第 410 页,关于“诗歌艺术”(poesy)与“诗”

(poetry)之间的区别的部分。

- 49 H. 马尔库塞,“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作出贡献(Contributions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见于《哲学手册》(Philosophische Hefte),第1期(1928),第45—68页。
- 50 C. 赫伯特,《人群中的此在》(Das Dasein in Menschen)(Zeulenroda: Sporn, 1937)。
- 51 正是同样的逻辑最近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或者弗洛伊德主义的“联合”,这种联合看似具有更好的基础,而弗洛伊德(按照拉康的解释)则又为如海德格尔的概念双关语提供了新的支持。
- 52 参照海德格尔在“关于人文主义的来信”(第212页)中对《存在与时间》的“存在主义的”解读的驳斥;对把《存在与时间》的概念看作宗教概念的“世俗”版本的解释的驳斥;对把本真的和非本真的之间的对立作“人类学的”或者“道德上的”的解读的驳斥(第217—221页);以及更为费力地,对关于“家乡”(Heimat)的分析中的“民族主义”的驳斥,等等。
- 53 海德格尔,“关于人文主义的来信”。
- 54 阿克塞罗斯(K. Axelos),《以调查研究为根据的辩论》(Arguments d'une recherche)(Paris: Minit, 1939),第93页及其后;还可以参照K. 阿克塞罗斯的《跨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将革新引入对未来的思考之中》(Einführung in künftiges Denken über Marx und Heidegger)(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6)。
- 55 我们看到在这里发挥作用的——即以其实际的真实性——是在存在(Being)和存在物(beings)之间“本体论区别”的图式:当需要强调哲学与科学特别是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距离并且重新确立等级制度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会是一个巧合吗?
- 56 这就是范魏茨泽克(K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宣言所指明的那种盲目理解(曾被哈贝马斯在“同与海德格尔相反的海德格尔一起思考”中引用过,见于第106页):“我开始阅读《存在与时间》的时候,它刚刚出版,那时我还是个学生。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宣称,严格地说,那时我一点儿都不懂它。但是我能感觉到它就在那儿,

并且独自在那儿,这种想法是与以下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即我所感觉到的东西必定隐藏在现代理论物理学之后,并且直到今天我仍然这样认为。”

- 57 同样一个萨特也许会因为海德格尔精英主义的职业信仰——这种职业信仰是以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所谓的“右翼思想”(很奇怪,竟然忘记了海德格尔)的伪装而出现在他面前的——或颌首微笑或被激怒。但是如果它没有穿着符合哲学场域的属性和习俗的制服出现在他面前的话,他将不会具有这种洞察力,即那种他对海德格尔的著作给出的关于他自己的社会世界经验的表述——也就是在《呕吐》(*La Nausée*)中详尽地表达出来的经验——中所具有的洞察力。

2. 宏大话语

- * 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关于历史辩证法。对《读〈资本论〉》的几个评注”(Sur la dialectique historique. Quelques remarques a propos de “Lire *Le Capital*”),《思想》(*La Pensee*),第170号,1973年8月,第27—47页。

3. 科学性的修辞

- 1 皮埃尔·古鲁(Pierre Gourou)指出了《论法的精神》从第XIV章到XVII章的所有不合逻辑之处,却没有看到其特有的神话原则,这种原则赋予这表面上不合逻辑的话语以真正的逻辑性。尽管如此,他正确地看到:“指出孟德斯鸠的观点是很有趣的,因为它们蛰伏在我们身上——随时准备醒来——如同它们存在于他身上。我们也一样,无论一种比孟德斯鸠时代更正确的看法带来了多么有力的反证,我们依旧认为北方人比南方人更成熟、更冷静、更勤劳、更正直、更勇敢、更虔诚、更无私”[古鲁,《论法的精神》中的物理决定论”(《Le déterminisme physique dans *L'Esprit des lois*》),《人》(*L'Homme*),1963年9—12月,第5—11页)。但是如果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对立仍旧在头脑中大行其道,那么无论人们在设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北—南轴”),还是设想

同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对立(“北和南”)时,都以为孟德斯鸠(按照这种分类原则是一个“南方人”)在某种方式上想到的是法国北南之间的对立,这实属过失的看法。罗歇·沙尔捷(Roger Chartier)指出这种对立只是后来的事。

- 2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表现:“我们还是不要嘲笑这种基础实验(指的是孟德斯鸠在关于地理环境的第 XIV 章开头所说的关于一条羊舌的实验);与布雷特·德拉格莱萨伊(Brete de la Gressaye)相反,我们从中看到一种血液循环的血管运动系统的先兆和一种机体适应气候的形式。但重要的是,孟德斯鸠在人们以为他迷恋理性建构的时候,筹划了一个实验。”[P. 韦尼埃(Vernière),《孟德斯鸠和〈论法的精神〉或不纯的理性》(*Montesquieu et l'Esprit des lois ou la raison impure*)(Paris, SEDES, 1977),第 79 页]。
- 3 关于一种文学传统的社会学的描述:“在其致力于孟德斯鸠研究的漫长职业生涯中,德迪厄神父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约翰·阿巴斯诺特的《论气候对人体的作用》(*Essays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是地理环境影响理论的一个源头”[R. 沙克尔顿(R. Shackleton),“孟德斯鸠的气候理论”(The Evolution of Montesquieu's Theory of Climate),《哲学国际期刊》(*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IX,1955,第 3—4 卷,第 317—329 页]。
- 4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Geneve, 1748; Paris, Classiques Garnier, 1973)。参见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的各章。
- 5 这种言外之意显然是一个明确的解释因素的证据:“相反,炎热的气候延长和减弱这些纤维,血液循环不那么快。因而寒冷的空气使得身体更强壮、血液更轻快而炎热导致软弱、放松、麻痹。”[A. 梅基奥尔(A. Merquiol),“孟德斯鸠与政治地位”(Montesquieu et la géographie politique),《政治与立法史国际集刊》(*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politique et constitutionnelle*),VII,1957, pp. 127—146)。
- 6 因此南方人的许多消极特征只是出于描写北方人的美德的需要才被提到的:“更自信,也就是更有勇气;对自身高贵的认识更多,也就是报复心更少;更有安全感,也就是更坦率,更少怀疑、算计、手腕”(XVI, 2)。(在这个图表中,我用括号说明了未表现的主题,这些主题只通过一种对称

的效果出现,而且处于次要地位。)

- 7 我们看到词语游戏和被科学保证的幻想游戏之间的深刻默契。比如我们还是想想在 18 世纪盛行的对手淫和各种形式的纵欲的医学谴责,各种形式的纵欲会因为浪费“生命力”而毁灭“动物的协调”:“反对手淫的斗争在 18 世纪关于性的压制话语中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从 1710 年以来,随着贝克博士的《自慰或手淫的可怕罪恶》在伦敦出版到 20 世纪末,共有 73 部著作(书,小册子,文章)论述这个‘不幸的习惯’”[T. 塔尔克齐罗(T. Tarczylo),《蒂索的手淫,18 世纪,性生活的表现》(*L'Onanisme de Tissot, Dix-huitième siècle, Représentations de la vie sexuelle*)第 12 号,1980 年,第 79—96 页]。
- 8 我们在狄德罗那里发现女人气这个词的一个非常类似的用法:“如果人们原谅他追求风流的女人气嗜好,这是因为他是人们所说的一个体面人”[狄德罗(Diderot),《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Paris, Gallimard),1973 年,第 145 页]。
- 9 让·斯塔罗宾斯基清楚地看到了伊斯发罕的后宫景象即奴役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彻底体现的模棱两可:“‘享乐’的景象被过分宣扬,无法不符合孟德斯鸠想像中的欲望”[让·斯塔罗宾斯基(J. Starobinski),《孟德斯鸠本人》(*Montesquieu par lui-même*)(Paris, Le Seuil),1953 年,第 67—68 页]。
- 10 “设想一下,我们的女人的思想轻率和冒失,她们的爱好和厌恶,她们或大或小的激情,被搬到一个东方的政府里,搬到她们跻身我们中间的这种活动和这种自由里;一家之长如何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到处是可疑的人,到处是敌人;国家将被动摇,人们将会看到血流成河。”(XVI, 9)
- 11 至于“追根溯源”,尤见 R. 梅西耶(R. Mercier),“《论法的精神》中的‘批评思考’的气候理论”(La Théorie des climats des “*Reflexions critiques*” a “*l'Esprit-des lois*”),《法国文学杂志》(*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第 53 年,1953 年 1—3 月,第 17—37 页和第 159—174 页。
- 12 “如果有一种民众理论,一种几乎在这个时代被所有人接受的真理,这就是气候和土壤对于健康、个人和集体的幸福,对于政治体制的形式、私人或公共立法的影响的真理”[A. 梅基奥尔(A. Merquiol),在上述引文

中]。愈演愈烈的考证逻辑本身导致不断扩展“来源”(或“影响”)的空间,引起了一个社会学上不贴切的“创新性”问题[参见如 P. 韦尼埃(P. Verniere),在上述引文中,第 82 页]。(那些认为孟德斯鸠可能把在他之前已经形成的观点归为己有的人,暗中赋予一切包含一种接近孟德斯鸠观点的观点的作品以“根源”,进而是“影响”原则的地位,这些作品在这位哲学家的藏书中被清点出来。)

- 13 我们可以想想人们乐于从《论法的精神》中承认和制度(尤其是专制制度)理论和地理环境(以及许多其他与妇女状况、获得权等等相关的东西)理论之间的明显联系所证明的有机统一原则难道不属于相同类型,而且,地理环境理论难道没有将整个“理论”(参见“地理环境制约是所有制约中的第一要素”,XIX, 14)建立在——神话——理性的基础上。
- 14 只要跟随地理环境理论的后继者,从勒普雷(Le Play)、A. 德·普雷维尔(de Preville)、H. 德·图维尔(Tourville)、P. 比罗(Bureau)、P. 德尚(Deschamps)、E. 德莫兰(E. Demolin)的社会科学学派,到政治科学学派及其政治地理作用,从拉策尔(Ratzel)的人类地理(Anthropo-geographie)到地理政治(Geopolitik),我们就可以预感到赞同一种“理论”的(政治)基础,这种理论的一个作用是消灭历史,将为历史行动留有一席之地。历史决定论归约为物质决定论,这种物质决定论导致对既定秩序的接受或解释。[这就是孟德斯鸠让物质决定论原则发挥的功能:“一种在理论理性看来不公正的法律,人们可能试图以自然法名义对其加以修正,这法律其实是一个漫长的因果系列的产物,它与许多其他法律有关联,人们无法在同时不妨碍国家的基本精神的情况下改变它,这就是为什么理论上最完善的在现实中是一个政治错误。最好放弃绝对的正义,以维护传统秩序,尽管它是不完美的”——让·斯塔罗斯宾斯基(J. Starobinski),在上述引文中,第 86—87 页。]
- 15 G. 康吉扬(G. Canguilhem),《生命科学史中的观念和理性》(*Ideologie et rationalité dans l'histoire des sciences de la vie*)(Paris, Vrin),第 39—43 页。
- 16 人们可以把沃纳·斯塔克(Werner Stark)的著作《社会思想的基本形式》(*The Fundamental Forms of Social Thought*)(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1962)作为对一种科学精神的病理学的一种论证来读,这本书提到了有机论[布伦奇利(Bluntschli)、舍夫勒(Schaffle)、利林菲尔德(Lilienfeld)]或机械论[当然是帕累托(Pareto),但还有凯里(Carey)、伦德伯格(Lundberg)、多德(Dodd),等等]的某些畸胎形式。依照相同的逻辑进行的研究还有辛西娅·伊格尔·拉西特(Cynthia Eagle Russett)的研究成果《美国社会科学思想中的平衡概念》(*The Concept of Equilibrium i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New Haven:Yales University Press,1966)。

译 后 记

我是从庚辰年年底开始翻译这本书的。当时只打算翻译一小部分,而且是首次翻译一部学术专著,因此不但并不以为苦,反而还有些兴奋与紧张。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兴奋的心情逐渐为烦琐的劳动所代替,踌躇满志的热情也都转化成了详细具体的任务,这时才明白,任何成就都是的的确确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的。加之原著者的行文风格颇为晦涩艰深,而且书中夹杂着许多拉丁文和德文的词句,除社会学外还涉及语言、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等诸多学科的知识,这也无形中使翻译工作的难度加大了许多。此外,书中涉及的人名、地名、书名也很多,为了少有讹误,经常需要深入地查找和考证。有时各种资料都找遍了也找不到,忽然于意外中在某处发现了线索,真是柳暗花明。例如书中提到的“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根据书中的线索委实难以找到,不得已,我暂且将其音译为“安略特教授”。忽然有一天,在天津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小书屋中,我发现了德国作家海因里希·曼的《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这篇小说。但是由于本书中提到的人物是源自《蓝色天使》,而非《垃圾教授》,因此不敢妄自断定此“Professor Unrat”就是彼“Professor Unrat”,为此我又去查找关于海因里希·曼的资料,最后终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查到,二者确

实是同一个人物:《蓝色天使》是根据《垃圾教授》改编成的电影。至此悬疑方解。这只是众多例子中之一。总之,翻译工作的艰苦和烦琐是每一位译者都必须面对的,尤其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原本对社会学知之甚少的人来说,翻译布尔迪厄这样的社会学大师的作品需要付出的劳动就更多了。

说到这里,我首先需要向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赵旭东博士表示感谢。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他给予了我许多鼓励和帮助,并且还承担了译稿的校阅工作,他的鼓励、帮助和指点不仅使本书的译文更趋成熟,而且使我更加理解了翻译工作所需要的耐心和细致,以及做学问所需要的严谨和执著。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不仅仅在于书本身,更重要的是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态度。在此,让我对旭东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霞女士,以及北京大学的高丙中先生和南京大学的褚建芳先生。他们为本书的翻译及出版做了很多的工作,并对具体的翻译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我担任了本书第Ⅰ、Ⅱ部分以及第Ⅲ部分第一篇文章的翻译工作。本书第Ⅲ部分的后两篇文章“宏大话语”和“科学性的修辞”由刘晖翻译。作为本书的译者,我们衷心地希望读者能够给我们提出建议和批评。

褚思真

甲申年十月于天津